

炎黄春秋

第 **3** 期
2012年

“自由人的联合体”为什么走向反面

林希翎的右派因何没有改正

吴忠谈1976年天安门事件

1959年的民间“彭德怀上书”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倒退

目 录

一家言

1 “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实践中为何走向反面王铁群

春秋笔

4 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沈志华

14 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改正胡治安

21 1940年延安审干高 华

亲历记

28 我经历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
.....吴忠 口述 陈楚三 李大震 整理

35 叶圣陶日记中的出版总署“三反”运动.....叶永和 蒋燕燕

往事录

41 金银滩之痛尹曙生

46 1959年的民间“彭德怀上书”.....李洪林

53 毛泽东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之死陈学政

57 凌霄参与“贵定反共救国军”疑团蒙 凯

60 一个生产队的死亡档案金家富

争鸣录

62 我所了解的“半夜鸡叫”真相孟令骞

68 川康民盟冤案是怎么造成的金拾珊 张 宁

71 林彪“九八手令”怎么会有两份张聿温

怀人篇

72 “大跃进”中的周小舟刘玉佳

沉思录

75 对“团结，教育，改造”的反思邵燕祥

人物志

78 吴晗挨批后的心态变化吴厚荣

故纸堆

81 蒋介石批钱给陈独秀裴高才

海外事

82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倒退陆南泉

特 稿

88 在炎黄春秋杂志社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张希清

89 《炎黄春秋》的体制探索是成功的.....杜导正

90 新春联谊会嘉宾发言摘要杜明明 整理

编读窗

93 读者来信摘登殷叙彝 等

顾 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 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胡德华 赵德润

保育钧 钟沛璋 郭道晖 资中筠 凌 云

展 江 徐小岩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 放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諝 雷 颐 魏久明

社委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竟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 常务社长 吴 思

副社长 杨继绳 李 晨

社长助理 胡竟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编 辑 吴 思

副总编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黄 钟

总 经 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财务总监 胡竟成

发 行 部 孔 屏(主任)

办 公 室 王海印(主任)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 琼

秘 书 长 吴 思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8元 全年定价 96元

“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实践中为何走向反面

○ 王铁群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一直把自由放在显著的地位,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马克思主义为后人树立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但非常遗憾,共产主义的实践却走向了反面。此中原因何在?

一、“自由人的联合体”理想与实践严重背离原因何在

1917年,列宁领导俄布尔什维克推翻了“二月革命”后的民主临时政府,建立了第一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共产党政权。自此至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遍及“欧亚非拉”。除苏联外,欧洲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有东德、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亚洲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有蒙古、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非洲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有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等。南美洲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只有古巴。由此形成了一个由20个左右共产党执政的国家、150个左右的共产党,9000多万党员构成的,领土、人口和工业总产值都约占世界1/3的共产主义阵营。

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说明,共产主义的实践者在掌权之后,往往违背马克思的意愿,走向马克思追求的人的“自由”、“解放”的反面,尽管这些国家以“民主”、“共和”命名。

随着1991年苏联退出历史舞台,从1989年到1991年,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垮掉14个(东欧

8国加上苏联、蒙古、柬埔寨及非洲3国)。今天,世界上共产主义国家只剩亚洲的中、朝、越、老和南美的古巴,但这5国也程度不同地进行着社会主义改革。

“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与实践严重背离的原因在哪里呢?

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那么通过何种方式和途径实现这种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的答案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党宣言》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实“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为了证明这两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花巨大精力撰写《资本论》,从劳动价值论推出剩余价值,从剩余价值论推出平均利润,似乎论证了资本家阶级是剥削集团,工人阶级是被剥削集团,两大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阶级斗争的哲学。列宁把“二月革命”后建立的民主临时政府贴上资产阶级政府的标签,通过“十月革命”(现有一些观点将其定性为“十月政变”)给予推翻。建政后,斯大林继续以阶级斗争划线,大搞“清洗”迫害,制造了遍布全国的“古拉格群岛”,受难者约2000万人,几乎占苏联人口的1/9。中共在建政前就“以俄为师”,坚持阶级斗争思想,在“土改”、“肃反”、“打AB团”、“审干”等问题上,犯下严重“左”的错误。夺取政权后,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制造了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受害人数之众史无前例。柬埔寨波尔布特领导红色高棉1975

年夺取政权后,继续进行阶级清洗,屠杀了大量国民。当今世界有两大著名恐怖旅游景点,一是纳粹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另一个便是柬埔寨金边波尔布特罪恶馆。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看,阶级斗争理论不仅是各国共产党鼓动造反,从而夺取政权的工具,更是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制造阶级敌人,导致一系列惨剧的手段。该理论给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带来了一系列灾难。

其实,只要存在社会分工,阶级就必然存在。但这里的“阶级”实际指的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并无先进与反动之分。如企业家阶层和雇工阶层,他们都是商品价值的创造者(商品价值由劳动、资本、经营管理等共同创造)相互间实际属于契约关系,是容易利益协商的两个阶层,不存在不可调节的矛盾。人类社会真正的阶级斗争只有一种,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斗争。可以说人类产生政权以后的历史,就是官民两大势力斗争的历史,这种阶级斗争是由于对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从而当政者必然专权弄权的产物。当建立起民主制度后,主权在民,统治者也就失去了为所欲为的特权,这种阶级斗争才告结束。对此,陈独秀指出:“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及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特权之旗帜。”

再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各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然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如何专政?马克思主义者的答案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而专政。而一个成员众多的党又如何实现专政?列宁回答:“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

领袖的人们组成的。”(《列宁选集》4卷,第197页)他声称:“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一党专政、领袖独裁。正如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说的:“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

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看确实如此,苏联等自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不是高度集权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设计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制度,而现实中,“无产阶级专政”一旦成为绝对权力,便很难自我结束这一过渡。苏联等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长期存在,而且日益强化,乃至无以复加。

总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实践,使社会走向了自由的对立面。陈独秀指出:“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

绝对的权力必然支配一切。在苏联等自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济文化只是政治的附属。

在经济上,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公有制是社会所有制,即人人占有生产资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节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要“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公有制的真正含义是资本社会化和利润社会化。这种公有制已在今天西方许多国家实现。而当年苏联等国实践的公有制是通过强权推行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种公有制的先天缺失是缺乏有效的竞争和激励机制,它扼杀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效率低下。由公有制决定,苏联等国的资源配置方式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先天缺陷是技术上缺乏可行性,它实际是以粗放型和牺牲国民幸福为代价,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冷战经济模式。更重要的是,由

于公有财产不可能归全民所有,实属“官有制”;计划的制订、发布、监控只能通过集权强制性进行,这就必然导致少数人对公有财产和计划运作的垄断。

20 世纪的历史实践证明,凡是实行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国家,都是民不聊生并走向了集权主义。

在思想文化上,马克思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抨击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思想文化强制,主张言论、思想、新闻、出版自由。而苏联等国与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无不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思想钳制和文化垄断,把一切同领袖言论相悖的观点视为异端邪说,无限上纲,随意批判,甚至迫害作者。思想文化上的垄断化,严重制约了社会的进步。

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从 1954 年至 1989 年主政达 35 年之久的日夫科夫在回忆录中,将苏东剧变的根源归结于这些国家实施的三大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

苏联解体后任俄共主席的久加诺夫也强调,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思想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正是这种制度和垄断,使这些国家走向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反面。

二、“自由人的联合体”理想怎样才能与实践吻合

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其本质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外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推崇“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学说中最有吸引力和生命力的部分。

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共产主义是没有政权和国家的社会,因而忽视了民主和人权对于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所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者都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目的的途径和手段,从而形成

绝对权力,走向了自由的反面。顾准先生说过: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并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目标与共产主义实践的鲜明反差,留给后人丰富的经验教训:

专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必须实行民主制度。民主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价值,是消除等级和特权,维护公平公正的根本制度。没有民主,社会各方面都会变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根本的经验教训。

经济垄断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制度。经济垄断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应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社会所有制,实现资本社会化和利润社会化。资本社会化是指资产所有权社会化,即每个人都能占有有一定生产资料,具体说就是全民持股制。利润社会化是指通过各种经济(主要是税收)和社会手段将公民个人的部分财产转变为社会所有。

思想强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上必须实现言论思想自由。言论思想自由既是基本人权,也是创造所有人间奇迹的原动力。社会主义应使人人对社会制度、经济秩序、意识形态等,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只有这样建设社会主义,才会日益接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和目标。

今天,认识共产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本质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共产主义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尊重个人的权利、尊严和价值,维护平等,反对特权;必须创造条件,使人的个性、人格、创造性能够自由地发展。必须保障人的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权利的充分实现,促进人的个性、能力和知识的全面发展。

共产主义的本质决定共产党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保障,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奋斗。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

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

○ 沈志华

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并肩作战，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社会主义的东方阵线”，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传为佳话。尽管战前毛泽东决定暂不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签订像中苏之间那样的友好同盟条约，但中国在朝鲜战场发挥的实际作用已远远超过了法律意义上的盟友。^{注1}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谈起中朝关系，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是：“中朝两国唇齿相依”，他们在战斗中结成了“鲜血凝成的友谊”。由此人们一直以为中朝友谊地久天长，中朝联盟坚不可摧。然而，随着俄国和中国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研究者渐渐发现，在朝鲜战争期间，虽然中朝两国人民的确结成了深厚友谊，但是作为实际上的同盟国，在两国高层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在一系列战略决策和涉及各自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双方都有着不同的考量。

一、关于军队的指挥权问题

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境内，与人民军并肩作战，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这也是结成军事同盟双方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为此，中朝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

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黄昏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称美国正在朝鲜继续增兵，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至于后勤问题，仅提出志愿军入朝后一律使用朝币，以后再按比值偿还，所用柴草一律由当地政府采购，按市价提供。朴还说，目前金日成已转移到平壤以北的德川，金希望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说明朝鲜方面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不便直接提出由他来指挥中国军队。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注2}

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则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注3}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彭德怀对朝鲜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他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

发展”这一根本价值，判断一种理论和实践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根本价值观。

社会发展的首要的和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其正确方向就是实现中国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

的发展”。一个真正的中共党员都应知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就是高举“人的解放”的旗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就是为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奋斗终生！■

（作者系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1951年秋,中国人民志愿军部分领导人与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在志愿军司令部外的合影。左起:王政柱、李贞(女)、甘泗淇、朴一禹、彭德怀、陈赓、邓华。

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等。后来彭德怀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注4}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此时还不宜提出,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组建的兵团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注5}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志愿军司令部,以保持联络。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注6}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注7}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如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24师时,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注8}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

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与军事行动有关的问题。但商谈的结果令人失望: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注9}在此期间,彭德怀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6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第125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人民军第7师5000余人又与125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

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注10}

金日成出于主权和尊严的考虑,不愿交出对朝鲜军队的指挥权,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在刚刚断送了几十万朝鲜军队后,要指挥几十万中国军队,似乎就难以理解了。从目前看到的史料判断,金日成有此想法,一则是不了解莫斯科的立场,二则是误解了中国人的某些说法。为了避免刺激美国,中国政府对于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特别强调其非官方的性质,所以在公开谈到部队指挥权的问题时特别谨慎。10月25日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开战的消息传出以后,金日成希望中国同意公布志愿军参战的事实,以鼓舞士气。毛泽东11月7日批示:金日成在演说中可以提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在朝鲜人民军统一指挥之下配合人民军反抗侵略者”,但不宜多说。周恩来也在答复中特别强调,不是“中国志愿军”,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11月12日,周在电报中再次强调,金日成演讲的措辞一定要改为:“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总部指挥之下的参加作战”。^{注11}然而,这都是一些说法,实际上中国并没有考虑过把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相反,毛泽东还特别建议要金日成尽快与彭德怀和高岗直接见面,商谈中朝两军联合作战的事宜。^{注12}会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就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高岗随后解释说,朝鲜半岛地域狭窄,战役上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显然已经了解到斯大林的意见,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并批评人民军以最好的苏联装备打了败仗,而赞扬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消灭了大量敌军,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却闭口不谈。情急之下,彭德怀干脆直接提出了自己设想的方案,即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仍然不置可否,而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只好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注13}

事关重大,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表态,他在11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述了彭的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怀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以及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我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毛泽东特别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的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的配合,并能依照您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能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注14}17日,毛泽东致电彭、高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也赞成统一指挥。毛泽东要彭观察金日成的反应。^{注15}

鉴于莫斯科已表明态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在12月3日的会谈中金说,斯大林有电报指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

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职,朝鲜同志为副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随即,毛泽东告以中国方面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则提出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并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联合司令部(以下简称“联司”)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司需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联司下仍分为两个机构:志愿军司令部和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联司的建立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铁道运输、修理亦划归联司指挥。会谈后,周恩来起草了《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注16}金日成返回朝鲜后,12月7日同彭德怀再行商议具体事宜,“所谈甚为融洽”。双方商定数日内组成联合司令部,金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取消此前对人民军第3军团的部署,令其就近听从志愿军第9兵团宋时轮指挥。^{注17}彭德怀对此表示满意,并反复指出,“人民军勇敢、顽强的精神和一套严格的苏军军事管理制度,是值得学习的”,指令第9兵团干部,应以学习的态度去了解(人民军)第3军团的情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相机介绍中国建军中的各项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经验”,但如与对方的原有制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运”。^{注18}不过,毛泽东还是有些担心。他指示不要再搞联合指挥部职权条例草案了,这“不仅在两国关系上,更主要在国际关系上”都不利。毛还强调说,中朝联军指挥部只能在实际上组织起来,对外不宜公开,对内也只下达到军部及独立师师部。不过,有关战争各事实际上必须统一指挥。^{注19}

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于在中国受训的部队回国,朝鲜人民军共有7个作战军团。其中4个军团在联合司令部领导下行动,3个军团直接隶属于朝鲜人民军总司令。^{注20}除了地面部队,空中作战也需要联合行动。在中国军队出动并取得初战胜利后,斯大林决定投入苏联空军参战。^{注21}1950年10月29日,苏联顾问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还答应10天后将苏联空军的基

地从沈阳移至安东。^{注 22} 11月1日,苏联空军第一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了战斗。^{注 23} 1951年1月初,扎哈罗夫通告,苏联空军两个师将于近日入朝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线。此外,4月初中方空军将有5个师、朝方空军将有3个师参战。因此,在苏联顾问的赞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统一的空军指挥部。后经中朝协商,于3月参照联司的组织原则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集团军司令部。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及语言不通等原因,苏联空军未加入联合司令部。^{注 24}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预下,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从组织机构的角度得到了解决。如果说联合国部队由美国统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问题则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问题,要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中国主要考虑的是战争胜负问题,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权衡利弊,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志愿军手里乃势在必行。斯大林只能作此选择,这也是金日成在与中国结盟时必须面对的事实。

二、关于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

还在朝鲜人民军顺利向南方推进时,毛泽东就与金日成的私人代表李相朝做过一次长谈。毛泽东强调,朝鲜人民面对的是非常强大的敌人,对此必须时刻牢记。人民军只顾向前进攻,后方守备薄弱,敌人很可能从后方登陆,切断人民军的交通线。毛泽东警告朝鲜领导人必须认识到这种危险性,应该集中力量,实施战略性后撤。李相朝传达了这一意见后,金日成不仅



对于朝韩双方来说,“三八线”代表着战争和分裂的记忆

根本听不进去,而且警告他不得把这一情况告诉任何人。^{注 25}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彭报告说,由于胜利,朝鲜党政军民情绪高涨起来,但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不仅是苏联大使的意见,而且是朝鲜党中央多数同志的要求。”彭认为,“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敌军士气虽较前低落,但现在还有26万左右兵力,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所以,“我军应采取稳进方针”。^{注 26} 周恩来也持同样意见,提出除非可以在汉城地区寻机歼灭敌军,否则,不论敌固守汉城或放弃汉城,我军均要休整一个时期。^{注 27} 但出于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注 28} 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注 29}

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



彭德怀在朝鲜前线视察阵地

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注30}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注31}战局发展果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主动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作战部队造成什么创伤。鉴于此时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注32}，且考虑到“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注33}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1月2日《劳动新闻》发表了金日成几天前在劳动党中央第三次常委会上的报告。报告指出，朝鲜党和人民对三八线的划分，“不能容忍，不能坐视”。因此，当前的军事任务就是对越过三八线逃窜的敌人“积极展开追击战”，并组织“决定性战斗”。^{注34}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他内心实际上主张速胜，只是发表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朝鲜外务相朴宪永推到前台。就在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

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注35}1月9日上午，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注36}同一天，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注37}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停战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这时拿出毛泽东9日电交给金日成。金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注38}

1月11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急电。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毛依据斯大林来电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当日黄昏，彭、金、朴会谈，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金日成和朴宪永认为，斯大林所说让人民军单独前进，是指目前形势有利，美军要退出朝鲜。

朴宪永列举最近一些新闻和苏方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对他们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再消灭美军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这时金日成插话,重提在半个月内存志愿军应有3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即展开进攻的主张。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的。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也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做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还要三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如果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可以杀头。彭德怀接着根据毛泽东来电的意见指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个军团约12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然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自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最后,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注 39}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注 40}此时,毛泽东也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月14日致电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

重而艰巨的工作,具体包括:用经过训练的新兵补充部队,使经过训练的新兵学会老兵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准备好给养和弹药,改善运输和后勤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认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第二天毛又将此电转发斯大林。^{注 41}于是,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注 42}然而,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出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尽管朝鲜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注 43}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在朝鲜党内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的志愿军似乎不愿意在1951年初武装干涉者遭到失败时彻底解放朝鲜。^{注 44}可见此事对金日成的刺激之深。

从军事角度讲,彭德怀的主张当然是实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据的,而朝鲜领导人的情绪,显然是受到了政治考虑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朝之间的这种分歧,只是在军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张,而从总的战略方针来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或军事压力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在这种情绪下,毛泽东和金日成都没有认真考虑此时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于1951年1月提出的停战谈判的决议案,从而失去了一次尽早结束战争的有利时机,并使中国在政治、外交和军事各方面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注 45}

三、关于停战谈判和结束战争的问题

朝鲜战争历时三年,但是从1951年7月至

战争结束,打打停停,多一半时间都是在停战谈判中度过的。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中朝双方在停战时机的问题上,也是分歧不断,争论不休。

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方面终于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注46}金日成却仍然急于求成,反对战争长期化的打算,要求中朝联军6月末至7月中旬再发动一次总攻。毛泽东只得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经过商谈,金日成同意6~7月不发动进攻,但还是要求经过准备在8月发动一次反攻。^{注47}毛泽东无奈,只好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注48}斯大林详细询问了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给毛泽东回电:“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注49}金日成无法再坚持己见,朝鲜战争由此进入边谈边打的阶段。^{注50}

据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观察,“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尽管他们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金日成回到朝鲜后,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甚至在马立克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朝鲜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此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虽然朝鲜领导人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是其负责人李克农)为能达成停战协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同时也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充分地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特别是当

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时,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后来因美国代表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过分要求,并在谈判中立区进行挑衅,中方表现出强硬立场,才使朝鲜人的情绪有所好转。不过,拉祖瓦耶夫注意到,“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注51}

然而,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注52}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协议: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但在其他议程,特别战俘问题上还有争议。这时,朝方主张尽快结束谈判,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注53}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困境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



1953年7月27日,朝、中方面与联合国军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拉祖瓦耶夫还反映,中国领导人“担心大量苏联军事装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中断”,并认为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注 54}

5月2日,朝鲜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的四项已经全部达成协议,但在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上,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而中国方面坚持应全部遣返,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注 55}显然为了照顾朝方的意见,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新建议:除了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注 56}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包括已不再坚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员),于7月13日提出了总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80%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32%)这个基本数字,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注 57}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后选择。

对此,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毛泽东在7月15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

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愈战愈强,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了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总之,“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最后,毛泽东不无深意地告诉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针,在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后再告诉平壤。^{注 58}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中国主张坚决拒绝“敌人这种挑拨性和引诱性方案”,并表示准备战争扩大。毛泽东还通报说,“金日成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注 59}金日成在7月16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表示赞同他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并感谢中国将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诺。^{注 60}但是就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金日成却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敌方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拒绝接受敌方的条件。虽然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还是希望尽快停战:“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注 61}

中朝之间在谈判中的战俘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即双方的战俘政策完全不同。由于受国内战争传统作法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经验,中方从一开始就未曾想过扣留战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100名战俘,以动摇敌人军心。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注 62}这样,中方掌握的战俘即相应减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俘工作,以后南朝鲜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而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注 63}这样,中方实际看管的战俘人员十分有限,没有多少谈判的本钱,这大概也是中国主张“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

虑,则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战俘。据继任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他们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战争前期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北朝鲜认为这些人不是战俘。^{注 64}在这种情况下,朝鲜领导人当然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全部遣返”的原则。

问题最后还是莫在莫斯科得到解决的。1952年7月15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并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第二天斯大林即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注 65}

周恩来随后于8月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以后战争中应采取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

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注 66}

对于平壤的说服工作,自然还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与金日成会谈时,斯大林问到,朝中之间在谈判问题上是否存在某种分歧。金日成回答:“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于的严重状况,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斯大林立即说:“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斯大林最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注 67}1952年11月10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提案,24日又提出补充建议。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赞同苏联的提案和建议,即先停战,再解决全部遣返战俘问题。^{注 68}

此后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没有再提立即停战的主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苏联援助物资的问题。不过,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中朝之间在是否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的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这也是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争论。1953年3月以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战争方针发生改变,从而促进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注 69}但李承晚不想停战,并以擅自释放战俘的做法破坏协定的签字。为此,中方主张再发动一次战役,借以争

取更好的停战条件。而朝方则要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对李承晚释放战俘的行为不必追究。彭德怀没有理会金日成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愿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阵地突破战，并取得成功。^{注70}

显然，在停战问题上，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既然无望在战争中取胜，那么最好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转而进行经济建设，巩固其对朝鲜北方的统治。而毛泽东因其对亚洲革命负有的领导责任，则必须着眼于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总体形势，着眼于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才屡屡得到斯大林的支持。

四、关于朝鲜战争期间中朝联盟的一些结论

朝鲜战争期间中朝双方的分歧不仅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在朝鲜铁路的管理权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铁路关系如何保障军队后勤供应等问题，中朝双方在如何保证铁路运输及铁路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矛盾和冲突。中朝双方曾就铁路管理权多次进行协商和谈判。1951年4月16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提议为适应战争需要，朝鲜铁路必须立即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即在联司领导下，设立中朝联合的军运司令部，统一朝鲜铁路的管理、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注71}由于斯大林明确表示支持中方意见，金日成不得不做出让步。5月4日，中朝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对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运力分配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铁路管辖权是中朝争论中唯一涉及朝鲜内政和主权的问题，彭德怀在1959年受到批判时对此也不回避。但正如彭所强调的，对铁路实行军事管制是在战争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处理办法，并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立即将铁路交还朝方管理。^{注72}不过，在莫斯科干预下强加于人的做法，毕竟给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阴影。

对朝鲜战争期间中朝联盟真实状况的回顾和探索，大致可以做出如下结论：

一、毛泽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决心派兵入朝作战，表明中共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忠诚，同时也在实际意义上让中国承担起亚洲革命领导者的责任。由此，中苏同盟得到巩固，毛泽东也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于是，中国在战争中的主张往往得到苏联的支持。

二、由于大规模、持续不断地派遣军队进入朝鲜，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掌握了中朝方面对于战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实际主导权，而斯大林则不得不放弃战前苏联对朝鲜的完全控制。而在中苏两个大国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朝鲜只能“忍辱负重”，采取服从的态度。

三、尽管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和矛盾时，最后都是朝鲜依从中国的主张，但毛泽东的本意并非要侵犯朝鲜主权、干涉朝鲜内政，也没有像斯大林战前那样追求对朝鲜的控制。究其原因，一方面中朝关系如同中苏关系，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结构性弊病，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际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另一方面，毛泽东熟读中国古书，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他的头脑中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中央王朝”的统治理念。中国与朝鲜之间在历史上长期保持着宗藩关系，其特点之一就是宗主国并不要求剥夺外藩的主权，而只是要求臣服和追随。

四、金日成有一种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又要在朝鲜建立起他个人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而朝鲜劳动党内部派别林立，其中构成威胁的主要是南方派、莫斯科派和延安派。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中，延安派成员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并与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无疑令金日成感到不安。这种心理障碍，再加上中国军事领导人时而表现出来的对朝鲜指挥和作战能力的轻视，使得中朝高层之间缺乏一种超脱意识形态的真诚和信任，从而给他们的同盟及合作带来了困难，同时也为战后中朝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本文注解见本刊网站）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改正

○ 胡治安

在半个世纪前的反右运动中,50多万人被打成右派,后绝大多数获得平反,仅寥寥数人未得改正。林希翎便是这寥寥数人中的一人,而且是唯一的学生右派。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得到改正?

一、林希翎为何被打成右派

林希翎的右派改正问题颇为复杂。1995年4月,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复函北京市委统战部《关于林希翎右派改正问题》:“我们意见,先请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对林希翎右派改正问题进行复查,提出意见”。北京市委同意中央统战部办公厅意见,转请人民大学党委处理。该校“认真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访问了当年学校具体负责右派改正工作的同志”后,做出了简单明了的答复:林希翎右派改正问题“经市委和中组部做出‘不予改正’的决定,此后,中央关于右派改正问题,未再下过新的文件与精神……也未发现足以否定‘不予改正’决定的重要新材料”,“不考虑对林希翎改正问题进行复查”。谁都知道,所谓“复查”就是对原结论重新审议,重新认识。而回答是,原结论“不予改正”,就是一锤定音,无须再审议、再认识。事情果真如此吗?现将1979年7月4日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抄录于下: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女,一九三四年七月生,浙江省温岭县人,家庭出身自由职业,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九年十月参军,一九五五年九月考入人民大学法律系。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文章点名),一九五八年二月宣布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作反面教员。一九五八年八月被捕,判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一九七三年释放安排工

作,一九七八年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现在浙江武义县农机修造厂当工人。

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规定和一九五七年划右派分子的标准,对林希翎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时期的言行进行了复查。结论如下:

(一)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三日,林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先后去北大和在人大作了六次演讲、答辩,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

她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仅仅是政治上的名词……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她攻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就镇压人民,采取愚民政策”,“党团员成为特权阶级。”她造谣说,在去玉门的“路上亲眼看见工人罢工……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没有,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她攻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90%高级干部不同意”,叫嚷要“清洗党内一大批混蛋”。她认为我们“现存制度是产生‘三害’的直接原因”,“这样的制度就会形成特权阶级”。

林在引用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说,我国的“肃反理论根据也是错误的”,“杀了77万,冤枉的人有72万,相当于一个小国家”,“南京肃反时,一夜即把逮捕证发给每个单位,一下子就逮捕了两千多人,连礼堂都住满了”。她明确提出:“要从制度上根本改变”,要“彻底改革政治制度”。

(二)公布、抄袭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制造混乱。

整风运动初期,林搞到一份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她明知这个“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她也知道不得外传,却在演讲、发言中,都大量引证其内容。她攻击说:“斯大林专横残暴,严重透顶,历史皇朝无可比拟”,“阻碍社会发展,倒退了一个时代”。她声称



1950 年代的林希翎

“‘秘密报告’材料是很真实的”，给我“很大启发”。她用“秘密报告”来影射我们党的工作，说“我们同志间关系不正常，‘六亲不认’，‘冷若冰霜’”。她在六月一日全校大会上宣布：“现在我主张公开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我这里有一份，可以公开。”六月二日她贴出海报，要在六月三日晚上公布，由于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反对，她未能得逞。但使学校的整风运动，被迫停止了三天。

林还把“报告”给校内同学传阅，又叫人抄寄给北大、西安、南京、武汉等地一些人。当学校让她交出时，她又抄留了一份。

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活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严重的干扰破坏了学校整风运动，也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新的错误。

(三)反对中央当时的整风方针和部署，煽动闹事。

林把中央在全党进行的整风污蔑为“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叫嚷“要彻底革命”。同时与社会上的右派互相呼应，密切往来，极力煽动说，党中央提出鸣放“很多人在应付，口是心非”，“听说有风声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巴，是愚蠢的”。“现在的‘鸣放’这只是上层，这是不行的，老头子不大胆……不敢和共产党闹翻”。“我们青年长着脑袋是干什么的！难道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吗！我们要说话”，“让每一个人过真正‘人’一样的生活”。她说“什么叫人民做主！同志们，过去我们感到做主吗？我没有做主，我没有感到是主人。”“人民不是阿斗。真正解决问题，只有

靠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现在西北、武汉等地，到处学生都行动起来了，可就是互不通气，报上不报道，是新闻封锁！”“我们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到处都有，不仅北大，还有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大，各地大学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小小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她公开提出要“开三害控诉会”，煽动闹事。

林希翎的这些言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她这些年来又一直不认错，仍坚持其原来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以上复查结果，用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衡量，林希翎定位右派不属错划，不予改正。希望本人从中真正接受教育，今后为社会主义服务。

关于被逮捕判刑问题，建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鉴于林希翎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是大学毕业生，为了发挥其所长，建议浙江省适当安置她的工作。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

1979年7月4日

这个结论，对当年划她右派的根据，没有全部搬出，如她说胡风不是反革命，这是当年定罪的重要根据；又如她说反右斗争犯了扩大化错误，这是当年她攻击整风反右的“罪行”。引用的言论，仍然是“断章取义”。如说“封建社会主义”，她的原话是：我国和苏联都没有建成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会产生“三害”的，因为中国和苏联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是在封建、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如果是社会主义，只能叫封建的社会主义。又如，她攻击“共产党员是混蛋，要清洗”，她的原话是：共产党员有三部分，绝大多数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有一部分是随大流的，有一小部分“蜕化分子”，我说他们是混蛋，哪怕是百分之一，应该清洗，以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正如林希翎说的任何人都可在她身上涂抹自己所需的颜色一样，任何人都可以根据需要摘取她的言论。1957年，她发表大量讲话，形成了较完整的思想。综观她当年的言论，她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

共产党、拥护毛泽东的。但她不满足现实,认为青年,对现实不满是个好现象,满足现实,是黑格尔灵魂的复活。因而要求不断改革,“彻底改革政治制度”,改革产生“三害”的制度。而改革要发动人民来讨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只是党员的,让全民提意见,尽情地提。她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看了铁托的讲话,听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她又是一个敢想敢说的人,在整风运动中对现行制度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提出批评,言辞有些激烈,举证也许不很准确,但她不是蓄意反党、反社会主义。

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从资产阶级民主出发,批评共产党,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是名副其实的右派,但不是人民中国的敌人;而林希翎与他们不同,她是个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她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念出发,批评“封建社会主义”,言辞激烈,影响很大。她并不是资产阶级右派,但她是“封建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反右中,她也反对章乃器的定息延期20年,反对储安平的“党天下”,反对轮流坐庄。她忠诚而积极地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就本质而言,当时的林希翎不是右,而是左。但结果,她的命运比章、罗更惨,成了“专政”对象,在铁窗中苦度了15年,监狱吞噬了她的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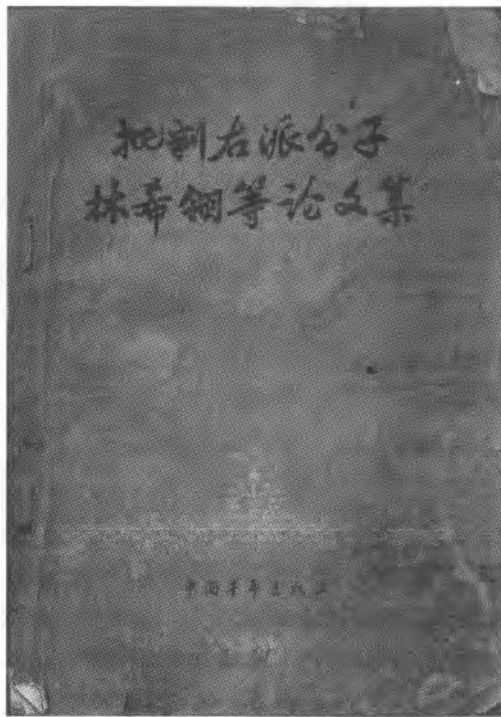
林希翎在上世纪80年代曾说:“五十年代我批评共产党的时候,我的出发点不是反共,恰恰相反……我希望共产党能够改正错误,把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国家”。

二、林希翎右派“不予改正”原因何在

1. 1979年的云雾

1975年特赦释放全部国民党战犯前,毛泽东提出摘掉章乃器的右派分子帽子。章的帽子摘了后,毛泽东又问还有个林希翎呢?因为有“伟大领袖”的亲自过问,很快就要为她摘帽子,但她在服刑,立即释放,安置工作。这一过程,现在说法不一。但我相信,我说的粗线条是较准确的,因为我当时在公安部,参与特赦战犯和清理监狱的工作。

1979年我在中央五部“摘帽办”时,关于林



1957年版《批判右派分子林希翎等论文集》

的消息、意见、文字材料就多了,有说好的,有说坏的,有中央领导人的,有部门负责人的,搞得头昏眼花,如坠云山雾海。林希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首先听到的是林希翎来北京了,这很正常,应该来讨个说法,但一直纳闷,为什么不来统战部?后来看到耀邦的批示:“仲方、戴云同志,请你们约她谈谈,同这样典型的人谈谈,很可能获得许多新鲜知识。谈时请代我向她致意,愉快地向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的明天”。仲方,即王仲方,原是公安部长罗瑞卿的秘书,时任中宣部秘书长,戴云,时任中宣部办公厅主任。显然,胡耀邦确是很关心她的。随后,又传来消息,说林在北京到处活动、闹事,表现很坏:一是参与学潮,参与西单民主墙活动,并说自己是“民主运动的老前辈”;二是她能量大,坐着红旗小车,出入钓鱼台国宾馆(当时中宣部在里面办公),能看到中央委员才能看的《内部参考》,列席文代会,有关方面还在为她拍摄新闻纪录片《林希翎在北京》;三是她交往广、朋友多,与谭惕吾、刘宾雁、吴祖光、艾青等都有联系。这些话,在“摘帽办”并没有引起风波,听了就完了,总觉得她的问题要妥善解决。认为,她就是一名大学生,当年影响虽然很大,当今落实政策,不要抬得太高,抬高了,反而不好办。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接触到林本人,也没有收

到要我们过问的任何领导意见。林希翎的事,在云遮雾障中。

2. 杨士杰一锤定音

1979年4月的一天,中组部秘书长何载电话通知我参加一个座谈会,商议林希翎的右派改正问题。4月16日我出席这个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人很多,满满一屋子,20多个单位的人参加。说是座谈会,实际上是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讲话。人民大学、北京市公安局、法院介绍情况后,杨士杰讲话,他说:林不是党员,不是中央管理的干部,今天召开这个会,一是因涉及一些政策问题,二是因为中宣部办公厅发函问题,还因为林希翎在文艺界的活动,为了通报情况,缩小她的市场,而召开这个会。他讲话中,特别强调组织纪律和坚持原则、划清界限。他说:改正右派要实事求是,不改正也是实事求是,林希翎人头不大,影响很坏,不改正也是实事求是。他说:林希翎有一套骗术,如说中央有人支持她,她五七年有后台;说她13岁参加革命,这一切都是吹牛,我们一些同志上当了,公开为她辩护。

杨士杰的这些话,没有调查研究,偏听偏信,是冲口而出的。还说,他报告了胡耀邦,“耀邦同志说,居然没有好好的接受教训,还那么狂,既然多数同志不赞成,那就挂起来再说。她也几十岁了,再过几年,头发都白了,老太太了,蹦跶不了几年了!”后面四句,在以后的文件里没有出现,但绝对是杨士杰的原话,因为给我印象太深,铭刻在我脑子里。作协的同志还说,刘绍棠讲,反右时真右派、假右派搞不清,这次改正,真右派就看得清了。这样,杨士杰的意见,就成了座谈会的“决定”:林希翎右派,不予改正。后来,林希翎在与我谈话中,多次说,就是杨士杰“这个老混蛋”,一锤定音。

杨士杰已经作古,骂他“老混蛋”,冤枉他老人家了。杨士杰为右派的平反改正,有过重大贡献。在起草中共(1978)55号文件时,五部门有关负责人意见分歧,是年6月烟台会议上,就有对立的两种声音:一是对右派分子只摘帽子,不搞甄别平反;一是实事求是,重新审议五七年的右派案件,错了就改。杨士杰在会议结束时有个讲话,强调“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不能因为我们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

案长期得不到解决”。烟台会议没有形成决定,文件稿一直处于“讨论”中。胡耀邦说,杨老头在烟台会议上放了一炮,放得很好。他提议再开一次相关的部长会议,重新研究右派问题。直到这年9月,在民族文化宫九楼召开的会议,才最后敲定。当时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中宣部部长张平化,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公安部部长赵苍璧,民政部部长程子华。还有相关副部长,董小鹏,廖井丹,凌云,李金德。会上,杨士杰说,1963年中央为695万人甄别平反,弄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生产,于今只解决50万右派问题,中国不会乱。张平化、乌兰夫、赵苍璧、程子华等,分别从各部的角度,阐述了实事求是为右派平反的迫切性,完全赞成杨士杰的意见,右派问题必须解决。这样才形成了中共(1978)55号文件。可见,在解放50多万右派中,杨士杰配合胡耀邦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

杨荣甲先生在回忆他父亲杨士杰的文章中说,在为“右派”改正的工作期间,林希翎曾找到家里,质问父亲为什么她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曾“大闹一通”。杨荣甲先生回到家中得知这一情况,也向父亲提出这一问题,“父亲避而不答”,在他一再追问下,“最后只说了一句:‘是她所在的单位不同意为她改正。’”(参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但是,在林希翎的问题上,杨士杰有所偏颇。当时和现在我都以为,是因中宣部人员对林希翎的过分热情,触犯了杨的尊严,他叫劲要与有关部门比试权威。在会上,他公开批评中宣部向北京市委发函,建议改正林的右派问题,是打着胡耀邦的旗号,损害了中央领导人的声望。王仲方当场反驳:是遵照胡耀邦指示,向北京市委发函的,根本不存在损害中央领导威望问题,耀邦多次批示要给她改正,你们就是不改,这是维护中央领导吗?

3. 小官僚,导演大悲剧

林希翎的右派问题得不到改正,与一个小官僚主义者有关。与她刚愎的个性不无关系,如果她对1957年自己言行造成的影响有几句检讨,事情的结局就可能两样。杨士杰专听中国人民大学某些人的意见。该校的报告,不仅对林五七年的言论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而且对其现实表现,

也尽力夸大,任意指责,把林描述成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甚至是“骗子”、“流氓、恶棍”,报告撰写者是当年反右派积极分子,与林有很深的历史成见。他写的报告,校党委书记也认为缺乏真实,批示“还是要真实”。直到2006年,有人说林希翎在国内是右派,到国外成了左派。他听后,面有愠色,立即反驳:不能这么说,什么左派?!我们走访这位负责人问及林的问题,为什么不改正时,他说林五七年那些事,算不了什么问题,有些观点,现在看来是正确的。又说当时不予改正,主要是她现实表现不好,参加西单民主墙的活动,被公安部门监视,准备抓她。根据有关部门的意见,不予改正。杨士杰表示,林希翎改正不改正,由人民大学党委决定。人民大学某些人,得了这一尚方宝剑,就可稳操胜券了。杨看了一个个报告、“汇报”,对北京市委统战部等单位说:“林希翎右派没有划错,又犯下了新罪,改正没有条件”。于是一锤定音。

1980年4月《关于林希翎右派问题复查情况汇报》最后说:“根据林希翎1957年的言行,当时定她的右派是正确的,不属错划。林在被划为右派以后的二十多年来,又一直不认错,仍坚持原来的立场观点,因此,林希翎的右派问题不能改正”。1984年4月又有《关于林希翎问题的情况汇报》,再次重申:“过去和现在的实践都证明,林希翎的右派不予改正,是正确的,是实事求是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统战部转去几位老同志要求为林平反的信,不仅被顶回,还有一句软中带刺的话,使批转此信的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受到严厉批评。连胡耀邦及许许多多的老前辈和相关部门,他们都不在话下。多次指责林希翎说她的后台是胡耀邦、吴玉章、邓拓、张黎群,是“招摇撞骗”、“挑拨离间”,否定这些老前辈对林曾经有过的关心、支持。

80年代,林希翎在海外成为“新闻人物”时,他们连连“报警”。1983年11月《关于林希翎问题的报告》建议有关部门对林在海外进行封杀,对林在“香港、国外攻击党的言行”,要“及时掌握并向国内通报”;对“她发表的反动言论”,要“理直气壮地予以反驳,对她招摇撞骗、混淆视听的言行,应揭露”。她“要求我驻外单位负责人接见,应予拒绝,可指定一般工作人员接待,以免抬高

她的身价”。不仅想在海外封杀林氏,而且大有在国内追查“后台”的气势。在报告的草稿中说:“从林希翎的上访和去香港的情况看,林为什么那样神通广大,她对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和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她的问题,她知道一清二楚,她上访期间,为什么能列席全国文代会?为什么她想去香港,就有人给她办单程?为什么有些人那么为林希翎卖力,又是写文章、作报告,又是拍片子,大造舆论,极力为林翻案,鸣冤叫屈。的确在林希翎一案问题上,暴露出有些单位和个人存在着党风不正,组织涣散,甚至组织不纯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好在这位官员手中只有大笔而无大权,不然,他肯定会开展“纯洁组织”的大清查,也许再揪出几个几十个林希翎。还要庆幸的是,这些“报告”胎死腹中。

50多万右派,其中有多少大人物的问题都顺利地解决了,唯有林希翎这个有一定影响的小人物,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拖成了有世界影响的大问题。关键不在中共中央,不在方针政策,全在有实权、心胸狭隘的极“左”人物。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云山雾罩,最后形成“铁案”,想改动,比撼山还难。

三、成立专门小组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1. 见到林希翎

2004年1月,我接到统战部干部局长电话,问是否认识林希翎,说她致信部领导要求晤谈,后再接电话,说部领导让我代表她与林希翎见谈谈,局里派人陪同。我欣然应命。2月17日与干部局副局长陈征然,约请林到统战部礼堂叙谈,并设宴招待。她准时到来。从下午3点半,直到晚上8时多,基本上是听她倾诉,我们很难插话。她讲述打成右派的冤屈,党内老干部为她鸣不平,特别说到人民大学原党委组织部长李逸三,多年来四处奔走呼号要为她平反,说林希翎不平反,我死后骨灰不入八宝山。4个多小时的谈话,心平气和,友好愉快。最后她说,如果中央出于政治需要考虑,不给我改正,留下这么一个活证据,说明反右是正确的,那我也服从大局了。在她面前,我们能说什么呢?大道理没有可说,只得安慰,表示同情,也说几句,本来简单的问题搞

复杂了,解铃还须系铃人,还得同原单位商议解决。我们了解到她在北京的居住、看病都有些困难,表示将及时反映,力所能及地帮助。

第二天,我接到林希翎的电话,听得出来她很高兴。

在与林希翎见面前,我们还拜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钧儒。李曾为林说了些好话。李副校长告诉我们,他与林认识是近年的事,他访问法国时,驻法使馆反映,林希翎很有思想,也很爱国,右派问题应该解决。

2. “死马当成活马医”

不久,林希翎去香港,临行前给我留下在港的电话,以便联系。以后的日子里,时有电话往来。她告诉我,将于2004年6月24日回法国,并说到法国后,再给我写信,申述她的要求。

2006年1月18日深夜,林自巴黎给我打电话,讲了一个多小时,对右派问题要求有个说法。林说,我的右派问题至今没有平反,阻碍解决问题的老人都死了,应该好办了。不解决,也得有个说法。给你写信的事,写了也不一定解决问题,倒给你增加麻烦,我感谢你的关怀。现在也难执笔了,说说还可以,动手写东西很困难了。看吧,身体好些再说。中国驻法使馆也要我写材料,由他们向国内申报,也不见得解决问题。一些老同志,如李逸三、聂真都为我鸣不平,要求平反,但一到彭真那里就卡住了。1980年中国新闻社针对国外“林希翎死于中共监狱”的谣言,拍了部《林希翎在北京》的新闻纪录片,那时,胡耀邦批示,要给我改正,中新社和我都以为我将很快得到改正。纪录片拍了我和吴祖光等一些改正人士在一起游玩、谈笑,喜气洋洋,和谐欢乐,反映当时共产党落实政策,大得人心的情景。后来,杨士杰一锤定音,不予改正。影片被封杀,被毁掉。我手头有大量资料,我死后会被毁掉的,这是毁掉一段历史。

3. 成立专门小组,处理林希翎问题

我将林的来电,整理报告了部里领导,并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请人民大学重新审议其右派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二是如愿意,请她回香港定居,以便就近照顾,她也有活动的自由空间。部里领导很重视,专门给我指示,要妥善处理,随即成立专门小组,由陈征然副局长牵头,干

部局、办公厅派人参加,并明确交代,现职局长出面牵头,工作主要由你来做。

专门小组成立后,抓紧工作,希望在反右50周年前,把问题解决。首先走访中国人民大学统战部。接待我们的统战部长是位50多岁的女士,是研究中国民主党派史的专家,她一见到我们就叫苦连天,林的问题,我根本没有接触过,都是以前的搞的,问题都涉及中央领导干部,我们无权、也无力来研究解决,还得由中央来解决;林的材料几大堆,都在档案柜中。谈话不得要领,只得背了几捆资料回来。我们一面细细地看材料,从1957年到1984年的讲演记录稿、书面报告、媒体报道、审查结论等等。同时走访有关人士,面谈的有王仲方、胡耀邦原秘书曹治雄、人民大学原教务主任杨佳民、北京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傅镇岳,电话采访了中组部原秘书长何戟。所有接触到的人都异口同声:应该改正。

2006年4月4日,陈征然带领我和颜景秋拜访王仲方,他告诉我们:

1978年,林希翎为右派改正问题给耀邦同志写了封信,耀邦同志作了批示,责成我和戴云同志见一下。按耀邦同志指示,我们在钓鱼台中宣部办公处见林,她谈了被划为右派的经过,并说当时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被打成右派是冤枉的,希望改正。耀邦同志在下面曾说,林被打成右派他是有责任的,当时鼓励年轻人要敢讲真话,她讲了真话,却被划为右派是打错了(一些人认为,林敢讲话,耀邦同志是欣赏的)。为她改正右派的事,耀邦同志先后有过三次批示,并要求我们找人民大学想办法平反,我与戴云同志找了人民大学,人民大学提出意见报北京市委,北京市委不同意改正。这个情况向耀邦同志作了汇报,耀邦同志还是认为应该改正,又让我们给北京市委写信。

2006年2月24日拜访曹治雄同志,他已76岁,谈到林希翎时,他说了下面的话:

1956年我随耀邦同志从哈尔滨回北京,在飞机上耀邦同志看到《中国青年报》上一篇题为《灵魂处长着脓疮》的文章,他很生气。他说,对青年人犯错误批评一下可以,不能这样刻薄。当时交代我,下了飞机,就找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张黎群,叫他来。胡见到张,严厉批评了青年报

社的做法。说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青年学生，你们闯祸了。如何收场，耀邦出了个主意，邀林为《中国青年报》特派记者，去西北采访。后来又请林希翎来谈了几个小时，对林没有批评也没有肯定，就是了解一下情况，说了些年轻人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了话。耀邦同志还留林吃了饭。

由此，我同林认识了，成了朋友发展到恋爱关系，还准备结婚。反右派开始了，当年她向我要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说北大、清华都传开了，没关系给我看看吧！我给她了。这是犯了大错误，心里不是滋味，总想向耀邦同志交代，又怕挨骂挨整。最后下了决心，做好挨骂的准备，向耀邦同志交代了，原以为是一顿暴风骤雨的批评、臭骂，但事出意外，耀邦同志以气愤的语气，嗓门很高的说了两个字：“糊涂！”我糊涂，吃了苦头，打成右派，下放到陕西劳动，与林也断绝了关系。80年代，林到北京找到我在工人体育馆的宿舍，我将她堵在门外，心想就是你害得我好苦！我夫人开通，说我这样做不近情理，总是朋友嘛，她受的苦还少吗？以后恢复了联系。去年纪念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时，她想回来参加，要我帮忙，我办不到呀！林也70多岁了，如有人能帮她解决这个问题，是做了件好事。

与杨佳民同志谈话记录如下：

从1978年到1979年，人民大学党委按照中央精神，对林希翎为右派问题进行复查，经过多次研究讨论。从其1957年发表的言论来看，多数同志认为主要是思想政治和学术观点问题，其中不少意见后来被认为是正确的，严格地讲她没有别的大问题，也曾考虑过是否予以改正。后来没有得到改正，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从1957年她的言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特别是她当时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公布出去这件事，影响不好；二是据公安部门监控，林在1979年“西单民主墙”期间比较活跃，发现她两次参加非法聚会，公安部门有抓她的想法，并提出对林不宜改正，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林出去以后，听说总体表现还是好的。1985年她到台湾去，在一个会上发表讲话，公安部的同志看了录像，以后说，没有什么出格的问题。

从林希翎这个人来看，应当肯定她有才华、有思考能力。她在人民大学学习期间就是小有名

气的青年作家，吴老（玉章）对她的成长很重视、很关心，在宿舍等生活问题上给予她特殊的关照。她社会联系面广，关系多，在落实政策阶段到处找人，总想通过一些关系解决问题。她这个人很高傲，总想发表一些独立的见解，有点招人烦，但应该说她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没改正，主要是“西单民主墙”的因素，没什么实质问题。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很不同了，林也到了晚年，建议有关方面可根据她这些年的表现，实事求是地再做研究，全面分析考虑可否予以改正。

还有一位王文先生，应该拜访，但无法拜访了，他同我们已不在同一个世界。

何载在电话里介绍说，1957年我任中办秘书室主任、党总支书记，王文任一科科长、支部书记。他原来是刘仁（北京市委书记）的秘书。林希翎给毛主席写信，王文看了，与林见了一两次。1957年5月6日，林希翎到中央办公厅，要见杨尚昆。杨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要我代杨见林。我和王文，还有一人，在警卫室与林谈了50多分钟，然后由王文起草了简报，送杨尚昆。就为这事，我和王文都被打成右派，王文是五七年划的。我是五八年划的，我的主要“罪行”是支持王文，鼓励林希翎向党进攻。王文被打成右派，吃了不少苦。他的夫人受到株连，“文革”中被逼自杀身亡，一个儿子也被迫害而自杀了。2005年王文因车祸谢世。他的右派问题平反后，仗义执言，撰文《应为林希翎冤案彻底平反》，登载在《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1263期上，胡耀邦读过后批示：“改正有利”。

我们的工作很顺利，得到各方面的支持、配合，很快就形成了《关于林希翎的有关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我们提出：考虑复议林希翎的右派改正问题。考虑到她目前生活确实困难，建议可予适当帮助。统战部部长会议讨论同意了这个意见，因为林现居法国，先致电驻法使馆，征询意见后再行办理，但时过两年，使馆尚未回复，事情又被搁浅。但后来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逝世前两年的态度与之前完全不一样。

林希翎于2009年9月19日在巴黎逝世。她的右派问题，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改正。■

（作者为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1940年延安审干

○ 高 华

编者按：本文作者高华先生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为中国现当代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尤以对延安整风的研究为世所重。高华先生于2011年12月26日因病去世，英年早逝。本刊择其延安整风研究之片段，刊发以示纪念。

一、1940年干部档案制度的初步建立

对干部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审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既定政策，但是1940年全面推开的审干却有其特定的背景，这次审干的主要目的在于对1938年至1939年党员大发展阶段吸收入党的新党员实行政治过滤。

“审干”发端于国共激烈对抗的十年内战时期，基于对国民党和国内其他党派的高度警惕，中共一向极为重视清理内部。1937年抗战爆发，中共获得合法地位后，大批青年投奔延安，一些原先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也纷纷归队，中共组织部门在社会部的配合下已对进入延安的每一个人实行了严格的审查，换言之，只有经过组织审查的人，才能被分配至机关、学校、部队。

抗战初期，中共为了要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及为了未来与国民党一争天下，对于发展中共党员的数量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十年内战结束时，中共的党员数量只剩下不足三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在军队。显然党员数量之少已与中共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第二大党的角色十分不符。当时担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就力主要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他认为“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否则将来悔之晚矣”。^{注1}为此，1938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在以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前往延安与各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被吸收入党，以至于个别部门和地区，

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发展党员的任务，反复动员、说服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造成所谓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拉夫主义”的错误。待发展党员的任务基本完成后，中共中央又重新回到过去那种严格入党条件的道路。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审查党员成分和各级干部，但又明确提出，这种审查“不应成为普遍的清党运动”。在一年半之内，中共在发展党员的政策上，一下子从敞开大门到暂停发展，其实并无矛盾，中共为了壮大党，需要“广招天下士”（陈云语），中共也是从现实需要出发，认定只有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能真正巩固党。在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袖看来，中共应该网罗天下英才为我所用，至于是否有嫌疑人员乘机混入共产党则大可不必惊慌，中共自有办法对付此事，这个法宝就是审干。

就在党员大发展的1939年，针对新党员和从事白区斗争干部的审干就已同步进行。这个时期，中央社会部通过其密布在各个机关、学校的“网员”，对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类人员进行秘密调查，这种调查虽然有成效，但是局限性也很明显。

首先，由于调查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不易得到各级党组织的配合，调查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

其次，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较少，无法应付延安几万名干部的秘密调查，大量的材料上报社会部后被长期积压。

正是基于以上情况，1940年，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开展审干工作。这次审干的目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为了发现干部的长处与优点，以便加以“适当的培养、使用、提拔和调动”；第二，“为了发现混在党内的异己分子，以便清洗他们出党而巩固党的行列”。^{注2}在这之前不久，中共中央也改变了中社部原垂直侦察系统，改由各级社会部受



延安整风中学学习资料

同级党委和中央社会部双重领导。在这次审干中,中组部和各级党委的组织科(干部科)处在前台,中央社会部则在幕后予以配合和协调。

1940年审干所获取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初步建立起中共干部的档案资料管理制度。

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对党员的个人档案资料管理尚处于非正规化的水平,由于战争环境和地下斗争的险恶,干部的个人档案资料很难予以有效的保存。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艰险抵达陕北,带至陕北的党和军队的核心机密文电总数仅五十余斤。^{注3}为了安全的因素,干部的个人档案资料在长征前夕已尽行销毁。

党员干部个人档案资料管理制度的建立及逐渐正规化,开始于抗战初期。“七七事变”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纷纷来到延安,中共也获得了陕甘宁边区这块较为稳定的地盘,于是,在中组部干部科的策划下,逐渐建立起党员干部的个人档案管理制度。

1938年初,司马璐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后,又经中组部部长陈云面谈,由中组部分配去位于枣园的“敌区工作委员会”报到。中组部工作人员交给司马璐一封信,要他面交枣园机关主任秘书曾希圣,司马璐在途中偷拆了信,发现其中一份是介绍信,另一份是中组部对司马璐作的“鉴定表”,上面写有评语:“有组织能力和斗争经验,但具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个性强,骄傲,缺少劳动观念,组织生活锻炼不够。”^{注4}

这个时期,中共的组织和干部工作尚处于恢复和重建时期,许多手续还不健全。以后,组织部门给干部的“鉴定”一般不由干部面交,即或交由

干部转交,也需在信封开口处加上火漆,以防干部偷拆。

延安初期的干部档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干部填写的履历表;

二、党的组织部门对干部履历的鉴定或结论;

三、干部所在部门党组织对干部政治思想及

各方面表现的鉴定;

四、有关干部履历的其他证明材料。

干部个人档案由各机关、学校的干部科(组织科)管理,领导干部的个人档案由上一级组织部门管理。

二、干部履历表和组织结论的做出

审干开始后,运作方法仍是动员干部自己报告个人历史,审干人员则从干部填写的材料中查找疑点,在党员按照组织要求,多次填写的各种履历表格中很快就可发现各种问题。

1940年6月,延安马列学院在291个抗战后入党的新党员填写的表格中,发现前后一致的仅103人,占总数的33%，“其他67%都是经过了党的无数次的教育解释工作才改正了、补充了自己的历史的”。^{注5}

为什么会出现在前后表格不一致的现象?基本情况有两类:

一、许多新党员担心自己的阶级成分是地、富,害怕受到歧视。因此将家庭出身改成贫农、中农或“没落的小资产阶级”。

二、一些在白区工作的老党员一度失去组织关系,深恐引起组织的怀疑,来延安时没有详细交待,现在仍“将错就错,填下去”。

上述情况在延安各单位都普遍存在,自然引起中组部的高度重视。1940年3月,陈云发表了《党员对党要忠诚》的文章。中组部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审干教育,对党员进行反复的说服、教育、启发,解除党员“惧怕”、“怀疑”审干的

心理,让党员明白审干“是有利于党,有利于他自己的”,只要党员改正了过去填表不真实的错误,他过去的行为,不仅不会受到党的怀疑,相反,党会认为他在政治上取得了进步。与此同时,中组部还要求从事审干工作的同志要加强对干部表格和各类资料的分析、调查。由于干部填表前后不一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中组部形成了几个基本的看法:

党员最初填写的表不一定是完整和真切的,有的干部是不会一次向党老实交待自己历史的,为此必须多方搜集干部的个人资料。

如何搜集呢?

首先要求干部提供个人历史的证明人,这又包括几个环节:

- 一、在干部本身的材料中找证明人;
- 二、从干部提供的证明处找证明人;
- 三、从谈话中找新的证明人;
- 四、从相同时间、相同地区、相同事件中找证明人;
- 五、从此人的材料中发现彼人的证明人。

即使有了证明人,也不能完全相信,因为存在几种可能性:

一、提供证明人与被调查对象暗中串联,互相包庇,互相吹捧对方。例如,经常会出现证明人提供这样的材料,证明某人是“非常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同样在监狱中出卖过同志。

二、有的证明人因惧怕牵累,不敢为被调查对象出具证明。

经过反复细致的说服动员后,干部的各种审查资料都陆续到齐,下一步就是具体地分析和判别这些材料。这个过程又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一、首先研究党组织对这个干部的介绍材料,这种介绍材料一般具有两个核心部分:组织上对这个干部的基本评价,提出对该干部需要重点考察的问题。

二、检查这个干部本人写的材料:先看 he 最近写的材料,再从中找出疑点,即组织介绍材料中所提出的重点考察部分,把两者进行互相印证,继而从他本人写的各种材料中找出可疑与不清的问题。

三、检查他人提供的旁证材料,这也需要几

个步骤:首先确定旁证人的可靠程度,从旁证人材料中找出组织介绍材料中提出的重点问题,再从旁证材料中找出受审干部自己所写材料中暴露的可疑部分。

经过对以上材料的反复对比研究,就可以查明该干部所存在的问题的性质。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将问题提到干部科科务会议,进行逐个研究,对这个干部做出组织结论或鉴定。

在做出组织结论之前,还有一个程序,这就是干部科的同志与受审干部进行个别谈话。这种谈话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核对材料,或发现该干部过去在填写各种表格时未予反映的内容,因此在谈话中,审查人员不应打断对方的谈话,尽量从被审查对象的谈话中发现问题。当这一切都完成后,就到了做正式结论的阶段。

结论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一、历史审查的结论。一般由干部科会议集体做出,可以向当事者公开。在这部分的结论中,应对干部的历史中已搞清楚的问题,做出肯定的结论。但是,如果问题仍不清楚,旁证材料不够齐全,肯定的结论也可不做。

至于干部某段历史尚无证人证明,则对干部有证人证明的历史和组织上已清楚了解的历史做出一般的结论。但需写明,某段历史尚不能肯定。

对另一些问题严重的干部,一时无法找到证人证明,则将其所有问题提出,全部保留,并由组织上对此人做出一般结论,以供日后继续考察。

二、在单位表现的鉴定。这类鉴定由党员所在的党小组、党支部在会议上讨论并做出鉴定,被鉴定者本人可以列席会议并表示自己的意见。在党支部鉴定的基础上,该干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结合对干部历史的考察,做出干部在单位表现的鉴定。党组织对干部表现的鉴定通常不与本人见面。它应该包含被鉴定者的政治思想状况、党性修养以及干部个性、特长、工作经验与能力,以及对干部今后工作发展方向的建议等方面的内容。

到了这一步,对干部的审查就可以告一段落,而审干过程中形成的具体文字资料就成了干部的个人档案。从此这份档案就尾随干部,像一个无形的影子,干部调到哪儿,这份档案就跟着

他到哪儿。以后每逢审干或政治运动,这份档案都会增加内容,党组织都会在这份档案中写上对这个干部的考察意见,它将决定这个干部在政治上的前途,或被提拔重用,或“不得重用”,或被“控制使用”。于是干部档案就成为决定干部命运的一件利器。它既属于这个干部,又是完全独立于干部个人的异己物(干部通常不知道领导在自己的档案中写了什么),两者相依相随,一直到这个干部离开人世,这份干部个人档案也还未寿终正寝。它被置放在某个文件柜中,在对这个干部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的政治审查中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三、中央社会部的秘密侦查工作

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审干工作正紧锣密鼓全面展开的同时,社会部的秘密侦查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同步进行。

1939年后,社会部加强了对延安各机关、学校人员的秘密考察,被列入考察对象的人员包括以下几类:从国民党监狱释放来延安的人员,来延安时介绍信不清的人员,年龄与相貌不符的人员,喜欢打探小道消息的人员,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空隙可以被敌人利用的人员……

社会部如何得知这些干部的背景?没有组织部门的协助和提供介绍,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社会部在各机关、学校派有单线联系的秘密情报员——“网员”,但依当时的规定,各单位的工作人员互相不得打听彼此的背景(有些同志或有可能被派往国统区工作),因此,社会部获取干部资料的渠道主要是各级组织部门。

1940年9月20日,中央社会部发布《除奸工作指示》,要求延安各机关、学校划出审干中的嫌疑对象,将其材料上报社会部。^{注6}根据这份指示,一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被集中到社会部,另有一些人,嫌疑程度尚不足上报社会部,其材料则由各单位组织部门自行掌握。

从1940至1941年上半年,社会部会同各机关、学校的组织部门和保卫委员会,对集中在社会部的嫌疑分子材料进行鉴别,并展开对这些嫌疑分子的秘密侦察。

然而,确定“嫌疑对象”并没有太多的事实依据,对大多数嫌疑分子的怀疑,主要依据的是他

们本人所填写的各种表格,而这些表格中所反映的问题,也大多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一类,以及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

当时,这批已被内定为“嫌疑分子”的人员大多是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他们之中,除了少数人是在国统区自行报考进入延安的(陕北公学曾在国统区刊登过招生广告),绝大多数人都是经各地中共党组织或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推荐介绍来延安的,在“嫌疑分子”中也有一些党龄较长的老干部。可是他们依据事实填写的各种表格竟成为将他们定为“嫌疑分子”的唯一依据,他们将由此被长期秘密审查,一“挂”就是几年,非党员的不得入党,也不被分配到急需干部的前线。

林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政治处副处长,1940年秋在审干高潮中被王明主持的校务委员会免去职务,将其调往由张琴秋担任处长的教务处,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一概不予宣布。林纳被免职的真正原因是受到其夫的株连,因而受到党的怀疑,被认为是“嫌疑分子”。林纳与其夫都是留苏干部,抗战爆发后,夫妇俩奉命返国,但在临行前,其夫被苏联格伯乌(1917年12月建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按俄文第一个字母拼写叫“契卡”,1922年2月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按俄文第一个字母拼写叫“格伯乌”,1953年以后又称为“克格勃”——编者注)逮捕,林纳一个人返回了延安,被分配在女大任政治处副处长。女大的审干由政治处处长孟庆树(王明之妻)和政治处干部科科长叶群负责,但立案审查林纳,是中央社会部的决定。为了让林纳“坦白交待”问题,叶群经常找林纳谈话,对其施加种种心理压力,有时“拍桌子,瞪眼睛”,有时又显出“很怜悯林纳的样子”。每一次谈话后,林纳总要“大哭一场”(其实在这时,叶群自己也因历史上的问题受到审查)。以后,中组部也参与对林纳的调查,经过反复研究,报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才做出了“林纳无问题”的结论。^{注7}

在社会部调查的“嫌疑分子”中,著名作家萧军也榜上有名。萧军来延安后,长期未被分配工作,他被安置在蓝家坪招待所,成为一个闲散人员。萧军性格粗犷,初来延安时对纪律严明、等级井然的新秩序颇难适应。由于没有工作在身,萧

军经常到桥儿沟鲁艺找朋友聊天,言谈中对延安的生活常有牢骚之语。某次,中央文委负责人艾思奇奉命与萧军谈话,由于话不投机,萧军竟“从怀中掏出了匕首”。萧军的言行立即引起上级的警惕,“一些领导干部”要求社会部尽快拿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以确定萧军究竟“是友是敌”,而另一些人则要求社会部从快对萧军做出处理。^{注8}

包括萧军在内的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集中在社会部等待鉴别,这项工作量大繁重,而主持调查的社会部治安科人手又少,治安科工作人员陈龙(解放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系东北抗联出身,曾在苏联学习,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对排查“嫌疑分子”的简单化方法持有保留意见。陈龙征得治安科科长汪金祥(解放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同意,两人一起向康生提出改变“反革命嫌疑分子”确定方法的意见。此时正值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前夕,康生接受了陈龙等的建议,将此作为他重视开展调查研究的一项政绩。

在此背景下,1941年4月10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指示》,文件提出各地已经“堆积着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嫌疑案例,没有切实审查”,是因为“各地侦查工作薄弱所致”,另外的原因则是“由于有的除奸同志幼稚,主观夸大,推测附会,捕风捉影,自造了一些所谓的嫌疑分子……”。文件要求在重新审定原有的嫌疑分子时,必须做到“详细研究”和“慎重考察”,“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把党内错误、思想意识不好或组织关系与历史不清等问题与反革命问题分别清楚”。^{注9}

1941年春夏,中央社会部已全面开展清理嫌疑分子的工作,尽快对萧军做出结论,是清理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陈龙此时已升任社会部治安科科长,他布置治安科青年干部慕丰韵装扮成从其他根据地来延安的干部,住进蓝家坪招待所邻近萧军的窑洞里,就近观察萧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慕丰韵发现萧军喜爱京剧,正好慕会拉京胡,就以操京胡伴萧军清唱与萧交上了朋友。萧军毫无城府,“不出几天就对慕丰韵无话不谈”,慕丰韵将所了解到的萧军的思想动态向陈龙和社会部领导汇报后,最终才解除了对萧军政

治上的怀疑。^{注10}1941年7月,毛泽东会见了萧军,与他进行了颇为友好的交谈,萧军当然不知道,在此之前社会部已对他进行了这么细致的侦察活动和甄别工作。

萧军是延安的知名人士,得到中央的特别关照,由中央社会部直接经手对萧军的甄别工作也进行得比较顺利,但对于那些已有工作单位的其他“嫌疑分子”,这项工作的开展就并非一帆风顺了。

延安各机关、学校对于中央社会部提出重新审查嫌疑分子的决定,反应并不一致,有的予以配合,有的则以各种借口加以推诿,甚至认为,保留嫌疑分子没什么不好,“清不清没什么必要”。^{注11}在陈龙、汪金祥的努力下,决定以中央社会部的名义再发一个文件。1941年8月2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嫌疑分子的指示》第二号,文件分析了各单位清理工作开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一、把组织中个别未查清或未解决的个别问题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二、把通常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三、把各种不良现象或倾向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四、把一般不满言论和牢骚与有意制造破坏混淆起来;五、甚至还有把出于正义感的某些批评与恶意的政治污蔑混淆起来”。“总之……是把现象当本质,把可能当作事实,把推测附会当作具体事实,不分内外,不分性质,自造了一批所谓的嫌疑分子……”^{注12}

从中央社会部1941年4月和8月两份文件的提出,可以形成以下几点看法:

一、中央社会部确有一批政策水平和文化素质皆高的干部,他们因广泛接触各方面情况,视野较为开阔,有的干部对过“左”的审干方法持有异议。例如,陈龙曾力主排除对萧军的怀疑。在党内形势比较正常的气候下,这些干部会从自己的业务工作的角度出发,向上级机关提出不同意见。

二、中央社会部负责人康生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兴风作浪。在较为正常的大气候下,康生也会接受下属的建议,提出慎重处理不同性质矛盾一类的意见,尽管他抱有私心,一心想突出自己,并把下属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三、1941年4月、8月的两份中央社会部文

件也存在不足。例如在第一份文件中说,“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既然是主观附会、传说自造,就不能再视为是“反革命嫌疑分子”。文件中某些用语措辞方面的模糊,在实际贯彻中不可避免将向过“左”的方面倾斜,从而影响纠偏的进行。

四、1940年审干尚属比较温和

与以后的历次审干运动相比,1940年的审干是属于比较温和、比较稳妥的,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审干方法上没有渗入强制的因素。社会部虽然全面渗入审干,但社会部并不直接主持审干,社会部在这一时期甚至还起着某种中和的作用。正是在社会部的主导下,1941年春夏开始进行对嫌疑分子的甄别工作,解脱了一批干部。1940年的审干基本依据“审查干部的材料,主要是依据本人的报告”的原则,没有动用“逼供信”、“车轮战”等手段;在组织部门与被审查干部的关系上,也没有事先假定被审查对象是“特务”的框框;在与被审查对象谈话时,审干人员的态度也较和气,一般并不采用“法官问案式”的谈话方式。这个时候还强调,对新同志的谈话要注意“客气些”,让他们自由地随便地去谈,“务使被召来谈的人不感枯燥而乐于畅谈”。

1940年审干未酿成严重事件的更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活还较为正常,主持审干的中组部部长陈云以及负责延安文宣工作的中央书记张闻天等人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持有比较慎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陈云、张闻天持有相当开明的观点,陈云提出中共不仅要“广招天下士”,还要“诚纳四海人”,主张信任和提拔青年知识分子。陈云并参与起草或代中央起草了几份关于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张闻天也强调中共应尊重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特点。陈云认为,审干是必要的,但务必慎重。他们的看法与毛泽东的意见并不一致,而在1940年毛泽东毕竟还不能在延安完全决定一切。在他们的影响下,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1940年审干没有采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也没有事先划定框框,规定一定要排出多少百分比的“叛徒”、“特务”。尽管1940年的审干已经包含某

些过“左”的因素,但是在对干部历史问题的估计上,多少还是考虑到“干部是生长在中国错综复杂社会”这层因素,因此在对干部做出政治结论和鉴定时,一般还比较客观。

以丁玲为例,丁玲1933年至1936年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在她赴延安后,成为套在她头上的一道紧箍咒,“自首分子”的帽子若隐若现,长期在她的头上浮动。1938年上半年,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公开在党校大会上宣布,丁玲“不是我们的同志”,党校不接受丁玲前来学习,注¹³致使丁玲长期蒙受严重的政治压力。1940年审干中对丁玲这段历史正式做出结论,明确宣布,丁玲应被视为忠诚的共产党员。

再以王实味为例,王实味在赴延安前曾与托派有联系,在1940年审干中,王实味主动向中组部谈起这个问题,事后王实味仍在马列学院工作,他的中共党员的党籍也得以继续保留。

以后随着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1940年审干对王实味、丁玲的结论分别在1942年和1957年全被推翻,不再作数了。

1940年延安的审干在1941年上半年基本结束。然而时隔一年半,从1943年初起,一场比1940年审干规模不知要大多少倍的新一轮审干又平地掀起,由于这一次审干的规模和范围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审干,使其有了“审干运动”的名称。

既然1940年审干已经结束,1940年后也没有大量新人进入延安,为何还要兴师动众进行新一轮审干呢?其根本原因是进入1942年后,党内的大气候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兼之中共在长期的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已经形成某种习惯性的思维,这就是国民党特务无孔不入,任何审干都不可能彻底,总会有漏网之鱼潜伏下来,即使搞了审干,也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进行审干,对自己的内部进行经常的、无情的洗刷,而共产党就是与外部和内部敌人的不断斗争中壮大起来的。上述习惯思维早已成为党的性格中的一部分,如果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它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但是,一旦党内环境发生巨变,极“左”的敌情估计马上就会占据上风,将原先比较稳妥的审干政策冲得一干二净。1942年整风之初,延安知识分子批评时

政一时蔚为风潮,引致毛泽东的极度警惕,其结果是重新祭起审干、肃反的法宝。社会部在1941年4月、8月制定的文件,被康生自己废弃一边,重演一遍文件中所列举的各种极“左”的错误,而且比1940年变本加厉。曾经在1941年春夏被解除嫌疑的人又被翻了烧饼,问题更是连升几级,

从“特嫌”上升为“特务分子”,其中多数人在1943年4月被秘密逮捕。究其原因,系党内恶化的大气候所致,大气候之形成,其主导者为毛泽东,尽管康生在其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文注释见本刊网站)

(责任编辑 洪振快)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黄埔恩怨	王晓华 张庆军	38.00	6.00
国共往事风云录(全四卷)	尹家民	146.00	14.00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	吴 思	28.00	7.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净土	马亭瑶	2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 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	新华社总编室	26.00	6.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五套)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144.00	14.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 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8.00	6.00
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	埃德温·J·丁格尔	36.00	7.00
亲历民主 我在美国竞选议员	龚小夏	2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张木生	58.00	8.00
文人陈独秀	石钟扬	39.00	7.00
1943 一盆红红的火(谢韬日记选编)	谢 韬	49.00	8.00
聆听历史细节	王 凡	36.00	7.00
高岗传	戴茂林、赵晓光	59.00	7.00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冯亚光	126.00	12.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知青回忆录(上下册)	邓 鹏	97.00	10.00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施用勤译	58.00	8.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黄宗良等	246.00	20.00
国学大师之死	同 道	29.00	7.00
人生三路口:宗教、道德与人生	梁漱溟	28.00	6.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我与中国民主同盟	梁漱溟	43.00	8.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何 方	39.80	7.00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顾达寿口述 郑少锋执笔	28.00	6.00
党员、党权与党争	王奇生	48.00	8.00
望九斑忆——一位老者的20世纪	白永达	22.00	6.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国家记忆	章卓磐	9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访	38.00	7.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金以林著	48.00	8.00
红墙知情人(一二三)	尹家民	95.00	10.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22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代购代邮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那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从“开国领袖”到“个人崇拜”,从“集体迷狂”到“天下大乱”,本书将带你回到那段永远难以忘怀的历史,去探寻那许许多多令你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一批批党政要员的荣辱沉浮,一位位风云人物的人生百态,一个个知识人群的命运磨难……读这段历史,能使读者清晰地了解“文革”前十年曲折复杂的历史及其经验,真正弄清“文革”发生的原因及其教训。这是一段中国社会主义走向的探索史,更是一段民族的命运史。

《净土》:本书以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为背景,讲述几位知青面对强权、欲望、利益……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主人公们以不同的方式捍卫自己心中的那方净土。

《我的母亲杨沫》:一位母亲的真实一生;一个女作家的里里外外;一段知识分子的曲折历程;一组巨变时代的百态写真……本书直击人性,讲述一个真实的母亲,写出了造成亲情泯灭、母性淡薄的原因,极左政治渗透于家庭后的影响。记录了一个时代和一段历史的悲剧。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作者以极为新颖的方法研究现代中国历史,——通过中国革命的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参加者——那些动荡事件和受其影响的作家、历史学家和叛逆者的眼睛向我们展示了中国革命。本书选取了近现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梁启超、鲁迅、沈从文、梁漱溟、徐志摩、丁玲、老舍等,描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个富强中国的不懈追求,揭示了他们在改良与革命的选择中的心灵痛苦与内心冲突。本书被费正清教授誉为“西方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我经历的 1976 年天安门事件

○ 吴忠 口述 陈楚三 李大震 整理

整理者说明：本文由北京卫戍区原司令员吴忠将军 1986 年夏与陶然女士的谈话录音整理而成。

一、事件的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

1976 年天安门事件的诱因被搞得很复杂，到现在好多人不清楚。我比较清楚或者相当清楚，说完全清楚也不是。

天安门事件的诱因是周总理逝世后悼念的规格。

总理逝世的当天早晨，8341 部队的一个同志曾风（音）给我打电话，说总理去世了，现在心情非常沉重，要我马上去医院。我赶到北京医院，这时总理遗体并没有放在太平间，而是放在里面的房子里，正给总理理发、刮胡子、刮脸，这时人还很少，主要是医院工作人员。大家光流眼泪，谁也没说什么话，人不多。后来穿衣服，邓颖超同志到了。从遗体告别到火化，总理都是穿过去喜欢穿的旧衣服，这是邓颖超同志的意见。穿好衣服后送到太平间，我就回来了。

筹备总理追悼会的工作。遗体告别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我感到不够规格。我问过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同志，过去国家领导人遗体告别在哪里？他说在太和殿、劳动人民文化宫。我想应该在比较宽敞些的地方，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和殿啊，或者人民大会堂啊，为什么不可以呢？

后来在追悼总理的问题上，全国各地，大小单位，都想在自己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是群众自发的。但从中央来了一个精神，不让各单位搞，劝阻群众不要在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我们心里不舒服。你在人民大会堂悼念总理，你在北京医院遗体告别，各单位来的人很有限，摊不了几个人，才三四个人，就是几万人也不行啊，北京 800

多万人哟！你当代表参加了总理追悼会，我呢？群众都想参加总理追悼会，都到北京不可能啊，自己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这不是很好嘛！不晓得是来自中央什么人的指示，很不理解。各单位要设灵堂，可是遭到干涉，干涉来自中央。中央怎么考虑的？为什么在总理逝世的规格上有这个讲究？当时不理解，现在也不理解。毛主席是说了话了还是没说话，说了什么话，根本不知道。对毛主席，我当时有这样一个不理解的地方：总理病重时，我没有听说毛主席去探望总理；但是毛主席把他家的沙发送到总理那儿，这个沙发大，让总理坐得舒服些。但没听说毛主席去看望总理，我的印象中没有，要是有我怎么不知道呢？

总理的遗体告别毛主席没去，追悼会毛主席也没去，我感到很不理解，毛主席应该去。陈毅同志去世，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毛主席去了，影响很好。总理病重，也没听说主席去看望过，当时我就很有想法，这是为什么？是毛主席病重吗？说病重，可是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还不断接见外宾呢？是多次接见外宾。既然可以接见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追悼会？不能参加遗体告别？

规格受到限制，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是从中央来的。群众很不满意，不光是北京市的群众不满意，全国人民都不满意这件事。人民群众这个不满一直受到压抑，一直积压着，酝酿着，等着到清明节。清明节一到，群众是一定要搞大规模的悼念总理活动的。

二、中央要求劝阻群众送花圈

清明节就要到的时候，北京各大单位都在做准备工作。都在准备，准备花圈啊，街上白纸都不好买了，脱销了。各单位群众都在做花圈，花很多钱，群众自己出钱。群众准备在清明节到天安门

广场、纪念碑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怀念周总理。各个单位,各个工厂,各级领导与群众的情绪是完全一致的,部队的干部、战士、机关,也是这个情绪;我个人情绪也是这样,感到清明节群众扫墓、悼念总理有什么不好呢?

群众从4月1日就开始陆陆续续送花圈,不是清明节那天才开始,天天不断,越来越多。这时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从政治局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精神,要劝阻这件事。吴德召集几个书记,我(当时兼任市委第一书记)也参加了这个会,书记也不一定全,传达上面的精神,他也没有说中央是哪个讲的,只说中央的精神是劝阻,劝阻群众,不要把规模搞那么大。吴德同志布置,要我召集各口讲话,通过各级党组织布置下去,要各级党组织做工作,劝阻群众不要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不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

当时我一听很犯难,我说这个会议我不召集,我不讲,你叫倪志福、丁国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同志讲吧,一、二、三书记不讲为什么让我讲?你们召集呀,我分管的是政法系统,专管政法啊,拒绝了。吴德没有勉强我,布置丁国钰同志去召开这个会议,让丁国钰去讲。丁国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讲的四条,说总理健在的时候讲过清明节是鬼节,等等。群众对这四条很不满意,抓住丁国钰讲的四条不放,其实哪里是丁国钰的?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也不是吴德一个人的。

吴德要我布置值勤的警卫战士、公安人员、民兵,如果花圈送到天安门附近,要劝阻一下,劝群众拿回去,不要放到纪念碑那里。我一听更不对了:群众把花圈送到天安门的附近,他能拿回去吗?群众把花圈都扛到天安门附近了,值勤的战士、公安人员和民兵动员他们扛回去,能扛回去吗?不可能的,群众气大得很,战士、警卫人员劝阻,他非要送,这不就冲突起来了吗?我说不能这样布置,当场拒绝了。我说你让警卫战士劝阻,那还不如让各单位党组织劝阻,要各级党组织动员群众不要送花圈。他不送,不到天安门附近来,那就不存在让战士劝阻的问题了嘛!只要送到天安门附近,就不能劝阻,只能协助群众把花圈安放好、排列好,保护群众安全,防止外国人搞破坏活动,防止坏人破坏花圈。当时吴德同志没再



大学生献花圈

说什么,也没勉强我,看样子他理解了我的话。

对警卫部队、公安人员、值勤民兵布置时,我要求:群众送花圈,你们第一要保护群众安全;第二要协助群众把花圈放好,安排得有秩序、不乱摆,要整整齐齐摆好;第三要注意外国人的活动,防止外国人趁机搞情报、摄影,随时与公安局取得联系,制止外国人的违法活动;第四就是保护花圈的安全,防止坏人放火把花圈烧掉,制造政治上的混乱,也发现过有汽油一类的物品。我就是这样布置的,记录在案的,没有说劝阻群众送花圈。布置以后,群众送花圈就没有障碍了,没有人劝阻,排列好,安放好,秩序很好,一点都不乱。

纪念碑摆满了,广场摆满了,一直摆到灰观礼台,也摆满了。再送往哪放呢?和倪志福研究,把红观礼台开放。红观礼台也摆满了,在红观礼台上很醒目,很壮观。过去五一、十一,高级领导人上天安门,军级干部、省军区司令上不了天安门,就在灰观礼台,兵团级干部进红观礼台。群众都知道这些,所以花圈摆上红观礼台,特别高兴,喜笑颜开,警卫战士的态度也非常好。

三、政治局改变决定提前收花圈

4月1日送花圈的还不多,3日、4日、5日多。一方面是送花圈的多,看群众送花圈的人也是川流不息,看花圈上写的字、诗词,有的发表演说。诗词也很复杂,绝大多数是悼念总理的,歌颂

总理、怀念总理的诗词；也有一小部分，不是很多，骂四人帮；也有极个别的，影射、攻击毛主席。再一种情况，确实有少数人混到群众中乱来，他不是悼念总理，而是打人啊，起哄啊，鬼叫、口哨啊，往空中扔帽子、扔自行车，人抬起来往上扔，胡闹，捣乱。另外，也确实有越狱逃跑出来的，刑满释放的，有骂毛主席的，抓住的也有。特别是晚上，我们怕把花圈搞坏了，烧掉了就麻烦了。

花圈最多的时候是4日，清明节。红观礼台4日才摆满。4日白天秩序井然，到晚上确实有一两个人，在纪念碑西南角，离我们小红楼一百多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在那里演讲，公开骂江青。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围得水泄不通。骂江青嗓子都哑了，我们没有向上面反映情况，也没有派人去抓。老实说，骂江青的人我还真不愿意去抓他。江青仗势欺人。我到北京以前在四十军。1968年以前，她在一次会上公开讲，谭震林是大叛徒！我很反感，谭震林同志是不是叛徒，你有什么资格讲？中央做出决定，中央来传达。你不就是毛主席的老婆吗？有什么了不起？刘振华是四十军政委，他就说，毛主席呀，你把老婆弄出来干什么？起什么好作用？破坏毛主席的威信。江青这个人，我讨厌，仗势欺人。所以没派人去抓骂江青的人。

后来，《人民日报》的鲁瑛（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写了一个条子送到在大会堂开会的政治局，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周围很多人，水泄不通，嗓子骂哑了都没人管。江青在政治局会上暴跳如雷。倪志福参加会议回来讲：江青指着陈锡联说“你是司令”，指着纪登奎说“你是政委”，“还有北京的那个二吴（指吴德、吴忠），我们中央的安全究竟有保障没有？”中央会后，吴德给我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嗓子都骂哑了没人管，要立即抓起来，要放跑了拿你吴忠是问！我们相处这么多年，吴德从来没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过话。我想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吴德个人的意思。吴德个人对我吴忠使这么大劲干什么？要拿我是问！我听了有点反感，但要执行啊！接电话后，我就派公安局副局长、指挥部的管纪江（音）去执行这个任务，让他带几个公安人员，卫戍区值勤的戴上袖标，维持秩序，掩护一下，把那两个人抓起来。管纪江带了十来个人出去不久，吴德、倪志福就坐车到我的小红楼

来了；在楼下碰到管纪江抓的两个人正往车上放，吴德问是不是这两个人，管纪江说是；吴德、倪志福上楼来告诉我那两个人已经抓了，然后吴德打电话到大会堂向政治局汇报，这件事情就算了！

但是，鲁瑛写的条子送到政治局，江青暴跳如雷。张春桥强调12点已过，清明节过了，可以收花圈了，把政治局已经定下来的6日收花圈的决定推翻了，4日晚上就收花圈。把政治局原来已经确定的6日收花圈提前两天，这是造成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原因。

据倪志福同志讲，那天晚上政治局本来有个收花圈的议题，已经讨论过了，6日收花圈；如果6日收花圈，天安门事件肯定不至于发生，群众也是要求花圈放到6日，总是要收，不能老放在那儿。议题已经讨论过，通过了，一致意见是放到6日。江青这一大发雷霆之后，张春桥一看手表，说现在已经12点了，清明节已经过了，可以收花圈了！这样就把已经通过的6日收花圈的决定推翻了。华国锋主持会议，你也不说，已经决定了的问题嘛！为什么不说不说这个话？也不知道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那些老同志当时有没有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将近一点钟，吴德回来布置收花圈，我一听就说，不能这样搞，群众第二天一看没花圈，矛盾就大了；他说，啊呀，政治局已经决定了，是执行问题。我说，北京市这样搞，非搞成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当时我就是这样说的。吴德说，中央已经决定了，现在是执行问题，派车吧，北京市派100台，卫戍区派50台。我就把后勤部长找来，他说能派，我也管不了，收就收去吧！

四、群众要求还回花圈引发冲突

这时，陈锡联同志召集会议，要我和吴德去参加。吴德是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我一到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会议已经散了，吴德、纪登奎在那里，看到陈锡联、纪登奎同志，这两人的情绪非常不好，也不知为什么，口里嘟嘟噜噜地说着一句什么话。到了那里以后，有秦基伟同志，印象里有梁必业，陈锡联是主持军委工作的，还有我、吴德。陈锡联讲了两件事。第一讲情况，说南京、成都、太原、重庆，是发展的趋势，南京不是群众游行吗？保定很乱，保定离首都很近，对首都威胁很

大,意思是说事态在发展。第二,凡是调到北京境内的部队,统一由吴忠、卫戍区指挥,部队往北京调由军委下命令,命令由军委下,只要进北京境内就由吴忠、卫戍区指挥。

我和吴德回来,路过天安门广场,天已麻麻亮,花圈还没有收完。我回家睡觉,还没有睡着,警卫处副处长张冠金(音)打来电话,说王洪

文到了小红楼,我听了没说马上去,也没说让张冠金记录有什么指示,继续睡觉。前几天碰到张冠金还说起这事,他说没错,我没说去,也没让他记录。要是换个人还要分析,比如陈锡联到了小红楼,我保证去,要是华国锋到了小红楼,我还要考虑;王洪文到那儿,我还真不去。那天晚上我也没怎么睡,迷糊了一会儿,快到八点钟,我估计情况很严重了,得出去看一看了。

八点钟的样子,我到了金水桥前的华表位置,国旗杆的地方,一看纪念碑的台阶上,站满了穿黄军衣的战士,个子又高,四面人墙。我感到很难看,搞四面人墙干什么?我就到纪念碑台阶上,曾绍东同志在那里,是管警卫的副司令,我说老曾啊,我看了非常难看,赶快撤掉。他说,送花圈要往纪念碑挂呀。我说你让他们挂啊,悼念总理嘛,纪念碑台阶守着干什么,又不是阵地,赶快撤了,群众影响不好。他就撤了。

这时公安局的宣传车、广播车已经被群众推翻。接着群众涌到大会堂东门,人很多,要花圈,把警卫团的一个参谋也打伤了,我留下来处理。电话很多,刘坚(音,大会堂负责人)的电话,说紧张得很,参谋也打了,怎么办?告急。汪东兴也打电话,说群众冲大会堂东门。一会儿,张耀祠打电话,说吴司令啊,大会堂情况很紧张,你要保护大



人们拥挤到人民大会堂前

会堂的安全。张耀祠的电话引起我很大注意。他在毛主席身边,是自发给我打电话,还是毛主席知道了情况要他打的电话?但他没说是毛主席让打的。我想,恐怕毛主席知道了。于是就找马小六,动员民兵维持秩序,让群众下来,不要把冲突扩大。民兵出去,一点反应都没有,民兵的情绪和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的情绪是一样的,让他们动员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下来,一点效果都没有,我们不能让民兵强制往下拉呀!一是民兵可能劝说了,群众不听;另外民兵也不卖力气去劝说,情绪是一样的嘛!我一看一点效果也没有,人越来越多,广场越来越乱。我回到卫戍区礼堂,把管警卫的一师、二师领导找来,曾绍东也反映这个情况,邱巍高副司令也反映这个情况,当时一师、二师的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

事态继续发展,警卫一师、二师维持秩序已经没有能力了。他们站岗、放哨的部队已经展开,卫戍区站岗放哨的部队11个团,本来机动力量就很少很少,维持不了这个秩序。这时吴德来了,还有杨俊生同志,吴德主持我们几个在场的副司令、副政委开会研究,是否调三师、四师进城,不进城维持不了秩序。吴德同志要我给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打电话,我直接给陈锡联同志打电话,说警卫一、二师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但事态

一直在发展,冲东门的情况还没解围,我们研究调三师、四师的部分部队进城,维持秩序,都是徒手。陈锡联同志同意,说可以调三师、四师部队进城,调多少,你们和吴德同志研究。做好计划后,分三批调进五六千人。但冲东门的问题还没解决,你不能往下拽啊!几千民兵维持秩序,也没法制止。这一天群众不是送花圈了,是要花圈。把花圈搞哪儿去了?汪东兴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能解决冲大会堂东门的问题,我说下午两点吧!组织力量还要时间……两点后还没解决你再找我。其实不到12点就解决了,一个日本人在里面照相被发现了,群众把照相机夺过来,拉出胶卷曝光,打他,日本人往历史博物馆跑,群众“哗”就冲向历史博物馆,大会堂东门就没人了,就这样解决了问题。有人说:花圈在中山公园。群众又涌向中山公园了。

五、一伙人闹事烧车烧楼

后来情况发展越来越厉害了,确实有一伙小流氓,砸汽车;中午给公安、民警送包子馒头的车被搞翻了,包子、馒头洒得满地都是,还有人叫好,这伙人越闹劲越大,接着烧汽车,一下子烧了四辆汽车,是民兵指挥部的、公安局的,在小红楼指挥部停着的;自行车就烧得多了,踩扁、砸烂。以要花圈的名义,翻汽车、烧汽车。当时群众就有议论,烧汽车这不对呀!接着又往指挥所小红楼扔砖头,砸玻璃,把自行车零件拆下来往上扔,楼下是一家老百姓,他们把老百姓家的煤气罐搬到门口,打开煤气罐点火,把小红楼的门烧着了,烧自行车、烧汽车,接着就烧房子。这个小红楼是警卫一师十三团第三营的营部,第九连驻在这儿,连部、营部,一个连的部队,担任天安门广场警卫任务。煤气罐一烧,小红楼的门烧着了,楼也就烧



这张照片名为《团结起来到明天》,画面呈现1976年“四五运动”中一群人臂挽着臂从人民大会堂东侧向天安门广场中心地带前进,作品在“人民总理为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大型摄影展中获得一等奖,摄影者吴鹏。

着了。小红楼二楼是洋灰地,烧着不容易,但烟子呛得够呛。这时有卫戍区的曾绍东、邱巍高,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还有公安局的一些同志在。曾绍东向我报告楼烧着了,楼口上烟雾很大,虽说底下着火,楼上的人很沉着,没有乱动,玻璃都砸光了也没有乱动,继续在楼上坚持。如果火烧上去,楼梯一烧,楼上的人下不来,会把指挥部的人烧死,我直接打电话请示华国锋,说指挥部楼已烧着,要撤出来继续工作,华国锋批准撤出。军队的习惯,指挥所转移要向上报告,我直接报告华国锋,他同意了。我就给曾绍东同志打电话,要他撤出来。

华国锋同志还向我问一个问题:冒白烟的是什么?我说看不清楚,不知道。我在卫戍区机关,隔着公安部、历史博物馆,怎么能看见呢?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看得清楚。我说会不会是烧汽车轮胎、自行车轮胎冒白烟?华国锋说不像。我让曾绍东撤出去,要历史博物馆警卫三师的一个营,胡世寿同志带的这个营,胡世寿当时是副师长,我让他掩护指挥所撤出去,维持秩序把群众隔开,清一条路让指挥所撤出来。胡世寿这个营出去了,围着小红楼把群众隔开,曾绍东他们是从厨房的窗户那面墙撤到邮电局里面去了。这时楼上不知怎么搞的还有个卫生员,卫生员打了一次电话。后来他们报告,有些人上了二楼,抢东西,抢武器,搬武器弹药,卫生员报告的情况。我告诉胡

世寿把楼围住,不让这几十人跑掉。他们上了楼就抢东西,把抢来的东西捆的一大包一大包地背下来,下来一个抓一个,他们还偷了一把手枪。着火的时候就告诉小红楼的人把武器弹药拿下来,不要被烧掉。指挥所撤下来以后,那些上楼的人不能叫他们跑掉,这不是对曾绍东讲的,是给胡世寿讲的,这时曾绍东已经不在指挥所了。这20多人就是这样抓的,28个,战士们非常熟悉这20多人,说烧汽车、翻汽车、烧房子就是这些家伙,不知道名字,但就是他们,可抓住了。小红楼那28人,叫公安局审查,他们烧自行车、烧汽车、烧楼,抢东西都是他们,打了一天交道了,名字不知道,但就是这些面孔,留着八字胡,穿着胶鞋,一看就是小流氓。

这20多人抓了,但是直到天黑,广场上的人还很多。

六、政治局决定包围天安门广场

这时毛主席有指示了,传达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又打、又砸、又烧,性质变了。华国锋当时在大会堂。吴德同志回来传达的。

到下午四五点钟,中央要吴德讲话,用有线广播。吴德让刘传新起草,自己修改后送中央。据吴德讲,毛主席看了,批示说照办。退回来就在广场的有线广播上广播吴德讲话。五点半开始广播,让群众离开,不要上坏人当。这时群众很多,有的听了很反感,“我来广场,哪个坏人给我任务了?”看这个架势,是要抓人了,很反感。天快黑了,吴德讲话过了很长时间了,吴德从政治局开会回来,政治局开会决定镇压反革命,包围天安门广场,抓坏人。开会时就从大会堂打电话调动民兵了。据吴德讲,开始王洪文说要调20万民兵,最后确定调10万,实际落实的不到5万。吴德回来传达中央决定,民兵10万布置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安干警布置在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和西交民巷,卫戍区的警卫部队也参加,还是上午维持秩序的那个部队,布置在历史博物馆,小红楼周围。行动时间是八点半。

镇压是中央决定,还有毛主席的话,八点半开始。考虑到卫戍区礼堂看不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还不如政治局了解情况及时,他们在人民大

会堂一窗之隔,看得清楚。这时政治局有多少人在人民大会堂,我不清楚。我知道陈锡联在那里,他老给我打电话。其他哪些人在不知道,华国锋可能在,“四人帮”什么人在不知道。吴德同志对我说,你到历史博物馆,就近观察情况,部队八点半行动,由你来通知。我不就成了现场指挥了吗?

我带了王秘书,穿过隔离带到了历史博物馆,博物馆领导安排我们在二楼(或三楼)一个有电话的地方。我是打着手电筒从公安部过去到历史博物馆的。警卫一师指挥所也在历史博物馆。田占魁同志也在那里。我先到田占魁的指挥所了解情况,一看人很多,接着上楼找到看得清楚、有电话的地方,我的指挥所就在这里,王秘书一直在这里,我有时离开也不远。

七、把包围广场时间推迟两个半小时

八点半钟快到了,广场上人很多,开灯是八点半前。政治局研究时,开灯是王洪文的意见。开灯就是要采取措施了,让群众离开,减少人数。开灯和吴德讲话,都是为了执行八点半包围广场的措施。

广场的最大容量是42万人。我看到广场密密麻麻,是几十万人,绝对不是几万人,不能动,四面包围非踩死人不可!我想回卫戍区礼堂给吴德同志提建议推迟时间。又一想,八点半是中央的作战命令,我去提建议,书记在场的有丁国钰、倪志福、杨俊生等同志,吴德主持会议研究,能做出一个决定推迟时间?不执行中央的八点半,执行北京市委推迟时间的决定,吴德做得到吗?做不到!讨论的结果很可能是坚决执行中央决定,提这样的建议还不如不建议。你建议了,也讨论了,请示了,报告了,决定是坚决按八点半执行,你还敢推迟啊?我一想,干脆谁也不请示,谁也不报告,就是不动。

我派警卫一师的副师长张志民(音)同志看看广场还有多少人,一看不得了,还是人很多,什么时候人才能减到最少的限度呢?我想只能推迟到11点。11点是北京市公共电汽车的末班车,你不离开广场就回不了家了。

果然,11点以后,广场上看不到多少人了。我又派张志民同志再去看一看,黑暗的地方看仔

细点，不要出动时一下又出来几千人就麻烦了。他回来说，确实没有了，只有纪念碑台阶上坐着一圈人。八点半到11点之间，陈锡联同志给我打电话很多，说你不动啊？广场上没什么人啦！我心想，你要广场上那么多人干什么？我想减都减不下去呢。我认为他在说胡话。那天我去倪志福同志处，倪志福同志说华国锋不满意，说“人都跑光了！”我就不明白，他们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就没想到人多会踩死人吗？我看是没想到。

11点以后通知部队、公安、民兵出动，我跟着卫戍区部队包围纪念碑台阶的人，这时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民兵还没过金水桥。我也来到纪念碑台阶下，没见到打人，要有我会制止。我问刘传新和公安局其他同志，你们清查，查到多少人？他们说查过了，不到150人，怎么处理？我说两条：第一、什么人留下审查？带凶器，带反革命传单的留下审查。第二、未带凶器、未带反革命传单的问清单位，打电话查对清楚确是该单位的人，要单位领回去，或天亮前放掉，有事找他，没事就算了。公安局后来留下审查的人，不到50人，是不是带凶器、带反革命传单，我就不太了解了。但我规定的是这两条，我的意见是，没有理由说围住的人，围在纪念碑台阶上的，就是坏人，凭什么说人家是坏人？带凶器、带反革命传单的，是嫌疑，要审查。就是平时在百货大楼，碰到你身上带一把刀，公安人员也要把你叫到一边，问你带刀干什么？何况镇压反革命。我认为这样一过滤，筛减一下，人就少了。纪念碑这几个人，你就蹦八丈高也踩不死人。这样我们缩小了抓人的面，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围了人就抓、就关，那不对。

还有就是，我布置把汽车被烧的残骸赶快拉走，天亮前拉走处理掉，现场打扫干净；小红楼赶快修好，油漆好，恢复，要马上进行，恢复得比原来还要好看。布置完后吴德打电话，我说不到150人，报告了两条处理办法，吴德听了后说好，就这样执行。如果吴德有新的意见，我还可以再按他的意见办。为什么汇报那两条处理意见？我可以先问吴德，困住的150人怎么处理。他可以随便答复，“不要放走，审查清楚了再放走”，他要这样说就全部留下来了。我决定的两条不是全部留下，不是不问青红皂白，是筛减。

刚搞完回到卫戍区礼堂，政治局打电话通

知，要吴德、倪志福去开会，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吴德要我和刘传新二人也参加，可能是他报告政治局要我二人列席会议。走到门口，吴德同志说，唉，时间搞晚了，这问题汇报时怎么解释一下。我们统一了口径，这是礼拜天，民兵集合得晚，挨家挨户叫，所以晚了；另外，车开出来，到处遇到红灯，车队七零八落，到得晚了。吴德说好。其实我准备了腹案，推迟了两个半小时，我不考虑还得了？

他们上车走了，我找我的司机大李，他到市革委会地下室吃夜餐去了，结果晚到十分钟。但会议还没开始，也可能是等我，反正还有其他人没到齐。毛远新做记录。我到了后汇报就马上开始。叫刘传新汇报，他讲得比较长，详细汇报。他汇报完后吴德同志问我有什么补充，我讲了三个事情：第一就是解释怎么晚了，说今天是礼拜天，民兵集合要挨家挨户叫，再就是车队出来到处碰到红灯，车队七零八落，还有的走错了路，耽搁了。王洪文就插话，应该搞个标志，车队出来处处开绿灯车队就不会散了。我接着讲，到得早的民兵也有，市财贸系统民兵，有几千人，但这部分民兵绝大部分是女民兵，执行这样的任务有困难。我把情况主动做了解释，也没有追问我。第二讲烧汽车、烧房子的十几个人抓住了（当时还不知道有20多人），是一伙小流氓。张春桥说，是流氓犯罪吗？我说当然，烧房子、烧汽车是犯罪。还讲了一件什么事记不得了，好像讲了三件事，很短。

后来江青、王洪文几个人讲，搞什么水枪，往脸上喷啊，外国警察不是用水龙头对付群众嘛，七嘴八舌。我一去就看华国锋不大高兴，不理睬我，我也不在乎。这天晚上就这样结束了，并没有打死人。打伤人可能有，但我在纪念碑那里没听到打人唧哩哇啦叫，相信拳打脚踢会有的，为什么？公安局老毛病，抓住小偷先揍一顿。我经常批评他们不能这样，是不是小偷你没搞清楚，怎么能打呢？打人、打伤人，不是那天晚上，是1日、2日、3日、4日，公安人员盯梢，有说反动话的啊，群众也搞不清楚，和公安人员冲突，打起来。5日晚上包围天安门广场，民兵打人我不相信。民兵没赶到，来的时候已经围完了，他打谁？另外民兵的情绪叫他打也不打，因为民兵不满这件事。■

（责任编辑 洪振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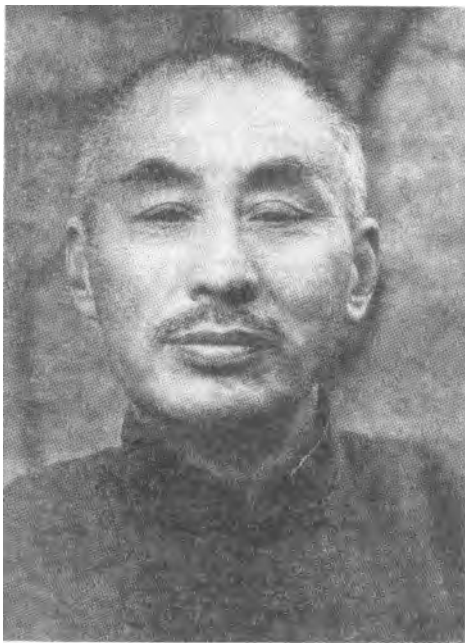
叶圣陶日记中的出版总署“三反”运动

○ 叶永和 蒋燕燕

1952年，叶圣陶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在日记中他记录了出版总署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展“三反”运动的整个过程。

一、“我署系统运动不甚佳”

1951年底，出版总署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的动员，当时预计整个运动会在第二年的2月份结束。在1952年的元旦新年团拜会上，毛主席在祝辞中说：必须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进行此项运动，务必消灭“三反”分子，取得新的战线上的胜利。第二天在出版总署传达的中央文委节约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据估计已知贪污浪费之总金额可抵飞机大炮捐献（指抗美援朝）总额之三倍，可修若京汉铁路之铁路三条。一方提倡增产节约，一方有如许大之漏卮，而欲求其有成，诚不可想象。故必去此大病，而后增产节约乃克有功也……毛主席认为‘三反’运动为当前最重要之务，于各部门之不甚重视此举者颇不满意。甚至谓如不贯彻此事，则共产党将不成其为共产党。限令在新年十日之内，未发动者立即发动，已发动而不深入者立即进求深入”。（1952年1月2日叶圣陶日记，以下标注日期者均指叶圣陶日记时间）叶圣陶从总署署长胡愈之处得知：“此次鼓动商界坦白，凡纳贿于人者须自说出，否则纳贿者与受贿者同样科罚，迄今纳贿在千万元以上者已有千数起。此千数起之受贿必为机关人员无疑”。（1月5日日记。此处“千万”



1950年叶圣陶在东总部胡同10号出版总署院内

元”为旧人民币，1953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发行新人民币，新人民币1元=旧人民币10000元）

胡愈之在会上号召出版总署及直属各单位加紧动员，务必使这次运动具有群众性。而负责人要以身作则，多作自我批评，以启发群众的积极性，打破群众的顾虑。为加强党对出版总署的领导，中央文委派陈克寒（原任新华社社长）任总署副署长兼党组书记，并主持“三反”运动。

出版总署的这次运动，由高层至中层的各级领导，自上而下地自我检讨了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一次次

地在大会上做检讨，接受群众的批评，检讨通不过者再做检讨。作为出版总署的最高领导，胡愈之的检讨是经过领导层多次讨论修改而成的。胡认为：“自己检讨，以达成思想改造。又谓昨所以拟自我检讨稿，于自己多所责备，意盖在于‘破’。不‘破’则不‘立’。欲以二三月之时间，完成‘破’与‘立’之工作”。（1月18日）

叶圣陶也作了自我检讨。

在此期间，中央领导在各次会议及“三反”运动的报告中，都多次强调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意义。薄一波在报告中说，“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之危害在两方面。一方面为经济，如任其危害，则资金无由积累，工业化即谈不到。一方面为腐蚀干部，使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直至脱离革命。故此为有关革命成败之根本问题，必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后已。……运动之方针与政策，号召坦白检举，立意改悔。……可以取得胜利之条件有

二：人民与人民政权一致，此其一；干部均动员起来，检讨工作，批评自己，此其二”（1月9日）。在另一次报告会上薄一波说：“言工商界腐化干部之行动，几乎无微不至，皆有显例。次言官僚主义之领导实为滋长贪污浪费之源，故官僚主义必须反对”。周恩来总理在其后总结说：“官僚主义实即麻木不仁，不动脑筋。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名甚忙迫，实则忙于事务，即为事务所蔽，脑筋亦即糊涂，糊涂而后，即予资产阶级思想之侵袭以可乘之机。必须理论修养与实际结合，官僚主义乃可根治云云”。（1月12日）

当时，叶圣陶对这场运动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这是“共产党之批评精神”，让“群众尽可畅所欲言”，而“出版总署之新机即在于此”。

但是运动一旦开展起来，往往会变得偏激，有人认为运动“必须轰轰烈烈，激昂慷慨，乃为发动群众也”（1月10日）。也有人别有用心，“以煽动之口调，意谓我人心存偏袒，致使群众尚存顾虑”，造成会场“喧嚷甚久”而“转移目标”（1月11日）。据说“有若干机关，已走入一般的反领导，凡处领导地位者无不受反对”。叶圣陶对此颇为忧虑，认为“此点甚须防止”（1月10日）。

在反对官僚主义之际，坦白交代和检举贪污行为的工作也在同时进行，但是这些运动进行的并不像领导自我检讨官僚主义那么顺利。

开始，人教社召开了坦白检举群众大会，“群众为坦白检举，所言贪污之数皆细小”。“总务科三人皆有贪污行为，群众喝令当众坦白，而琐屑谈许久，殊无所获。后令材料科中人自白，亦复赖得干净”。叶圣陶认为：“于此见发动群众固不易，发动而后加以领导，使趋向正轨，则难之又难”（1月11日），“我社检查组尚未获得比较重大贪污浪费之端倪”。

1月17日，陈克寒在传达中央文委节检委的指示时说：“此次运动为激烈之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之思想行为向革命阵营侵犯，其具体表现为种种之贪污，今必坚决反攻，克敌而后已。最近十天内发动一个最高潮，务必检出大贪污分子及案件。文委谓我署系统运动不甚佳，群众虽已发动，而劲头不大。”会上胡愈之提出“须重行动员，于动员报告之中包含自我检讨，庶可使群众奋起，共为击敌之战士”。

二、“集中火力，向贪污分子进攻”

1月19日出版总署召开动员大会，胡愈之说：“今后一星期中，将为最高潮，一致集中火力，向贪污分子进攻。甘愿坦白者勿失其时，否则被人检举而后，难期宽宥”。担任会议主席的叶圣陶讲了以下一段话：“今日此会，共坚‘敌视’之心。无论己不贪污者，贪污而愿坦白者，本此‘敌视’之心，即可团结一致，集中火力，向顽固不化、不惜以身试法者进攻”。由此可见当时出版总署的领导层对反贪污运动的决心和意愿。

1月20日，出版总署的党组书记辛安亭传达了薄一波的重要讲话，叶圣陶在日记中作了记录：“谓新年以来，‘三反’运动进展而有获。一般人已信共产党不会腐化，缘其有决心，有办法，又有自我批评之武器。于资产阶级思想之恶劣一面，亦有进一步之认识。国内外反动派本在等待共产党腐化，然后乘机捣鬼，今此企图，虽反动派亦知其无望。由此运动引起机关内之民主改革，视三年来任何一次为深入。此次运动比土改尤为复杂，缘资产阶级之种种办法，其心思技巧胜于地主。移风易俗已见诸事实，消费华奢、铺张浪费之习颇见消退。北京中央机关犯贪污者，已知之数为万人，其中贪一亿以上者十八人，一千万以止者三十余人。天津一地，人数与钱数更多。未谓目前围攻贪污分子之局已成，一星期内集中火力，必将有大贪污犯继续发现云。”

1月21日下午，出版总署召开了坦白检举会，会中宣布“一轻贪污分子免究，令其当众保证不再犯。次为三个贪污分子坦白，一人贪三千余万，二人各贪为五百余万。其手法皆为偷盗存书，贱卖于同业”。然而“群众咸不满意，纷纷指摘，‘坦白要彻底’之呼声时起。所谓集中火力，于此乃有具体之感觉”。结果宣布“限此三人于近期内彻底坦白，暂时禁止其自由行动”。

1月22日下午，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总署三个单位联合召开反贪污的坦白检举大会，为了能获得比较理想的效果，领导层在上午对会议应该如何进行做了三个小时的讨论。叶圣陶在日记中记下了陈克寒的发言：“此次集中于主要之贪污分子，必须弹无虚发，发无不中。”

三单位皆未能做到真个心中有数,意谓今日之会仅能收鼓动之效,以群众之压力,促使贪污分子知所恐惧,甘愿坦白。余则布置某些人任其登台当众坦白,某些人态度老实,坦白较好,可免予以法律制裁;外则某人由某人检举,以引起群众之检举。开会势必有此布置,乃可规正方向,不至散漫”。这大概是采用了延安“抢救运动”的经验。

下午一点半大会开始,尽管作了准备,大会还是进行得不尽如人意。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先令贪污分子数人坦白,皆前此已经坦白者,无新发见。宣布其中三人可免受法律制裁。次为检举。登台者云检举某人,其人即须登台面众而立,此亦心理作战之一法。一人被检举,即有若干人登台揭发其人之可疑处或不检处。声势殊盛,形成高潮”。但是,会场并未出现预期效果,“迄未有一人当场彻底坦白,所发之弹多未击中要害。此为今日之会之大缺点”。致使最后不得不宣布:“凡坦白者未坦白者,务须于廿六日以前交代清楚,过期即作为被检举论罪”。

1月24日,陈克寒第二次传达了中央文委节检委的报告,报告中说,“目前在中央范围,已发觉大贪污犯贪污一亿元以上者(所谓大老虎)五十余人。估计尚有百许人,故攻击大贪污之斗争尚须延后,至2月10日止”。会上定于2月10日前必须分别负责,检出各单位中的大贪污分子。胡愈之在再次的反贪污动员大会说:“打大老虎,比之于战事,今后一战为淮海战役”。

为了给反贪污运动大造声势,中央决定2月1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公审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开设临时法庭,审判大贪污分子七人。出版总署三位领导胡愈之、叶圣陶、乔峰均参加了现场会。当天,叶圣陶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场中满座,据云数在五千人以上。十一点,刘景范(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委员会第二书记)致开会辞。于是沈衡老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就席,审判开始。贪污犯七人立于台前,面向群众。对于每一贪污犯,由其所属机关之一人控诉其罪行。控诉毕,沈衡老宣判,两人处死刑,曰薛昆山、宋德贵。薛为商人而钻入国家机构,盗窃国家资财者,宋为共产党员而受资产阶级腐蚀以至于犯罪者。以下三人处徒刑十五年、七年、五年,后二人皆暂缓执行,以观后效。未二人坦白彻底,诚心悔改,交出赃

款,并愿努力为人民服务,则宣布免于法律处分。

会场上“口号时作,东起西应,声势壮大。座中当不少坦白而未彻底者,或隐匿而尚未坦白者,睹此具体之事实,政府之政策已非常明白,谅必有动于中,知唯有彻底坦白乃为生路矣”。

2月7日,陈克寒再次传达了中央文委节检委的报告,说中山公园公审大会以后,打击大贪污分子的工作“颇有进展”,但是“打击大贪污分子,困难亦多”,“一难在材料不充分,二难在人力不足”。中央指示:

大贪污必须全部肃清,不肃清不休止。中小贪污亦须扫清。兹于所谓大老虎下定义:(一)贪污一亿以上者,(二)贪污虽不逮一亿,但使国家损失甚重者,(三)一亿以上之集体贪污之主谋者与组织者,(四)五千万以上之贪污,其性质至为严重者,(五)窜入之坐探,使国家损失一亿以上者,(六)解放初期接收物资及官僚资本,吞没至一亿以上者。

陈克寒还传达了文委节检委的规定:“本月十五日以前,我署系统内尚须打到大老虎八至十只,中小老虎二十至三十只,请各单位自认其数目”。为所开展的运动设定被打击对象的数目,在党的历次运动中,这恐怕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2月7日,人教社开文委节检委员会,讨论经理部新建房屋中的贪污问题。经检查断定,其中偷工减料,损失在一亿左右。监工为赵××,但是否受贿,尚未查明。对于印刷用纸,叶圣陶写道:“纸张问题方面,料知我社前身华北联合出版社时期有毛病,但初成立一年间,并账目而无之。必须从外界之材料稽考,乃可探得线索。而外界材料尚无从探得”。对于上面布置的任务,叶圣陶颇感为难,2月15日期限已近,“总得着力,乃可于期前有获”。

2月12日,人教社召开全体大会,“仍申追究贪污主旨,继发表小贪污而坦白彻底之五人,免于法律处分。诸人皆填写坦白书,记其贪污之迹,复自写保证书,表示以后不再犯。令各自诵其保证书,并当众签名其上,以示郑重”。然后群众对××作斗争。××在华联时期管印刷,已有所坦白,但大家认为坦白不彻底。××不服,有一些反抗言论,“诸人诘之,皆不承认”。最后由叶圣陶

以节俭会的名义宣布，“令其停职反省，予以三日之时间，此为最后之机会”。

三、“重作整顿，认真应敌”

2月15日，胡愈之传达了中央节俭委的报告：

自本月一日至今日，反贪污之情况为成绩甚大，战况艰苦。从开始算起，中央各部门已获大老虎477只，小虎962只。近日打获之虎往往成一窝，故其数目逾于先时之估计。唯其成窝，打时不免吃力，因而作战者流于急躁，或致过火。迄今为止，各部门领导尚须克服右倾思想。以贪污为未必多，少获即欲休止，皆右倾思想也。中央之方针，打虎必须彻底，不彻底不止。今决定再搞一个月，迄三月十五日尚有可打，则再事延长。策略方面，今后将自斗力而转为攻心。以五日至七日为整顿时期，作以下四事：（一）总结经验（二）整饬队伍（三）调查研究（四）暂时不理已打出之虎。至于坦白期限，原定以今日为止，今亦不复展期，不复言截止不截止，贪污者愿意坦白当然任何时均可。对于管制反省分子，各机关已有不少，今须加以清理，解放一批情节较轻者，令其立功自赎。关于政策方面有四点：（一）大知识分子及专门技术人员之贪污者，争取其自省坦白，尽可能不处死刑，以保人才。（二）于撤职及看管之贪污分子不能复视如机关人员，不能照平时待遇。（三）须大胆使用俘虏，其确能立功者，可告以负责建议，免予刑事处分。（四）赃款赃物之可收还者应立即收还。

有了中央节俭委的这个决定，2月15日就不是运动的最后期限了，出版总署又续定了半个月的计划。

2月16日，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出版总署有“吐露端倪者，有坦白未经坦白之事实者”。有几人在检讨中说“与私营书店有关，或为审稿，或为撰稿，或为组稿”，这些人在“思想上皆有问题，皆于业余为私营出版家工作”。“诸人皆自言不自检点，为私营书店所利用，失其革命干部之立场”。陈克寒对以上种种行为做了结论，“谓出版总署人员代表国家与人民，对私营书店应有领导与管理之观念，忘此一层而徇私，遂生种种谬误。苟为读者群众之利益，撰稿亦非谬。如纯为稿酬，

粗制滥造，即为非宜。或假此而相与勾结，则为丧失立场，绝无可恕”。陈克寒的这番话，使叶圣陶有所醒悟，“‘三反’运动之初，以为编辑部门殆无可反，今此事显然亦为资产阶级进攻之例，自当加以讨究也”。进而检讨自己，认为自己不适合做领导者：“据人告余，他们以为来我社颇合他们之脾胃，因余事事不大过问，社中政治空气不浓，深合他们自由散漫之性习。余之疏简，乃生此不良影响，亦初所未料也。余固自认不宜为领导者，此是又一证明。若谓勉为之而适于为领导者，恐将河清难俟矣。”

经过努力，编辑部门终于查出了六七个有问题的人，每个人安排五六个人负责，专搞他们的贪污问题，“务必彻底究明而后已”。

2月17日，出版总署节俭会讨论认为：“谓我社以往认识敌情不足，总以为贪污情形不严重，又存早日了结之念，故可谓实未认真作战。今既了解此举在反击资产阶级之进攻，必须彻底肃清贪污，一切工作乃有可为，自必重作整顿，认真应敌。次谈自今日至月底之工作计划，分为两个阶段，以五天整顿内部时期，分工负责，认定贪污对象，多作调查研究。于积极分子加以教育训练，如何发言，如何保密，如何查账，如何访问，皆须为之指点，务使言不虚发，动必有的。”

于是准备自24日到月底，认定目标集中战斗，务期搞它个水落石出，让老虎就擒。

时间已到2月，叶圣陶必须着手制定下半年中小学生的课本了，而且时间相当紧迫。但是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编辑都投入到运动中去了，对此他颇感无奈，“于此中实无能为力，以职务所关，不得不参预其事而已”。

随着“三反”运动的逐步深入，胡愈之、叶圣陶和傅彬然等老开明人，开始考虑他们手里尚有的开明书店的那点儿股份了，认为“今后至少须与私营割断关系，服务公家者不能与私营有瓜葛”。可这些股份该如何处理，是个大问题。建国前他们都是开明书店的职员，都给开明书店写过稿子，当时开明书店发不出稿费，就把稿费转为股份分给了大家，没想现在却成了“烫手的山芋”，不知该如何处置是好。叶圣陶在日记里写道：“我三人皆为开明股东，此一点首宜使众周知，其次则宜自表如何处置此股份”。“愈之言拟

捐与公家，或则由总署收购，作为公股（此点甚不妥），结果未有所决”（2月18日）。为这件事他们商议了很久，却一直拿不出个主意。好在一年以后，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国有的事业单位，这些股份没有用了，这反倒帮他们了却了一个心头之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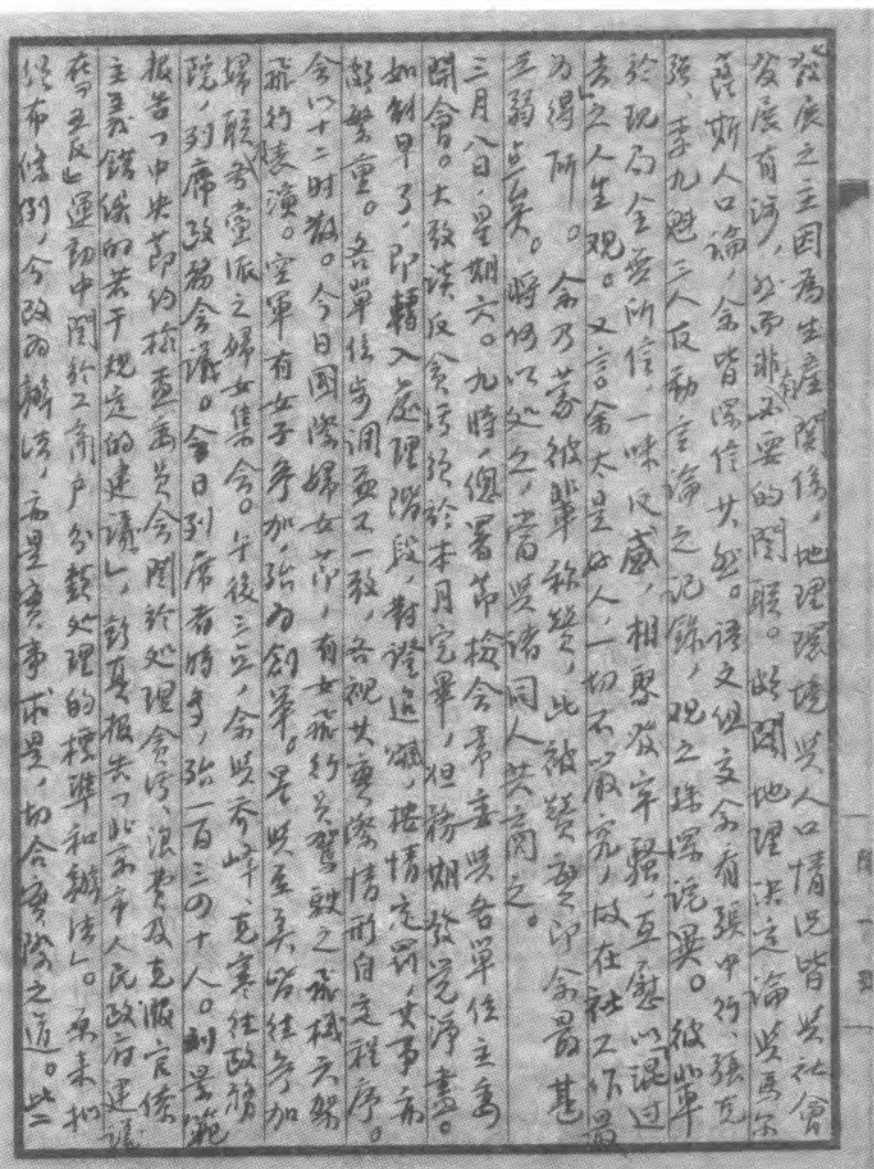
2月21日，文委召开了所谓的“武松大会”，“盖既以贪污分子为老虎，则打虎有功者为武松，会集一堂，共谈经验，将有裨于今后之搏斗”。“领导者必须彻底排除右倾思想，确认敌人之存在而且顽强，乃可萌发斗志”。

2月28日下午两点，出版总署召开大会。有“二千数百人”，“处理贪污分子四人，三人均从宽处理，一人因态度不好，由公安机关逮捕。又其次各单位检举贪污分子，被检举者立于台上，当众低头。当即有十余人愿彻底坦白，则由各单位

人员邀至场外谈话，不必再登台当众受窘”。叶圣陶以为“今日之会成绩大佳，自‘三反’运动以来，未之前有”。

3月8日，出版总署的各位领导出席了政务院召开的政务会议，在会上宣布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的建议》，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议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叶圣陶认为“原来拟颁布条例，今改为办法，亦是实事求是，切合实际之道……苟先布条例，即为硬性之法律条文，按之实际案件，必将有窒碍难通者矣”。

会上刘景范作报告说：此次中央机关及其直



叶圣陶 1952年3月8日日记，内有“三反”内容

属机构参加“三反”运动者十六万六千人，其中贪污分子三万一千余人。贪污在一亿以上者849人，占百分之三弱。千万以上不满亿者2875人，占百分之九强。百万以上千万以下者4789人，占百分之十五强。百万以下者22789人，占百分之七十强。拟定办法时所据以重轻者凡三项，一为贪污之钱数，二为其行为之危害性，三为其人对“三反”运动之态度。办法中定不满百万者不以贪污分子论，且不受处分，不退赃款。其他危害性不大，态度好者皆从轻，反之则从重。

彭真在报告中说：“处理违法之原则有五项，系毛主席所定：（一）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二）多数从宽，少数从严；（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四)工业从宽,商业从严(五)一般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行贿之举,占违法工商中百分之二十六强。行贿与所获非法利润之平均比例为一与十九。”

最后由周总理作总结,他在谈到“三反”“五反”运动的目的与任务时说:“(一)改造私营工商业(二)改造国家工作人员(三)树立社会新风气(四)建立各机构之健全制度”。周说“工作人员中今有百分之二十犯贪污。犯贪污之工作人员计分:(一)蜕化之老干部(二)包下来之恶劣分子(三)新招收人员(四)钻进来之坐探。工作人员贪污之处理严于工商界,但亦以改造为主……有人反驳资产阶级腐蚀干部之说,据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语。其实乃虫生而后物腐……”

3月16日下午,出版总署在劳动剧场召开了“第一次处理贪污分子大会”,首先“宣布处理贪污百万以下者二百余人,依据《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此辈不受任何处分,且可不名为贪污分子。复处理贪污百万以上千万以下者数十人。依据办法,此辈但受行政处分,不受刑事处分,酌退赃款或全退赃款”。然后“从事坦白与检举。若干贪污分子要求坦白,一一任其当众发言,随即予以处理,或可从轻发落,或尚须争取诚实。最后由北京市人民法院拘捕一坚不坦白之人,会以此最高潮阶段结束”。

四、出版总署自立人民法庭

4月1日,出版总署的节检委员会组织成立人民法庭,确定胡愈之为审判长,叶圣陶与陈克寒为副审判长,以处理贪污千万以上之贪污分子。叶圣陶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个人法庭所行使的职责,态度郑重而严肃。他说:“人民法庭判处贪污分子必须严肃从事,凭确切可靠之材料,作权衡至当之判断,乃可使犯者得所戒,群众亦从而受教育”。“反贪污运动成功与否,视人民法庭之工作如何。而各单位已交来之起诉书十余份,大多叙事不精确,行文不严肃,颇违斯旨。因讨论应如何写起诉书,而在动笔之先,尚须再行深入研究案情,乃可下笔有据”。

出版总署的人民法庭原计划开庭六次,每次由不同的审判长主持。从第一次开庭起,以后间隔

一日或间隔两日开庭,但其间并没有按计划进行。

在日记中,叶圣陶记录了4月26日和5月10日召开的两次人民法庭审判大会:“开审判委员会,就已经审判之贪污分子为之量刑。开庭审判皆三位审判员任之,已审十余人。就彼辈之陈述,共同考虑,或判有期徒刑而缓刑,或判劳役改造,或判机关管制,或判免刑”。有人说:“经过此次‘三反’,法院中一部分审判员有毛病,已垮台,而人民法院之外行审判员经历练而有成绩者,正可以补充其缺也”。

“人民法庭开庭,由愈之主审。被告四人,三人皆承认公诉书所称属实,自己确有罪行。唯××出版社工厂之×××,只承认一部分贪污,于盗窃厂中器材,虽经开放证人之录音,并由证人到场自白,此录音所称属实,而仍尚不承认。”下午两点半继续开庭,由叶圣陶主审,人教社二人“皆属于‘坐探’性质,其所得外间之好处不过二百万上下,论款额实微细,以其事性质较严重,故提出起诉”。在人教社的另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只承认有零星贪污,于其得自营造厂之贿赂两千八百万之坚不承认”,虽经放某人的录音,在录音中说明了屡次行贿的情形,而此人“仍谓实未得款”。只得停止审问,告以听候处理。

5月27日上午九时,出版总署开审判委员会。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文委于我署所判之刑,有少数案件嫌其过轻,嘱须加重。我们以前未曾多顾及惩治贪污条例,且不曾深究其精神所在,故未免有失。依文委意改定后,复就最近审讯之各案量刑,斟酌损益,颇费权衡。”让一些没有学过法律,没有做过法律工作的人来审理案子,已经是勉为其难了。对于判得轻或重,既没有法律依据,又无可靠的证据,所以真个是“颇费权衡”了。

5月31日,出版总署召开宣判大会,判处了运动中有问题的人“凡二十一案,免刑者十人,机关管制者七人,服劳役者三人,徒刑者一人,其他俟他日续为宣布”。还有三件疑难案件,直到7月3日才又召开了审判委员会,宣布此“为最后审讯之三案定刑”。“至此,贪污案件审毕,人民法院之工作即可结束”。而叶圣陶日记中记录的长达7个月的出版总署的“三反”运动,也至此告一段落。■

(责任编辑 洪振快)

金银滩之痛

○ 尹曙生

到青海省旅游，海晏县的金银滩是首选之地。那是因为王洛宾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经典民歌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想象着能看到草原那美丽的风光和婀娜多姿的牧羊女，怎能不想到此一游呢！不过现在到这里旅游，更重要的理由是想看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研制的地方是个啥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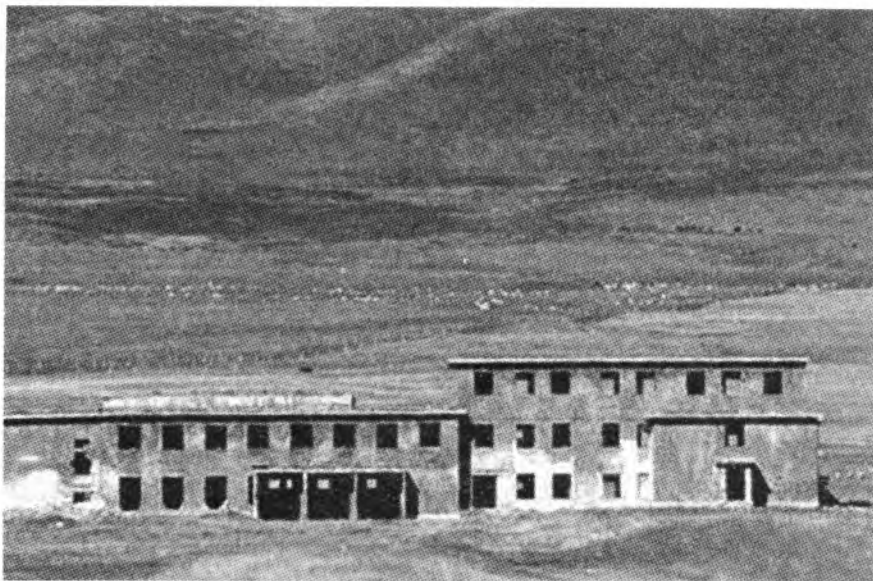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金银滩建立起来的占地 1170 平方公里，由 18 个厂区、4 个生活区组成的总建筑面积达 60 多万平方米的代号为 221 厂（对外称“青海省综合机械厂”），研究、制造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使我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掌握核武器的国家，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221 厂过去对外绝对保密，以致这个厂所在地的“金银滩”的地名，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从报纸杂志上消失了，电影《金银滩》拍摄完成只放映了几个月，就被禁止。现在解禁了，大家都想去看看这块过去想看而不能看、想说而不能说的神秘地方。

这可是真正值得一看的地方啊。它的故事多着呢！1959 年前，中苏关系良好，苏联答应帮助中国，提供技术资料、样品，培养中国科技人员，帮助中国研究、制造原子弹，221 厂选址在金银滩，得到了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苏联专家的认可。从建厂初期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从空中通过 U-2 侦察机不断进行侦察，和台湾情报机构合作，多次向青海空投特务，窃取情报。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专家、带走技术资料，但是，当它通过间谍和各种渠道得知我们研究、制造的进展后，十分惊讶。随着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战争阴云密布，苏联曾经设想采取外科手术式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来摧毁我们的研究制造基地。

我们国家对核武器研制基地的保卫、保密工

作十分重视，制定了一系列保卫、保密措施，以确保万无一失。青海省公安厅专门成立一个处，调配专门人员，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安全保卫和反间谍侦查工作，221 厂还单独设立一个公安局，名字叫“矿区公安局”，具体负责厂内安全保卫、保密工作，受省公安厅和上级保卫部门双重领导，可是外面没有人知道还有这样的一个公安局存在。在 221 厂工作的人员，受过严格的保密教育，单位与单位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小组与小组之间，人与人之间，都不得打听彼此的工作情况；就是上班走路，不同工种的人，也有着不同的路线，不得进入别的厂区；只有少数专家和领导配发特别证件，能随意在厂区内走动。每个厂房，每个部位都有卫兵把守，没有通行证，休想通过。在这里工作的人和外面的通信联络都通过专门保密信箱传递。为“两弹一星”贡献出青春和智慧的职工们，可能还不一定都知道，他们的来往信件，有时被严格检查，方能发出和收到。对发现在通信中有泄密行为的（往往是无意的）轻则批评教育，调离工作岗位；重则开除，劳动教养，甚至刑事处罚。221 厂工作人员的亲属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在哪里工作，是干什么的。围绕金银滩，还有大量武装警察和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包括高炮部队，在外围担负保卫任务，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这样严格的保卫、保密措施，也不能确保万无一失。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试验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间谍卫星，发现中国将试爆原子弹，并率先在我试爆前发布消息，令世界震惊。可 221 厂的多数职工和科技人员，竟然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是什么。221 厂在完成了它的神圣使命之后，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央决定撤销；1995 年 5 月 15 日，新华社向世界宣布“中国第一个核武器



中央决定在金银滩建立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研制基地已完全退役”2005年11月国务院命名中国原子城(221厂)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此成了青海省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笔者曾经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对221厂并不陌生。在时隔40多年后,重游青海,陪友人到此游览(说实话和当初的221厂比,已经是面目全非)。在游览过程中,对讲解员的讲解我没有认真听,因为对它的历史我一清二楚。我脑海里翻腾着40多年前初到这里的情景。回到安徽后,我翻阅日记和保存的资料,觉得有必要整理成文,让人们知道,在金银滩这美丽、辉煌的背后,曾经还有过巨大的伤痛。

1963年5月18日,青海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李谦打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我们不断接到公安部、监察部、民政部转来申诉信,反映海晏县1958年镇反和移民问题。前两年中央有关部门、西北局和省里派人去检查过,也处理了一些个案,可是申诉信、来访仍然不断。省委指示,由公安厅牵头,民政厅派人参加,组织联合调查组,再进行一次调查。省厅一处、二处各派一个人,民政厅派一个人,连你共4个人。这次调查报告得要你写,你要有思想准备。你们此行的任务就是了解情况,把1958年海晏镇反和移民写一个详细的调查报告,至于是对、是错,不要乱表态,调查报告由厅领导研究后报省委。

接受了李主任的任务,我就预感到,我们这次去调查,不会有结果,因为我们四个人,组长是

一处的马科长,其他三个人,两个科员,一个办事员。前两年到海晏调查的领队都是厅(局)级、处级干部,他们没能解决问题,我们能干什么?尤其是当年指导海晏县镇反和移民工作的,是省公安厅的现任副厅长×××,他一直认为海晏县1958年的镇反和移民没有错,为确保我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安全,作出了贡献。

5月19日,我们四个人开会讨论如何完成这次调查任务。马科长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这次到海晏县调查,完成

任务不难,不就是写一个调查报告吗?写调查报告理所当然由小尹承担,你是大学生嘛。我们三人给你找资料、找档案、找人开座谈会,你负责记录,然后整理写一个报告,就万事大吉了,我看有十天半月,准能完成任务。

正如马组长所说的,我们此去只用了15天时间,其中有5天时间是到移民最多的祁连县、刚察县,想实地去看看移民安置点,了解移民到底生活得怎么样,结果都被婉拒,理由是中央和省里来调查了好几次,都有报告,你们找来看看就行了,没有人陪你们下去。我们无话可说。

调查工作结束后,我很快写好调查报告。在调查组集体讨论报告时,对报告上写的1958年至1959年海晏县的镇反和移民情况,完全赞成,没有修改意见。但是,对报告最后一部分我擅自加进去的“事件”是在“大跃进”背景下发生的,他们三个人都坚决主张删掉,说这不是我们调查的内容。我只好服从。

今天我写这篇回忆文章,就不能不先写发生“事件”的大背景。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展起来以后,中共青海省委积极响应,提出在青海省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并作一步走”的口号,用两三年时间,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当时青海省的农业区已经基本完成农业合作化,牧业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少地方还

保留着部落社会形态,没有合作化。省委要求在牧区立即成立牧业生产合作社,把牧民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牧场和牛、羊、马交给合作社,牧民成为合作社社员。这样做,牧民的私有财产被完全剥夺,自己无处置权,吃肉、喝奶、吃酥油糌粑,都要向牧业合作社领取,牧民居住十分分散,邻居之间动辄几十公里,成立牧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个疯狂的做法,不仅广大牧民强烈反对,就是党员、团员、基层干部也坚决抵制,当然也遭到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强烈反对,一度引起了极大的社会恐慌。省委不反思自己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盲目蛮干,用专政的手段、高压的方式来解决。他们认为,在青海只要把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控制起来,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为牧民是听他们的。于是,省委在1958年4月14日给各个州、县委发出通知,为了加快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要求“采取开会、学习等方式,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集中控制起来”,不让他们和牧民接触、和外界接触,不让他们有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根据省委的指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委,将副县长、温都寺高僧(常年在温都寺念经)、当过班禅额尔德尼经师的加乃化仁波切等上层人士,以到县城开会为名,软禁起来,使他和外面失去联系。而温都寺所在地的循化县刚察乡,县里派出的工作组正在那里开展牧业合作化运动,遭到包括党员、团员在内的牧民群众强烈抵制,加乃化仁波切被软禁后,使矛盾更加激化,成了闹事的直接导火索。牧民群众和政府多次交涉,要求让他回温都寺念经,交涉无效,激起信教群众愤怒,在少数人的煽动下,将乡长扣押,打死工作组组长,破坏通信电缆,该乡首先叛乱。叛乱群众向县城进发,和不同意农业合作化的广大撒拉族群众一起,共4000多人,于1958年4月24日将循化县城包围,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等人,要求不搞牧业合作化,解散农业合作社,将牛、羊归还牧民。兰州军区紧急调动部队平叛,4月25日叛乱平息,造成了719人死伤(其中被击毙435人),俘虏2999人,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的普通群众;平叛部队伤亡17人,损失财产90万元,200间民房受损。此次叛乱中,循化县有68.4%的党员和69.5%的团员参加了,有156名党员和26

名共青团员参加了攻打县城的行动。

循化叛乱虽然被迅速平息,但是很快蔓延到5个州、24个县、240个部落、307座寺庙,共有近10万人参加。毛泽东在中共青海省委关于循化叛乱的报告中批示说:“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其实,由农、牧业合作化运动所引发的叛乱,参加者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他们不仅没有解放,而且陷入了深渊。

1958年4月28日,省委书记高峰在省委书记处会议研究平息叛乱的措施时说:“叛乱好嘛!为我们打击敌人找到了借口。谁是坏人,地方、部队都要事先了解,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在战斗中将他们解决掉,要有人专门管这件事。现在的斗争比1949年还严重,战线非常广泛。公安机关要在三年内把青海搞成铁板一块。”6月16日,高峰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说:“这一次决心把封建主义盖子连锅端掉,两个革命一齐完成,对那些绊脚石,能在战场上打死的就打死,牧区揭封建主义盖子,主要靠打仗,把他们的头子抓住了,就完成了任务50%;枪毙了没有,枪毙了就完成了100%的任务。”6月28日,高峰在省委常委会上说:“牧区还有一个好形势,就是我们已经捉了7000个反革命(指省委部署的公安工作捕人计划牧区的捕人数,1958年全省全年逮捕人数4.9万多人,见笔者《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这种好形势是叛乱给我们带来的。在这个大好形势面前,最大的阻力是我们一些领导思想赶不上形势,有右倾情绪,贵南一个县一次打死敌人42个,要通报表扬的。”

高峰要通报表扬贵南县打死42个“敌人”是怎么回事呢?1958年5月13日,贵南县委根据省委通知,以学习、开会为名,将全县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统战对象42人集中往州里送,在到达海南藏族自治州一个名叫“过马营”的地方汽车停下,要车上的人都下车,集中到一个大房子里,然后锁上门,事先布置在那里的民警和民兵,从窗户向房子里面开枪射击,将42人全部打死。这样违法乱纪、滥杀无辜的犯罪行为,身为省委书记的高峰却要通报表扬。

1958年10月26日,高峰在省委常委会上说:“现在是大破大立,要把宗教彻底破坏,搞得臭臭的,——现在看,宗教越反动越好,只有他们

反动,搞破坏,我们才有借口下手狠狠打击,才能搞彻底;我们不要怕搞过头,把宗教搞得越彻底越好,不然我们就不会成为大后方。”

1958年9月14日,主管政法部门工作的省委常委、副省长薛克明在政法工作会议上说:“对宗教实权分子、反动头人,一律捕光,一个不留,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死在监狱比死在社会上好。”

公安厅厅长杨树芳说:“封建阶级的狗腿子、爪牙、宗教实权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分子,三年内将其打完,一个不留。”

这就是海晏县镇反和野蛮移民的大背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又有了保卫原子弹实验、制造基地安全的借口,在金银滩地区进行社会镇反,滥杀无辜和野蛮移民就成了必然。当时海晏县全县人口只有1.9万人,80%住在美丽的金银滩及其周边地区,以藏族、蒙古族同胞为主,也有少量的汉族和其他民族。藏族和蒙古族还保留着部落组织的形式。

在省公安厅那位副厅长的指导下,1958年6月至10月,海晏县“破获”了一个名叫“以打狼(猎)为名的反革命叛乱集团”,有时也叫“以打狼(猎)为名的反革命阴谋叛乱集团”,因为海晏县从来没有叛乱过,所以加上“阴谋”两个字,有时也叫“阴谋叛乱、阴谋暴动集团”——总之,这个“反革命叛乱集团”的名称是游移的,不固定。我们在阅读案卷材料时,罪名有七八个。公安局给我们提供的档案资料显示,对这个“叛乱集团”成员一共逮捕了734人(也有人说逮捕了800多人)。对只有1万多人口的小县,逮捕这么多人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而且被逮捕的这些人大多是居住在金银滩及周边地区的藏族和蒙古族同胞。为什么怀疑他们要叛乱?因为按照少数民族习惯和实际需要,家家都有打猎的枪支,以保护牛羊的安全。上世纪50年代,金银滩一带,狼害严重,受县委、县政府指令,由县公安局指导,把青壮年牧民组织成打狼队,经过几年努力,狼害基本消除。“大跃进”运动发动起来后,加上循化发生叛乱,县委、县政府领导认为,这些牧民有叛乱的可能,必须先下手为强,把他们抓起来,防患于未然。在被捕的700多人中,就有打狼队的631人,其中有231个民兵,14个乡、社(合作社)长,8个

副县级干部,34个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物。被捕的人中有69个党、团员,都是贫苦牧民出身,是共产党在牧区的依靠对象,却也被无辜逮捕。

被逮捕人员名单的确定,由县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是县委常委、公安局长,实际是公安局确定的名单)提出,报告县委常委会集体研究决定。逮捕的方式,干部、民族宗教界上层人物和统战对象,以开会、学习、传达文件等名义发通知,等他们来报到时,来一个逮捕一个;其他人,由公检法干警到下面就地逮捕。判刑由公安局预审后提出判处刑期,是干部和民族宗教界上层人物、统战对象的,经县委常委研究决定刑期。罪名有十多种,比如“以打猎为名企图叛乱”、“组织打狼队,企图推翻共产党”、“思想反动企图变天”、“散布谣言,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不满共产党,给活佛磕头、点酥油灯”、“思想反动,剥削压迫牧民群众”、“生活糜烂,强奸妇女”、“组织参加反革命集团”等等。刑期是怎么确定的呢?有什么原则?总的要求是:年轻的要重判,因为判轻了,释放回家后再搞叛乱怎么办?年老的,判轻点,因为不到刑满就可能死在监狱里。比如一位蒙古族头人,71岁,研究判刑时,主持常委会议的县委书记问:“此人多大岁数?”办案人员答:“71岁。”县委书记说:“判他10年就差不多了,他会死在监狱里,不可能叛乱了。”700多人,经过法庭开庭审判的只有63人(查阅法院开庭审判记录记载),其余都没有开过庭,公安局预审后,决定刑期,法院照葫芦画瓢写个判决书,盖公章了事,送到劳改农场。被告都不承认自己犯罪,说从来就没想过要叛乱。在公安局预审时,由于被告人不承认犯罪,残酷刑讯逼供,致死17人,致残40人。

王昭到青海主政后,大力平反冤假错案,但是海晏县以“打狼(猎)为名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乱”这一涉及700多人的大案,没有从根本上平反,我们接触的县委领导人仍然认为当年海晏县没有发生反革命叛乱,是因为及时粉碎了敌人企图叛乱的阴谋,所以这个案子不能平反,个别人搞错了,个别纠正。到我们去调查时已经纠正了57人,分别释放,或在劳改农场就业,成为农场职工,但是不能再回金银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一冤案才彻底平反。可是大多数人已经在劳改农场被饿死或被折磨致死,活下来的人不多。

当年定这个案件是省公安厅的一位副厅长坚决主张的,县里领导层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打狼队是县委、县政府部署,公安局组织实施的,说他们阴谋叛乱不合情理。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不是县委主要领导,没有决定权,被批判为思想右倾,不久就被调离到别的县工作。但是他们没有躲过在“四清”运动中被整肃的命运。

当年支持县委挖出这个“重大反革命阴谋叛乱集团”,1962年、1963年不同意平反的那位省公安厅副厅长,1965年作为“四清”工作团副团长到祁连县(和海晏县同属海北藏族自治州管辖)搞“四清”运动,又挖出了以县长“郭振国为首的反革命叛乱集团”,涉案414人,包括法院院长、公安局局长、统战部部长等等,将该县领导几乎一网打尽;全县28个公社书记、社长,除一个公社社长外,全部打成反革命叛乱集团成员。为此,群众编了个顺口溜,叫做“四七二十八,剩下刘春法”。只有这个刘春法,因为他从部队转业安置到祁连县当公社社长时间不长,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叛乱集团成员。包括法院院长在内自杀34人。这位副厅长嗅觉特别灵敏,他认为1958年海晏县反革命武装叛乱没有搞起来,是因为发现得早,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保卫了221厂的安全,为原子弹的试制成功,立下功劳;但是镇反并不彻底,没有把根子挖出来,这根子就是调到祁连县当县长的郭振国为首的那些人。所以给郭振国定罪仍然是阴谋叛乱,其根据就是郭县长在基层召开过几次会议,研究生产和牧民生活问题,被指控为是策划阴谋叛乱的会议。这位副厅长从1963年开始,一共参加了4期“四清”运动,在四个县挖出了四个反革命集团,涉案1000多人,被人称为“反革命叛乱集团制造专家”。“四人帮”被粉碎后,这些反革命集团全部被平反。可是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伤痛是永远平不了的。

为了建设221厂,移民是必要的。但是,当年金银滩的移民做法,极其野蛮。因为破获了一个大的“反革命叛乱集团”,所以对这些移民极不信任,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叛乱集团的社会基础。事先不宣传、不解释、不开会、不向群众当面说清楚,而是下一道命令,限制在两三天内做好准备,每家可带三头牛驮东西,带不走的扔掉。有的牧民头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就得走。全程由警察、民兵

持枪押送,打骂虐待,死于中途者几百人。

根据221厂建厂要求,须搬迁1715户、9325人。除海晏县本县和湟源县就近安置比较容易,对安置到祁连县的461户、2183人和刚察县的474户、2469人,路途远的有几百公里。1958年10月20日开始移民。到祁连的那些移民在祁连山遇到了暴风雪,又赶着十几万头牲畜,拖儿带女,受尽折磨,晚上宿营,几家住一个帐篷,忍饥挨饿受冻,加上打骂虐待,走了26天到达目的地,不少老人和幼儿死于风雪途中。在这次移民中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们调查组没有搞清楚。但是从祁连县接收移民的名册上看到,他们一共接收了海晏县移民1879人。这就意味着在移民途中,死了304人。牲畜死了2万头。到了祁连后,所有的牲畜,被划归托莱牧场所有,剥夺了牧民们对牲畜的所有权,牧民成了牧场牧工。由于县里不同意我们去实际了解牧民安置情况,对他们在牧场的遭遇,只有从来信来访中知道一些。移民到刚察县的那些人,路途中死了400多人。他们的牲畜同样被划归集体,移民们一贫如洗,靠给牧场打工度日。

发生在金银滩的灾难,不仅降临在这些移民身上,为“两弹一星”贡献青春和智慧的221厂职工,也没能幸免。在“文化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的1969年,221厂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破获了“重大反革命集团案”,80%多的车间、科室干部,90%高、中级科技人员,受到审查和迫害,在两年时间内,4000多名职工受到迫害,遭到残酷的刑讯逼供,使310多名职工致伤致残,40多名职工含恨自尽,5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遭枪杀。(见王菁珩:《中国核武器基地揭秘》,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美丽的金银滩一度成为腥风血雨之地,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包括221厂职工,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不能幸免。

无疑,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令人欣慰的是,如今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心声和主旋律,而写下这段历史,也是为了有助于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1959年的民间“彭德怀上书”

○ 李洪林

庐山会议上的两封信

众所周知,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三面红旗”提了一点意见。其实就在同一个时间,山下还有一个民间的“彭德怀”,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同样是批评“三面红旗”。这两封信,都关系到中国的前途。

彭德怀的信和故事已为人们所熟知,而那个民间“彭德怀”和他的信则被历史的灰尘所遮蔽,50余年来不为人知。

那个民间“彭德怀”,当时是华中工学院的学生,名叫张治水。他的信是7月11日写的,全文约3万字。信寄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后,立即被转到中央政治研究室。政研室主任是陈伯达,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每半月出一期党内刊物《思想界动态》,只发给中央委员和省部级的一把手。我当时在政研室工作,专门负责编辑《思想界动态》,见到张治水的长信,觉得是很重要的群众思想动态,这个青年人很有见解,应该及时向中央反映,所以迅速加以摘录,刊登在7月23日出版的《思想界动态》第十九期上。

这一期《动态》印好后就空运到庐山。当时我们只知道中央正在庐山开会,并不知道具体议程。陈伯达这时正在庐山。他作为毛泽东的理论助手,一向察言观色,此时已被毛的7月23日讲话吓得魂不附体,他一见到《动态》,不但全部扣下,而且打电话到北京,叫我们把这一期刊物全部收回。

据我所知,庐山会议上还没有人提到张治水的信,可见与会者都没有看到《思想界动态》。

但是在政研室,这一期《思想界动态》却成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我就因为编印这期《动态》而犯了“配合彭德怀向党进

攻”的错误,遭到入党十多年来最猛烈的批判。

张治水这封信所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彭德怀的信,应该说对庐山会议的讨论和决策,极有参考价值。而且实践也已经证明,张所反映的情况,都是真实的,他所提的意见,也是正确的。2011年,张治水的家属从湖南给我寄来了原信,我觉得,为了恢复历史真相,使错误不再重犯,不应该让这封信永久湮没。它不是故纸堆里的垃圾,而是一颗被人误丢的明珠!所以我将信件原稿进行了整理,摘要如下:

党在1958年所犯的错误的和原因 (摘录)

错误在哪里?

党在58年究竟犯了些什么错误呢?首先是忽视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定律:事物的发展是平衡的,互有内在联系。强调一点忽视其它,就会彼此失顾,以致影响主要的。这就是党在58年所犯的主要错误。

我们知道在1100万吨钢中,其中优质钢占900多万吨,土钢只占200多万吨,这200多万吨土钢,几乎动员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力量,花的本钱就更加无法计算了,这种全国总动员的作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仅仅为了炼钢,却来了个全民运动,机关停止办公了,学校停课了,一些服务性行业半停止营业了,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其结果是钢铁的供应紧张并没有得到缓和,而促使其它各项物质供应紧张。有人说完不成1070(万吨钢)在国际上影响不好,这点我们不否认,但我们应比较一下,国际友人来到我们国家,看到饭店里没有饭卖,市场里各项物质都缺乏,人们过着半饱的生活,哪一个影响大呢?

领导了，一些担任领导的民主人士和各党派人士，已经不敢再大胆说话了，我们又何必把口号提得过左呢？

据说在政法系统提出过党的政策就是法律，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口号！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党和群众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而我们却向群众提出作党的驯服工具；右派分子攻击我们是党天下，而我们却提出党的绝对领导；右派分子攻击我们没有国法，我们却提出党的政策就是法律。这不叫做不打自招么！！

应当辨清假象

有一位做过多年党的工作的领导同志感慨地说：“往往有些我们估计执行不通或者执行起来会有问题的措施，拿到下面去顺利地执行了，领导的思想真赶不上群众！”假如他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群众中一些中间和落后的人不是没有意见，而是有意见也不敢提。而群众中一些先进的人，虽然没有意见，但往往也是脑子发热。

由于我们对待不同的意见，一味采取批判的办法，也由于我们把一些口号提得过左，这种假象就越来越严重。我们只要背后仔细观察，就会听到一些轻轻的埋怨声和无可奈何的叹息声。而这种声音作为党的干部是再也听不到了，这说明我们党是走着一条脱离群众的多么危险的道路！！

怎么办

这种假象不但严重地在群众中存在着，甚至在我们党的一些高级干部中也存在着，甚至刮得我们的老舵手毛主席也有点掌不住舵了。我们党必须进行一次新的整风，但不能再用自上而下批判的办法，应该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坐下来谈一谈，摆事实说道理，不同的意见可以和平共处。党也应该找党外一些人谈谈心，对于那些做错了的地方或不够的地方，应大胆承认错误。

关于知识分子政策

为什么解放以来几乎没有看到高级知识分

子有什么创造呢？要设身处地想一想，解放以来，几乎每次大的运动都把他们打击和批判一顿，这样做使他们有苦说不出，特别是拔白旗后，大多数老教师走路都抬不起头。

知识分子看问题比较敏感也比较深刻，说话也比较慎重，比较客观。应该看到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个朝代不是由于不听正直知识分子的忠告而趋于崩亡。我们不应该只愿听赞扬声，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不会过多地去歌功颂德。

关于干部政策

人们为什么对曹操那样感兴趣，因为曹操是历史人物，说错了也没有多大关系，反正是学术问题。对现实问题谁也不敢谈，唯恐犯错误。写文章的人一致称赞曹操的用人唯才，不分阶层，我想或许有些暗示，只是不便说罢了。

近来有些地方在选拔干部时的确有忽视才的倾向，或者认为学识是无要紧要的，只要听党的话就行了。无产阶级不应当害怕敢于提出反面意见的人。德的标准不应当就是听话。

关于科学研究工作

对于在学术上出现的唯心主义，我们不应一棒子打死，这对于我们追求真理是有利的。假如唯心论者提出的道理，唯物论者无法说服时，就会促使唯物论者去寻找更充分的科学根据，假如唯物论者根本就无法说服唯心论者，也许唯心论者就是不自觉的唯物论者。历史上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事实，牛顿和爱因斯坦在科学上的成就，黑格尔在哲学上的造诣，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应该允许这种矛盾的存在。假如没有人提出错误的假设，恐怕真理也就不会存在了。

关于理论教育工作

解放以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正面教育，表面上看来很好，但会产生一种危险的麻痹作用，一个没有闻过臭味的人也辨别不出香味。历史上许许多多伟大的人物都是读了许多的书，包括好的和坏的。在他的脑子里也是作了许多正

面和反面的思考,走过许多曲折的道路,终于找到了真理。因此我们党的理论家和教育家就应该研究如何采用适当的方式在青年中进行若干反面教育,启发学生去独立思考,敢于对一切问题产生怀疑,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而现在的情况是:一种人有意意见埋在心里不说,另一种人根本不敢去想。

关于党报

记得党中央关于在党报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曾经作过专门的决议,编辑现在似乎都忘记了或者怕登批评的稿件,过去还经常可以看见在报纸上揭发一些虚假现象,一些有正义感的人还可以把一些不好的情况向报社反映,只要基本上符合事实,就会得到党报的支持,而现在不但不敢反映不好的现象,甚至连个人的申诉也很难得到支持,一切相信基层,群众有不满也只好埋在心里。党报的虚夸现象非常严重,稻谷亩产三万六千斤的事,记者是否也深入地作过调查,似乎是指标越高越好,也不过问事实,这样下去将严重地影响党报的威信。

关于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也是在去年一股风下办起来的,既未经过试验,也未经过充分酝酿,不足月的产儿往往是很难活下去的。我国的农村,基本上还是封建经济的解体,而这种解体还是我们用土改的办法,促使它完成的。由初级社升高级社,这已经跳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再要组织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人民公社,就必然产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严重脱节现象,从而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将来的事实将会说明这一点的,因此可以说,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一付怪胎,不如早点打掉它。

关于民主生活

和部队复员转业的战友们闲谈,都有一种感觉,认为在地方还不如在部队自由,为什么部队的组织纪律那样严格,反而会感到自由些呢?这关系到我们的民主空气。

人们现在不但感到物质生活紧了,政治生活也感到紧了,谁要说错了一句话或者发了几句牢骚,就要受批判,或者拿到大会上辩论。党应该使每个人都感到我们的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都一天天更加美好自由。

关于检查团

去年中央和地方都组织了检查团,为什么这些问题都没有发现呢?主要是犯了高高在上主观主义的毛病,检查团来到三天之前,就忙得团团转,到处搞得漂漂亮亮,似乎不是检查团来检查工作,倒像是欢迎参观团来参观,有虚假也就无法看出来。

关于电影艺术文化生活

人们喜欢能看一部好的电影,可是往往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千篇一律,不能给人艺术的感染。

走到车间工地,看到的是“鼓足干劲争上游”的大幅标语口号,走到俱乐部也是类似的东西,打开报章杂志也不例外,使人感到生活太单调。打开诗刊,竟看不到一首情诗,有也是翻译外国的,或者是少数民族的。这样下去三百年后的人会觉得奇怪:难道那个时代的人就是一天到晚搞建设,连爱情也不谈了,友情也没有了?

我们既然是现实主义者,在反映好的同时,也应该反映坏的一面,我们的党员有勤勤恳恳爱人甚己的,也会有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的。而现在作品里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几乎都是一样,一张慈祥的脸,一颗刚强的心……

关于十年大庆

听个别领导同志的口气,十年大庆的隆重重要和苏联四十周年媲美,运动会的规模要超过奥林匹克,脑子太热了,应该冷静一点。

为大庆花太多的钱完全没有必要。中国向来就是一个踏踏实实会过日子的国家,新中国也还要活下去,二十年、三十年……甚至百年大庆时再隆重搞一下,也未尝不可。

关于运动和矛盾

我们总喜欢采用运动式的工作方法,农民把它叫做打摆子忽冷忽热,显然这是一种不好的工作方法,使人感到忽东忽西,晕头转向。原因是我们不能随时随地主动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一直等到矛盾突出以后,才来集中全力解决一下,这种工作方法非常被动。

关于按劳分配和物质鼓励

去年我们过分强调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有些人甚至认为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也是向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投降,这是错误的。

在这样一股风下,工厂的计件工资全部取消了,我们的按劳分配不是做得过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假如政治工作不是以经济作基础,政治口号不是和物质刺激相配合,我们的口号将变成空洞的口号。事实上群众对政治挂帅、大跃进等口号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我们不能永远靠一股风来进行工作。

教学革命的做法是错误的

对待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教学革命),我们采取的态度是粗暴的,强词夺理,而不是真正采取自由辩论的办法,

这种愚蠢的办法,结果是怎么样呢?大家都学聪明了,谁也不说心里话了,被批判的人表面上看来很听话,可是心里谁也不服,有的消沉了,有的在感情上与党距离更远了。

怎样理论联系实际,教学革命也是走了个极端,要学生编教材。往往是刚学过的功课,甚至还未十分理解它就要去编讲义,那当然只得东抄一段,西录一段,或者生搬硬套地把一些实际例子搬到讲义上。

关于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亲爱的党,在教学革命中我被戴上反动分子的帽子斗了一顿,我的心一直很沉痛。起初我认

为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也许真是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后来和一些拔白旗的人相逢,个个都唉声叹气,有一种有苦说不出的味道,看见一些老教师也都那样萎靡。我想为什么都会这样呢,越想越不对头,一种强烈的战士感责备我,当我们党几乎听不见什么反面意见时,作为一个志愿军战士的我,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提出来呢!因此整整写了一个半月。最近病了,医生劝我休息,我还是坚持把它写完,

无论从我的年龄、知识和地位来说,我都不应该夸这样大的口,连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批评起来了,我想党会原谅我的冒昧的。即使全篇文章都是错的也好,我愿作一个探测真理的尖兵,这样做可能给我自己带来更大的不利,但对于党和社会主义的祖国总多少会有一些好处的,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华中工学院机制三年级学生 张治水
(1959年)7月11日

在劫难逃的“小彭德怀”

和彭德怀同时上书的张治水是个青年团员,参加过抗美援朝,复员后考上大学。他身处底层,“看见大跃进带来的萧条景象以及各种议论”感到忧心忡忡。他暑假回家时,在火车上遇到一位抱着小孩的妇女,含泪述说他们农村粮食已经没有了,她几天未吃饱,乳汁断了,孩子饿得哇哇直哭。张治水见她向邻座乞讨饼食的情景,“我的心酸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其根源在于中央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出了问题,在于左的思想在统治着一切”。

于是他“抱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直寄党中央,另外抄了一份交党支部转送上级党组织。他很清楚此举的可怕后果。“我也知道,这篇文章是很难为人所理解的,触及的都是党的一些根本方针政策问题,连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批评起来了。”但他还是下了决心,哪怕“这样做可能给我自己带来更大的不利”,“但对于党和社会主义的祖国总多少会有一些好处的,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张治水参加志愿军时的照片

庐山会议后，在席卷全国的“反右倾”高潮中，张治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作为“小彭德怀”，成为武汉地区一个重点对象。湖北省委书记亲自到华中工学院去召开全院批判大会。自此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和“辩论会”，不知进行了多少场，特别是反复追问他受了谁的指使，哪些人与他合谋。他说独自写的，但是没人相信。同时各种议论对他也形成巨大的压力，什么“漏网大右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暗藏很深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等等，使他感到无法再活下去。有一天晚饭后走在马路上，他一头撞向一辆大卡车企图自杀。多亏司机及时刹车，才幸免于难。司机大喝一声：“你想找死啊！”强行把他拖开。这时他才清醒过来：“我为什么要去死？我死了不如一条狗，死了只能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成为说不清道不明的冤死鬼。”

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一次生与死的决斗。”此后他决心活下去：“我有老母有妻子有儿子，为了他们我应该活下去，否则他们都会成为反革命的家属，我不能害他们。”而且他“相信历史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终于挺过来了。

这一“挺”就是20年。不但他自己因为背着

“政治问题”的黑锅，被打入“另册”，到处遭歧视，连他的儿女也都受到株连，想参军或入团都不可能。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张治水的冤案才得到平反，重见天日。

张治水在大学是学机械的。平反后，在一个机械厂担任总工程师和厂长，得以发挥所长。只可惜由于长年在政治高压下备受屈辱，又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生活和劳动，他的身体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平反后能施展才华的时间，只有十几年，不久就疾病缠身，如今已经瘫痪在病床上失去意识很久了。

从他写给毛泽东的信来看，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他虽然身处基层，学的是工程技术，但是眼界开阔，对不少现实问题都能提出独到见解，有些看法还很深刻，而且对弱势群体和底层苦难的关怀溢于言表，应该说具有“智者”的眼光和“仁者”的心怀。更加可贵的是，他在反右派运动之后，明知批评共产党将给自己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但还是把信送出去了，充分说明他具有“勇者”的骨气。智、仁、勇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三达德”，在张治水身上可以说集中体现出来了。比如，他当时就断定：人民公社是个“怪胎”，应该早日解散。这是多么犀利的眼光，多么大胆的结论！那个时候的中国，有几个人能有这种眼光？又有谁敢说出这样的话？

一个青年学生和许多中央委员的对比

在智、仁、勇这“三达德”里面，论起智力来，中国人绝不比别人差，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但是谈到仁和勇，就另当别论了。

“仁者爱人”。“爱人”是仁的基本要求。可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训导了中国几十年，社会通行的美德已经不是“爱人”，而是“整人”、“斗人”和“坑人”了。

至于作为“三达德”之一的“勇者不惧”，在当代中国就更稀罕了。按理说，共产党既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就是中国人里最先进的分子，中央委员更应该是先进分子中的精英，足以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榜样。能够当上中央委员，说明他们的智商绝不会低，张治水所看到的“三面

“红旗”的问题和社会的惨象,这些“当朝公卿”和“封疆大吏”一定都能看到。然而除了彭德怀等个别人之外,居然没人敢向毛泽东反映,更不要说当面谏诤了。本来许多人看到彭德怀的信时,大体上都是同意的。但是毛泽东一发话,他们立刻变脸,众口一词批判起彭德怀来了。当时在庐山上的那些中央委员,如果和青年团员张治水比一比,就可以看出谁更具有“勇者不惧”的“达德”。

悲剧能避免吗？

今天的政治舞台上,毛泽东式拥有绝对权威能够独断专行的人,已经没有了。中国的命运已经不会取决于某一个人的生死了。那么,彭德怀或张治水式的悲剧能够避免吗?整个国家因为不能及时纠正错误而陷入危机的局面能够避免吗?

回答是不能,因为造成这种悲剧或危机的制度还在。

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即垄断的权力,不但能制造悲剧,而且会孕育出制造悲剧的独裁者。至于这个权力的运用者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体,并不影响它的性质。

在这种制度下,“官大一级压死人”,有权就有一切,滥权不可避免。德高望重如彭德怀也好,默默无闻如张治水也好,哪怕有再好的建议,都可以被掌权者扔到纸篓里变成垃圾,因为没有一种机制来逼迫掌权者必须接受逆耳忠言,必须接受人民的选择。在这种制度下,某个建议被扔进纸篓还算是好下场,如果被认为对权力构成“挑战”,那就“危害国家安全”了。因为这种制度的掌权者本身就是“国家”,所以把逆耳忠言看作“危害国家安全”,不但顺理成章,而且易如反掌。

由此可知,产生这类悲剧的根源不在个人而在于制度。

据邓小平说,毛泽东曾清醒地提到这一点,而且说过,独裁者无法无天这种事情,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邓小平在1980年曾经专门对这个问题做了一次著名的讲话,并且表示一定要改革这种制度,可惜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转眼间,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但他生前“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未提上

日程。

不是“挑战”,而是“机遇”

拜改革开放之赐,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腐败已经扩散到整个机体,成为制度性的不治之症。这一点,高层内部有识之士已经有所认识。党内外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声浪也一直不绝于耳。不应把这种呼声看作是“挑战”,而应该把它当作难得的“机遇”。抓紧时机,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不是“应天顺人”的“最上上策”吗?

然而人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为了“加强社会管理”,对内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对外的国防开支。作为执政者,当然要维护社会稳定。但是用高压来“维稳”,恰恰是加剧矛盾,可以说是“抱薪救火”,在给更猛烈的爆发制造条件。

“殷鉴不远”,就在庐山会议。彭德怀和张治水的信,给执政者提供了一次扭转“左倾”错误的良机,可惜在专断体制下,两人的呼声不能和广大群众见面,不能形成公众舆论,无法通过民主机制变成逼迫执政者必须接受的制度性压力,结果这次能够挽救那场大饥荒的良机,就被毛泽东7月23日的一篇讲话弹到九霄云外去了。

如今,历史又到了一个转折点。“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中国模式”,已经快要走到尽头。积极稳妥地实现和平转型,走上人类共同趋向的宪政民主的大道,符合全社会的利益,也符合执政党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管是否被看成“挑战”,实际上都是难得的“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清醒的当政者应该是明白的。■

(作者为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炎黄春秋网上书城

网上购书 方便快捷

网址: <http://yh100.taobao.com>

本刊唯一授权网上书店

联系电话: 18611911105 15801313168

联系人: 关小姐 淘宝旺旺: zssy8888

毛泽东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之死

。 陈学政

1968年,经过文革初期的造反、夺权、武斗等剧烈动荡之后,各级“革命委员会”均已成立(当时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紧接着一场“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一清”运动席卷神州大地。湖南省平江县向家人民公社梅树大队清查的重点目标落到了谭泰平、毛远明、黄玉堂、毛远春身上。

毛远明,湘潭韶山人,其生父毛泽承与毛泽东是第五代堂兄弟,外祖母是毛泽东的堂姑母,所以她既是毛泽东的堂侄女,又是毛泽东的堂表侄女。毛远明5岁送人做童养媳,1934年丈夫胡元普病死后,流落到长沙,由妹妹毛远春介绍与谭泰平结婚。谭泰平,平江县人,从小种田、学织布,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30年参加红军,所在队伍被打散后流落武汉、长沙等地帮人煮饭。1939年谭泰平偕妻子毛远明回到平江向家村。至1950年时,谭泰平一家三口人,有大小房屋九间,自耕田四十九亩四分五厘,耕牛一头,农具齐全,除本人是主要劳动力参加主要农活外,请过长工、月工、零工。谭泰平1945年当过15天轮流伪保长,1949年湖南“反共团”组织开会“配民食”参加过一次会,土改时在划定成分的过程中,认为其有轻微剥削,经多次发动群众讨论、计算,认定解放前三年每年平均剥削收入比例大约为13.8%,最终划为富裕中农。

毛远春是毛远明的亲妹妹,自小在外谋生,到长沙做工、当佣人,后与平江人黄玉堂在长沙结识,结为夫妇,1939年一同回到平江向家村。夫妇二人都会纺纱织布、染布,回到故乡后与人合伙开染坊、布庄,土改时拥有十亩九分一厘田地和半头耕牛,还当过染织厂经理(所谓染织厂只不过是十几个人的小作坊,黄玉堂实际上是主要劳动力和技术指导),剥削收入比例为18.3%,被划为“小土地经营”,比“富裕中农”还要高,仅

次于地主、富农。

类似谭、黄情况的家庭在历次运动中都属于“高危人群”,在那几十年的历史时期中,像他们这种情况的人,一般都是兢兢业业、胆战心惊,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遇事让三分,夹起尾巴做人。但是可能一方面由于严格按照政策他们确实不应该划为地主、富农,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与毛泽东的亲戚关系,所以自以为有所依恃,待人处事并非那么谨小慎微。虽然他(她)们是勤劳、善良的,但邻里之间总免不了这样那样的利益纠葛,若不能事事委曲求全,就有可能结仇结怨。1950年谭泰平担任梅树村村长,同村仇科富担任秋征评议员,仇把自家的产量评为三成,而秋征总评议员喻义和认为应该评九成,争议中仇说最多评五成,最后谭泰平拍板定为七成,比五成要多交500多斤稻谷的公粮,仇科富认为谭泰平“一个屋场的人不帮忙,十个指头往外弯”,从此怀恨在心。以后每次运动一来,仇科富就要提起谭、黄为漏划地主、富农之事,只是由于上面说的两个原因,他们每次都能有惊无险,侥幸过关。

1968年9月7日向家公社召开“三查一清”运动动员大会,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缪正龙在公社、大队革委会正副主任60多人参加的大会上做完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祷告仪式,念了五条关于阶级斗争方面的毛主席语录后,神色庄重激昂地说:“同志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已经揪出来了,各级新生的红色政权已经建立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各类黑帮分子已经被我们赶进了牛棚和五七干校,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深入进行‘三查一清’运动。我们要拿出当年反右和大跃进的劲头来,是人是鬼我们都要认真查一查,蒙上贫下中农画皮的要坚决揭下来,是石头,砍三刀,是

草根,刨十锄!我们搞‘三查一清’是给土改补火,主要是清查漏网的地富反坏,咱们向家公社是个革命老区,人口复杂,漏网的阶级敌人大有人在。‘三查一清’运动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查到谁身上,就要让他脱一层皮,清到谁头上,就要让他换一身骨头。刘少奇怎么样?当了这么久的国家主席,到头来却是个叛徒、内奸、工贼,隐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向家公社有没有这样的定时炸弹?我看是有的。”当时缪正龙正在梅树大队蹲点,散会后他立即赶到蹲点之地,进行“三查一清”对象摸底,梅树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李爱芝等提出谭泰平、黄玉堂的问题,缪认为正好可以树立一个典型,把全公社的这场运动推向高潮,指示李抓紧成立专案组,收集证据、立案。

证据主要来自仇科富、江浩明的揭发材料。仇与谭一向有矛盾。江浩明出身反革命、地主家庭,父亲江绍斌、大兄江慕湘土改被镇压,二兄江应国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市民食调配委员会委员,逃往台湾,本人当过保长、乡干事,加入过国民党、反共团,解放后由于积极揭发父、兄罪恶,检举反共团首恶、组织成员有功,经过乡人民政府反复讨论安排教育工作,后终因家庭、历史问题被清退。当“三查一清”运动在向家公社梅树大队轰轰烈烈展开后,江浩明忧心忡忡地对儿女说:“山雨欲来风满楼,运动又来了。这次兆头很不好,是给土改补火。恐怕我江某人难过关了,石头都要砍三刀啊。我江浩明能挺得住这三刀吗?梅树大队除了我和毛家,还有谁能与这事沾得上边呢?”不过在缪正龙、李爱芝看来,江浩明属于死老虎,斗争他不容易显出成绩,而如果挖出谭泰平等“隐藏多年的阶级敌人”则可以“放一颗大卫星”,缪正龙可以升官,李爱芝可以由农村干部转为国家干部。江浩明则是为了转移斗争目标以求自保,所以经李爱芝动员,也积极加入了揭发谭、黄两家的行列。

仇、江的揭发材料对前文所述那些众所周知的事情肆意夸大,并凭空捏造,加入大量不实之词,例如仇科富说:“谭泰平是自首变节分子,自首以后参加国民党,当过伪保长,管公堂。他从不劳动,屋里雇有长工、月工、零工,有土地、房屋出租,有六砣洋纱放账(高利贷),有一百块银洋的

流动资金。没有划为富农,是因为谭的爱人(毛远明)与土改队政委刘高俊打皮裯,得到刘的包庇。黄玉堂解放前雇有长工、机匠,带徒弟,自己开花纱布庄、绸布庄,家里有田土出租,有四砣洋纱放账,还有半斤金子借给任十嫂。没有划地主也是多亏他姨姐的一身好肉。”江浩明也提供了大致相同的材料,只是江的材料混杂在大量自我交代和揭发其他人的材料之中,更加具有混淆视听的功效。

仅仅凭仇、江二人的揭发材料还不足以定案,李爱芝为了取得“旁证”,指使专案组采用指名问供、威胁“不作证也要划为漏划地主”的方法逼迫多人作伪证,又用改变笔录、伪造手模的方法“取得”谭泰平自己的“口供”,终于坐实了他的“罪行”和64%的“剥削比例”。1968年11月7日,向家人民公社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农代会主任等13人会议,审批、通过了梅树大队革委会“三查一清”的材料和报告,决定“谭泰平家定为地主,本人定为地主分子,交群众斗争、监督劳动改造”(当时平江县把补划成分的权力下放到公社)。

缪正龙、李爱芝对谭、黄两家的批斗极为残酷,本来经公社审批划为地主的只是谭泰平一人,但谭当时已76岁,体弱耳聋,缪、李认为不经打,斗争会声势造不起来,而其妻毛远明年轻十多岁,斗起来才有意思,因而把毛远明定为主要批斗对象,并让黄玉堂、毛远春陪斗。批斗会11月9至12日连开四个晚上,9日晚上主要是仇科富“揭发”,由于“揭发”过于背离事实,甚至说毛远明是冒充毛主席的亲属,毛远明进行了有力的申辩:“我是姓毛,是毛主席的侄女。我前头男人叫胡元普,是农民,不是伪军官。我在他家做童养媳,他是得伤寒病死的,根本不是我杀死的。我弟弟在长沙总工会工作,他有名有姓有地址,不信你们去调查。”缪正龙问:“你弟弟在长沙总工会搞什么?”毛远明说:“他在长沙总工会管几百人呢,难道总工会的负责人也会冒充毛主席的亲属吗?我的堂叔毛泽普现在韶山特区当书记,我的亲叔父毛泽葵、毛泽召都是革命烈士,你为什么不去问他们?”问得缪哑口无言。与会群众的同情心显然在毛远明一边,散会后回家的路上,仇科富被人故意绊倒,跌断了两颗门牙。

10日晚上,为了“压倒阶级敌人的嚣张气

焰”李爱芝首先对谭泰平拳打脚踢,把他打瘫在地,接着仇科富故伎重演受到毛远明严词批驳而陷入尴尬时,李爱芝又对毛远明拳打脚踢,并叫民兵脱光她的上衣,把两条光手臂用麻绳捆紧,“反弹琵琶”绑到颈脖,跪到高凳上接受批斗,其昏死倒地后,又把她吊到屋梁上,十几个打手(其中一个曾空手打断一头水牛的一只角)用拳、脚、肘子推来撞去。毛远明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大叫救命,但是当李爱芝要她承认是冒充毛主席亲属时仍然坚不改口,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则她实在没有。为了“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李爱芝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杉树刺、棉秆、火钳,烧起熊熊大火,把毛远明推到火上烤、烧,最后李爱芝从火堆中抽出火钳,捅进毛远明的阴部。批斗后缪正龙找毛远明谈话时,她的右手已经折断,头发已经烧光,遍身伤痕、血迹,一股浓血从阴道中淌出来,裤子里窝着团团大便。但缪正龙仍然逼她承认冒充毛主席亲属,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说她太顽固,11、12日晚上用“疲劳战”、“车轮战”继续批斗,绑、跪、吊、打。

公民的财产、住宅受到宪法的明文保护,西方更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之说,除了强盗抢劫、野蛮民族入侵、纳粹之于犹太人,正规的军队即使在战争中也不能随便侵犯民宅。但在上个世纪的历次运动中,抄家成风,成为堪与批斗“媲美”的另一道“风景”。在改划谭、黄成分尚未正式立案更未获得公社审批的1968年9月17日,缪正龙、李爱芝就以“第二次土改”“挖银洋、金子”为名对两家翻箱倒柜、掘地三尺、贴条封门,11月10、11、12日,晚上批斗,白天抄家,两家的房屋、家具、农具、餐具、口粮、布票全部被没收,谭家118件,黄家143件。两家人只得睡在牛栏、草堆里,用破缸煮饭,用树叶包着用树枝往口里扒。抄家财产均被李爱芝等作为“胜利果实”拍卖、瓜分(可见对于财物的贪心也是他们积极投入运动的重要动力),也有朴实、善良的村民买了盆、碗等转送给谭、黄两家人。由于连天的批斗、抄家,精神的凌辱、肉体的折磨和前途的无望使谭泰平、毛远明、黄玉堂、毛远春对人生完全绝望,11日晚批斗后,谭泰平出逃,想往长沙、韶山求救(因不识路、无盘缠在外流浪三个月后返回),李爱芝散布消息说谭泰平被山外民兵抓起

来后跳塘淹死,14日凌晨黄玉堂、毛远春投水自杀,15日毛远明听到妹妹、妹婿自杀和丈夫淹死的消息后,亦于16日凌晨3时爬进仇科富家门前的水塘自尽。

黄玉堂、毛远春、毛远明死后,缪正龙、李爱芝宣布他们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像死了一条狗”,“要继续进行批判”。不但拒绝家属和群众提出的退还抄家没收的部分衣物、粮食办理丧事的要求,还剥去黄玉堂身上一件青直贡呢寿衣(抄家时被毛远春埋在破粪缸底下未抄走,黄玉堂投水前穿上),三具尸体在禾场上摆了五天,谭德明(毛远明养子)、黄柏金(黄玉堂之子)四处磕头、哭告,激起村民的同情、义愤,经另一个大队干部董伯千向公社第一副主任曾大清要求,才决定退还一口棺材装殓毛远春,毛远明、黄玉堂用旧木板钉的木盒子做棺木。没有寿衣(毛远明皮破肉烂的尸体经水浸泡后胀破本已破烂的衣服,且近于裸体),黄柏金、谭德明与媳妇向光华脱下身上的衣裤给父母亲穿上入殓。

从1969年起,谭德明、黄柏金、向光华四处告状、申冤,要求给死者恢复名誉,退还没收财物,但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向各级法院、革委会、党委投寄的诉状都如石沉大海。其间缪正龙由公社副书记、副主任(三把手)升为书记、主任(一把手),直到1973年2月,还对找他落实政策的向光华说:“不给你落实,看你又怎么样?”毛远明、毛远春的堂弟毛远翥(岳阳石油站副主任)到平江县出差,从群众中了解到堂姐、姐夫受冤自杀的情况,写了一封长达30多页的申诉状,寄给岳阳地委和长沙、韶山的亲属,但是丝毫没有反应。又写了“迫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三位无辜亲属致死的罪犯为何不予处理?”的大横幅和详细冤情的大字报贴到地区革委会的大门口,但是大字报很快被人撕了,毛远翥还受到地革委干部的批评,劝他“少管闲事”。

经过与长沙、韶山的亲属反复商议,1973年元月,毛远翥写了一封“毛泽东主席(堂叔)亲收”的信用特种挂号寄给“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毛远翥虽然没有收到毛泽东的回信,但听毛远明、毛远春的嫡亲叔父韶山特区书记毛泽普说,听省里同志讲,毛主席读完信很伤心,沉默了老半天才说“罗姑娘、春姑娘(二人小名)我是心



《汨罗江上的冤魂》书影

中有数的，她们是清白的”。把信交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又把它转给了中央一个权力很大、负责人级别很高的部门，那个部门的首长批了“请湖南省委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几个字，将信转了下来。1973年6月，地、县委派出调查组，7月4日江浩明、仇科富、李爱芝三人被拘留（1974年元月3日转逮捕），缪正龙则于1974年3月27日拘留、4月8日逮捕。最终江浩明以“反革命阶级报复”罪名判处死刑，仇科富死缓，缪正龙、李爱芝各判有期徒刑八年。

以上内容均出自《汨罗江上的冤魂》一书，老翁著（未署真名，但书中提到其为湖南作家协会会员），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为纪实之作，除背景交代、人物内心活动分析和作者评述外，全部材料来自党政机关档案、法院审讯记录、判决文书和对当事人、事件亲历者的采访，内容真实、生动，没有丝毫的艺术虚构或夸张成分，却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发人深省。

上个世纪从土地改革起，经过复查、镇反、肃反、整风、整社、反右派、反右倾、社教、四清等多次运动，每次运动都无不涉及每个人的成分、历史、社会关系，在那时宁“左”勿“右”的气氛中，蒙

冤受屈者大有人在，而能够漏网的“阶级敌人”即使不能说完全没有，也是极其少数。因此再来一场如此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只能如书中所说的“是石头，砍三刀，是草根，刨十锄”，产生大量冤假错案是必然的，而不产生倒是非常奇怪的了。在这场运动中，全国到底有多少人遭灾受难是无法统计的，因为绝大多数受清查者并未正式立案，即使遭受批斗、酷刑而自杀，后来也无法平反。只是因为毛远明、毛远春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使案情得以“通天”，她（他）们才能够1974年就得到昭雪，并使冤案制造者以“反革命阶级报复”的罪名受到惩处。事件的过程受到作家的关注得以成书行世，流传下来，好像无数的古生物的尸体都已腐烂，只有极少数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形成化石，成为后来人们科学研究的材料。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以来对文革的反思非常不够，中学历史课本对之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且列为“只讲不考”，由于高考不考，许多教师就讲也不讲了。因此多数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对那一段历史知之甚少，认识模糊，以致“乌有之乡”网站等为文革招魂的言论尚有市场，其危害不容小视。《汨罗江上的冤魂》一书由于其所记事件非常典型，材料丰富，叙述翔实，思想深刻，无法否认，不容置疑，足以警醒国人，确实是了解、反思文革的好教材。■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凌霄参与“贵定反共救国军”疑团

○ 蒙 凯

1951年3月8日,在贵州省贵定县城南郊,一位73岁老人被处决。老人名叫凌霄,为贵州知名民主人士。凌霄为何被处决呢?这是一桩直到30多年后才予以平反的冤案。

一、凌霄其人

凌霄,原名时雍,字汉舟,1878年农历六月十九日生于贵定城关。1908年入贵州陆军小学(以下简称陆小)第三期学习,同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陆小学习期间,参加了由同盟会成员张百麟、周培艺(周素园,后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58年病逝)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贵州独立后组建军政府,凌霄即供职于军政府。后赴上海,参与反袁活动。凌霄于1914年7月8日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被任命为贵州支部长;1915年1月1日又参加了中山先生在东京召开的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大会。1915年夏末赴香港、澳门经营西南军事及党务,并助阎崇阶等组军讨伐袁世凯、驱逐广东军阀龙济光;1917年8月后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府参军,不久被派往四川,先后任梁山、南川、巴县知事。1921年5月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凌霄被任命为第三路游击司令,次年改任湘黔边防游击司令以助北伐,1923年3月改任大元帅府参军与第五师参谋长;1924年1月赴穗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被任命为贵州支部长。1925年3月中山先生逝世后,凌霄始终坚持新三民主义和三大革命政策,与蒋介石政见不合,故不为蒋所用。1928年被贬为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从此栖身上海十余年,写出了《贵州革命史》、《平越各县之变乱记》等书。

在上海及之后在贵州期间,凌霄保护了诸多共产党人。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张执一,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改革开放后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的陈沂,上世纪30年代均在沪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都得到了凌霄及其次子凌光亚(黄埔一期毕业,时任国民党宪兵第六团团团长,驻防苏州,负责南京、上海一线治安防务)的有效保护。当时凌霄虽处闲职,因系革命元老,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不满,凌光亚又是宪兵团长,作为党的重要地下工作者的张执一同志完全清楚这一情况,正好以其父子作掩护,故与凌霄交往频繁,常到凌家。某日在家中,凌霄当着张执一之面对凌光亚说:“我把张先生交给你。张先生要是出事,我唯你小子是问!”张执一能够顺利开展地下工作,当与凌霄父子的关照有关(见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原部长、离休干部惠世如同志1988年8月2日于贵阳的口述笔录,载于《贵定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第100页)。1933年,陈沂同志因参加反帝大同盟不幸被捕判刑,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凌霄及凌光亚应陈沂堂兄余万选(与凌霄第三子凌光欧在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第十期同学)之求,亲赴南京斡旋,出面保释,陈沂得以提前出狱。陈沂出狱后找到党组织,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陈妻徐励在上海病故,凌霄父子资助安葬;上海“八一三”抗战期间,陈沂奉命离沪到其他地方工作,凌霄父子资助成行。

1939年凌霄从上海回到贵定后,对中共地下贵州省工委主要负责人邓止戈,地下党员张恒、谭兆雄等在贵定的活动,都是加以保护的。

1944年黔南事变,日军迫近独山,地方主政、领兵者多主张焦土抗战,烧毁城池,“免资日寇”。独山县城民房被焚烧七天七夜即是惨例。当时,贵定驻军备齐汽油,拟烧县城,凌霄闻讯即严词制止,县城得以保全。对于当时大江南北踊集

贵定、流落街头的难民,经凌霄倡议,在城内多处设立了茶水站、施粥点、收容所等,给予救济、安置,深得民众称道。

凌霄还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贵定素为烤烟生产名区,原靠土法生产烟丝出售,生产者收益颇低。凌霄于是积极与乡人筹办久大烟庄,生产手工卷烟销售提高经济效益,被众推任董事长。后又拟将卷烟由手工卷制改为机制,因诸多原因未成。为搞活地方经济,又与人筹组贵定县合作社联合社,在理事会、监事会中被推为理事长。该社成为县内经营百货、食盐、存款、发电、电影、卷烟等业务的最大经济组织,促进了城乡物流。贵定早期无电,乡人在办电厂时,电线紧缺,凌霄即致函时任贵州省警备司令的宋思一(黄埔一期毕业,国民党中将,贵定人,1975年获释出狱),请其设法价购。宋后来即派员购回军用电线,从而解决了县城打米、照明等用电问题。所办上述诸事,得到地方民众赞誉。

二、凌霄之死

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了国民党军队,先后解放了大批县、市。是年11月12日,贵定县解放。当时凌霄就此高兴地对人说:“孙总理倡导革命,尚未成功,共产党来完成了。今后我们中国就有办法了。”耳闻目睹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凌霄称赞说:“真是王者之师,真是军令如山,纪律似铁。共产党有办法!”

凌霄与周素园等贵州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志同道合,素有深交。1949年12月贵州境内基本解放。为保护贵州知名民主人士,将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周素园经请示五兵团政治委员、省委书记苏振华后,给凌霄寄去短笺:“汉舟,见字速来贵阳。多年未饮贵定云雾茶,若有,希带来稍许来筑(“筑”为贵阳简称)。周素园。”

当时,凌霄胃病复发,接信后不久,1949年年末便打点行装赴筑,落脚于凌光亚的“汉园”宅中(上世纪50年代国家征用作贵阳五中校舍建设,得补偿款人民币9000元)。凌霄与周素园见面深谈后,依周所言,亦为养病,从此一年多未曾返回贵定。

在此期间,贵定发生了坚持反革命立场的众匪首次聚会,密谋策划,造谣生事,企图推翻新生人民政权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发生了以伪定南乡乡长李国恩为首组织的“贵定反共救国军”股匪胁迫不明真相群众,于1950年2月28日攻打县城的反革命暴乱等严重事件。当时交通不便,通讯落后,对于这些情况,距老家近二百里之遥,隐居贵阳、置身事外的凌霄在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全然不知。

平息匪患,捕获并及时镇压了罪证确凿的暴乱匪首,县境渐趋安定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根据上级指示,县委、县政府发动群众开展了征粮、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和“镇反”运动。1950年10月前后,在当时国家法制尚未完备,主要依靠政策指导运动,在具体办案中盛行“有罪推定”等情况下,地方公安机关某些办案人员在对被逮捕关押人员进行审讯过程中存在诱供、刑讯逼供等问题,围绕县的某些领导成员主观臆断凌霄当获死罪、决意处死的意图,采取诱供方式,动用酷刑,逼迫被审讯者按意图口供,进而给凌霄编织了参加“贵定反共救国军”的反动会议及组织反动组织的罪名。据有关人员回忆,“当时,在对凌霄的处置上,县委研究议定:尚无充分证据说明凌霄参加反动会议并组织反革命组织,故暂不扣押,否则好关不好放。现在群众政治阶级觉悟还不高,凌霄在民众中还有较高威信,且已73岁,如果对其处死,显得共产党太残忍,会丧失民心,引起社会波动。他既然躲到贵阳去了,群众会想,没有罪为什么住到贵阳呢?这样无形中会降低他在群众中的政治威信。”县委的这一意见部分是正确的,可惜未被某些领导人员所接受,未能贯彻执行。1951年3月初,凌霄被从贵阳家中逮捕押回贵定。3月6日公安机关提审凌霄时,按照审问,凌霄回答了个人简历和所任职务,并明确回答没有参加、更未召集过反动会议,没有组织过反动组织。但当时没有审判监督程序,这次提审既是一审,又是终审,没有死刑核准程序,不是审判委员会慎重研究量刑,而是长官意志自由裁量。因此,人们根本没有预料到,凌霄竟在被押回到贵定才几天,被提审后的第三天即被罗织以历史的、现行的反革命罪受到处决。

凌霄被镇压的消息很快传到省城贵阳，机关内外舆论大哗，省委书记苏振华、省长杨勇大为震怒，苏振华愤然说：“怎么把凌霄镇压了？唉！贵州专出这种事（独山高层民主人士莫凤楼一家几十口人刚被土匪杀害，现在又发生凌霄被错误处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苏振华同志等对凌霄被镇压感到很不应该，很惋惜。当时在省的贵州高层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李侠公、田君亮等闻讯震惊数日，沉闷数月。事隔八年的1959年，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张执一同志到贵州视察，由省委统战部惠世如部长（解放初期部长由苏振华兼任；惠先任副部长，后任部长）接待。惠世如同志介绍：“张执一同志下车见到我就问：‘贵州贵定县的民主革命人士凌霄在何处，搞什么？’我向他汇报说：凌霄在解放初期已被镇压。张执一同志听到后愕然，说：‘唉呀，凌霄这样的民主人士为什么会被杀了？’张执一同志接着向我介绍了凌霄、凌光亚在上海保护他的情况。”上文提及的陈沂在1988年9月19日、10月15日给贵定县政协的两次回信中，都表明了类似的态度。信中说：“我一直抱着感激的心情，记忆和

怀念他们父子……贵州解放后，我曾托乡人打听，终未得到消息。”“关于凌老被处决，我深感遗憾。我认为他是应该平反的。”

1980年贵州省法院系统对过去多年来屡访屡诉的历史申诉案件进行大复查。饱受凌霄冤案株连之苦的亲属在此前后多次向县、省人民法院提出平反冤案的申诉。是年11月，贵定县法院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认定凌霄与当年贵定的反动组织、反革命活动没有任何牵连。1991年贵州省高院对凌霄案件进行调卷审查，明确指出原判认定凌霄的犯罪事实失实，并致函贵定县法院。1991年10月5日，贵定县以（91）告申复字第10号刑事判决书宣布：“撤销原判，宣告凌霄无罪。”■

（作者为贵州省贵定县经促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 / 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一个生产队的死亡档案

○ 金家富

重庆市涪陵区李渡镇红星村三组,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为四川省涪陵县马鞍公社妙音二队。当时有73户家庭,299人。1959年至1961年间,除孤身老人朱吉云在敬老院病故属正常死亡外,因食物短缺,先后患浮肿病致死的有44户、75

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60%和25%。其中男51人,女24人,有10对夫妇双双死去(其中青壮年6对),留下孤儿;有28个青壮年男人丢下孀妇或尚未婚配;有11个儿童、少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详情见统计表:

户主 家庭人口 死亡人数 死者名录

况吉祥	8	2	况吉祥、况道芬
李绍云	3	1	李绍云
朱代贤	2		
郑群一	5	1	郑群一
何素芳	6	1	何素芳
朱吉云	1	1	朱吉云
胡宗义	6	2	胡宗义、胡正兵
吴春山	6	2	吴春山、冉翠娥
吴新民	4	1	吴新民
尹慎终	5		
张青云	7		
张增义	2		
张庆云	3	2	张庆云、罗纪淑
胡良民	4		
刘世义	7	2	刘家明、一女孩
刘世禄	4	3	刘世贵、刘郑氏、刘世成
张焕江	5	1	张焕江
张焕湘	2		
张绍成	4	2	张绍成、张钧华
冉相成	8	2	冉相成、冉均武
何建章	6		
唐万全	4		
雷纪先	4	2	蒋树贞、雷毛毛
贺光明	3	1	贺光明
王传武	4	1	王传武
徐世贵	1		
张茂周	5		
张茂青	1		
卢治芳	2		
罗吉永	6		
吴庆祥	5		
张益吾	3	2	张益吾、张书流
张书云	2		
刘有才	4	1	刘有才
蓝顺禄	2		
刘有成	3	2	王正华、牛儿
熊心玉	2	1	李素华

户主 家庭人口 死亡人数 死者名录

刘俊	4	2	刘俊、何映莲
傅苑声	7	4	傅子清、子清妻、孙朝芳、傅以杰
罗富民	6	1	罗母
王寿全	4	1	王寿全
张有禄	6		
王明高	4	1	王明高
王春木	4	1	王春木
王宝卿	5	2	王宝卿、吴庆芳
张增祥	4	1	张树云
王顺元	6	1	王顺元
游平安	1		
刘朝高	3		
张绍明	7		
吴银章	3	1	吴银章
叶万发	4		
冉子云	7	3	冉子云、冉兴贵、冉兴贞
况银廷	8	2	况银廷、一女孩
夏庆余	4	1	夏庆余
王孝龙	4	2	王孝龙、王正良
张治华	5	2	张治华、贺林贞
王明武	5	4	王炳田、炳田妻、王明武、姜均芬
郭炳成	6	3	方素贞、郭金祥、韩善华
彭银章	5		
瞿宝成	3	2	瞿宝成、瞿妻
唐银山	3	2	唐银山、唐二娘
李金胜	3	2	李金胜、张书华
刘树槐	2		
何炳武	3		
张治秀	3	2	刘箴刚、一男孩
魏玉清	3		
罗宗禄	2		
刘凤池	2	1	刘凤池
卓世贵	3		
赵炳武	5	1	赵炳武
张增福	3		
张时韩	3	1	张时韩
总计	73	299	76

关于“食物短缺”的成因与程度

一、1958年秋收之前已建立公共食堂，秋后成立人民公社，精壮劳力大炼钢铁，农业实行大兵团作战，在“三年不种庄稼都吃不完”的谎言误导下，“敞开肚皮吃饭”，较正常情况下超支了大批粮食，是年，晚稻和红苕本来收成都很好，但到收获时，农业上的劳动力已严重不足，为了突击完成任务，先后由李渡小学的学生帮助割晚稻，后来挖红苕又不准用锄头，而是派人牵牛去犁，捡起来多少算多少，又抛撒了一些粮食和薯类，给接踵而至的三年饥谨埋下了隐患。

二、1959年片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实行“少种、高产、多收”，小麦以用种量测产量，开厢撒播，每亩用种五六十斤，包谷搞定向密植，株距3寸，单株摆播，水稻栽“双龙出海”，株距2至3寸。如此过度密植，致使全年大减产，加之征购过头，又没收了社员的自留地，秋收之后即出现了饥荒。当年秋播时，因为饥饿，社员们已开始上坡上背着干部生食葫豆种，次年春砍菜头时又生吃青菜头，浮肿病人大量涌现（驻妙音一队的县妇联干部王亚平也全身浮肿），大队建立营养医院收治病号，食量大的青壮年开始死亡，土地成片荒芜。

三、1960年，笔者先后在马鞍公社任基干民兵连文书、文化站长、扫盲专职教师，有时下大队食堂吃饭，一张饭票只有一个淀粉粩（用石灰沅包谷壳取浆制成），或干脆只有一碗红苕叶。县委调研组干部张富易，一次在妙音三队筲箕塘伙食团进餐，社员幸仁义准备倒了的红苕叶水（里面有盐味）他都去接来吃了。是年春，我任公社基干民兵连文书时，接到石马大队的几份检举材料，说该大队六队张家坡有一个姓张的青年（名字已记不起了）及其老母在家煮食人肉（小孩），被发觉后，队上干部收去在地坝脚埋了并泼上大粪，那老妇人还去刨出来啃吃，后来在太乙大队朱家堡逮捕那青年时，他旅行袋里还装着一块人肉。

四、1961年农村人口吃粮标准最低时，成人每月只有7.5市斤，加之几年来除春节和营养医院的病号外，一直都没有肉、油、糖、酒供应，饥饿难耐，不少人开始用观音土充饥。本院冉相成、冉

均武父子吃了拉不出来，只好让其妻去掏，以后不久就先后死去，我大母何素芳也因为吃多了观音土，损伤了内脏，逐渐消瘦，在那年冬天含恨而亡。笔者亦因吃观音土导致痔疮严重，迄今，已先后动过四次手术。

当时人死后，安葬也极其潦草。我大母死后是用楼板钉一个棺材埋的。邻居未婚女青年况道芳死后，是其母用席子包起捆好，由我与何炳武用扁担抬去埋的。那时我们也没有多少力气，只是胡乱挖了一个坑，把尸体放下去，然后把泥巴传拢来盖上了事，根本没有去垒坟头。

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三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风）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时，妙音二队附近东有涪三中、西有涪陵专科学校两所校地广阔的学校，学校农场和李渡镇蔬菜组种植的南瓜、白菜、萝卜可供社员窃取，不然，还会饿死更多的人。■

（作者为《涪陵市志》原副主编）

（责任编辑 洪振快）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①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②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③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④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⑤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收 邮编：100025

电话：010-57733087、57733086、57733088；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高晶、文馨、伽悦（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我所了解的“半夜鸡叫”真相

○ 孟令骞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60多年中,影视、文学作品与似史非史的各种叙述,将“周扒皮”与“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并列为“四大恶霸地主”,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在树立“新旧社会”好恶观念中,可谓标志性符号。

“周扒皮”这一人物,最初来自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是一部独特的作品,书名即主人公之名,也是该书作者的名字。此书人物均用现实中的真名真姓。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也被真名实姓写进书中,被赐绰号“周扒皮”。出于时代政治需要,该书被推向全国,编入教科书,产生了巨大影响。

与其他文艺作品不同,至今仍健在的《高玉宝》作者高玉宝坚称书中所写为真实事件,而且多年来在大陆各种新旧社会对比性质的叙述、教育、展览中,《高玉宝》一书中的许多内容又常被作为真实的历史来看待。尤其是“周扒皮”半夜学鸡叫逼长工下地干活的故事,一直令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

因《高玉宝》一书,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后人深受牵连。改革开放之前,与“四类分子”(地富反坏)的后人一样,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成为被运动对象,备受歧视和冷遇。

“半夜鸡到底叫没叫?”“周扒皮何许人也?”“《高玉宝》一书如何成书?”连续有五年时间,我为此到处奔波,收集资料,逐一进行了考证。

我在自己所写《半夜鸡不叫》一书中最终向世人还原事实真相:周春富,辽南农村的这个勤俭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既不是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也不是在传统农村占有积极影响的乡绅,他只是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不幸死于激进的批斗之中的小人物,后来因为一部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而为人所知,成为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这个在意识形态的层层油彩

中成为特殊年代阶级教育的反面典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要件集纳在一起“加工定制”而成的产品。所谓“半夜鸡叫”纯属虚构。

起意追寻真相

我的家乡在辽宁复县(现大连瓦房店),那里就是“半夜鸡叫”故事的原产地。

“周扒皮”和“半夜鸡叫”的故事曾陪伴我度过屈辱、自卑的童年。

因得到早教,我七八岁就认识很多字。我到邻居家玩,邻家的大孩子经常特意给我看课本中的《半夜鸡叫》,我当时觉得这个故事特有意思,不认识的字还向对方请教,在读到小玉宝用计痛打“周扒皮”时,我会与其他孩子一样哈哈大笑起来,尽管我当时不太明白,为何一向吝啬的邻家孩子,每次都会慷慨地借给我课本读这篇课文。

一次,在跟村里孩子吵架时,那些孩子突然指着我喊“周扒皮,周扒皮”,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母亲姓周,进而邻家孩子以往古怪的笑容也浮现在我眼前。我仓皇逃回家,问母亲“咱家是不是‘周扒皮’?”,母亲先是一怔,然后重重地给了我一耳光。我哭得很伤心,母亲搂住我,跟我一起哭了起来。

此后,我变得敏感、自卑甚至低人一等。上小学四年级时,打开新发的语文课本,我发现自己最不愿见的那篇文章《半夜鸡叫》赫然出现在课本中。

上这一课前,我有一种大限将至的感觉,希望自己病倒,希望老师有事。没想到,上这一课的那一天,老师第一个便点了我的名字,让我朗读课文。我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含着泪水读完课文,两腮发烫。那一节课老师在讲什么,我已无心留意,但同学们的窃窃私语我却听得很清楚,同学

们都显得兴奋,因为他们亲眼目睹和证实了一个传闻。

时光一转眼到了2003年初,互联网早已兴起并普及,我在大连地方的门户网站“天健网”发了一篇5000余字的帖子,名为《故事和“半夜鸡叫”有关》,讲述自己母亲家族的一些见闻。论坛一下喧嚣起来,参与讨论者甚众,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传闻纷纷登场。但当时国内将要召开一系列重大政治会议,各级宣传部门严把舆论关,这个帖子最终因为涉及敏感历史问题而被删除。



周春富老宅,始建于1911年(摄于2006年)

这件事给我震动很大。老实说,自己家的事知道一些,不过要让我把“半夜鸡叫”有关的整个大背景的来龙去脉说个清楚,道个明白,那时的我却都没有这个能力。高玉宝怎么从家乡走出去的?曾外祖父的命运与时代有何关系?《半夜鸡叫》的故事如何走向全国?那时我对这些事也只会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和似是而非的概念。此事让我决定冷静下来,去思考一些问题,追寻逝去的岁月,考证细节的真伪。

我因此展开了一项行动,追溯并考证家族的历史。自打那时起,我几乎所有的双休日和节假日都用于出入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旧书市场,采访亲属、朋友和当事人,请教史志专家,刻苦阅读历史、政治、军事著作,甚至还学习与“鸡叫”有关的动物学、气象学以及农学知识。

这种考证对我而言是异常吃力的。首先要了解时代大环境大背景,然后是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家乡历史涉及民国、伪满、内战、土改、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改革开放新时期等阶段,需要在此背景依托上,细看辽南乡村的种种生活细节,土改前后的变故、扫盲运动中典型的诞生以及工农兵的时代印记等等。

所幸,渐渐从杂乱到理性,从混沌到清晰。

“周扒皮”其人

我对曾外祖父周春富的所有认知,均来自周

家后人、旧邻的回忆和几位在世长工和短工的描述。

家里已经找不到一张他的照片。在1947年的土改运动中,他在1911年建的几间石头房和所有东西被分光,房子分给一户贫农居住,至今保留在瓦房店阎店乡,成为那个村子最老的房子。这里现住户叫高殿荣,我2006年第一次见到她时92岁。她回忆,当年这里原先分给一户贫农住,人家嫌房子不好,占了她家的房子,把她撵过来住。她家当年成分也不好。她回忆周春富:人不恶,是好人。

曾外祖父周春富原来也是闯关东落户辽南。通过勤俭持家,不断攒钱买地,开了几个小作坊,成为殷实之户。至上世纪40年代末期,家里已有近200亩地。家里有五男三女,有大有小,地里和作坊忙不过来,就陆续雇起长工和短工。老头雇人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庄稼活好。

曾外祖父人勤俭仔细是有名的。儿女们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老头不仅对自己特别抠门儿,对家人更是如此。碗中剩下的粉条,得捞出来晒干,留着下一顿吃。老头向儿女们提倡:饭要吃八分饱,吃多了,剩下的都成臭屎。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不能过夜,因为这样会多吃一顿饭。相反对长工一直很客气。

王义楨1942年开始,给周春富做过近两年长工。我先后三次见过他,他能对我很清晰地回忆老东家:

我去那年（周春富）老头60岁。不闲着，铡草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夏天上身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的。人会打算，仔细。老头有个特殊要求，伙计也好，儿女媳妇也好，不准穿红挂绿，干活怕沾灰就不能撒手干。我20出头，老妈给做件小白褂。老头说，王伙计给你染染吧，不要你钱。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老头对儿女严，人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屎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我在他家早起是不假。人家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挎着筐拣狗粪。

曾外祖父家乡复县阎店乡和平村黄店屯，在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境内。东北光复后，国共两党在复县城乡，展开血腥残酷的拉锯战。

“二次解放”后，黄店屯最激烈的变化，就是土改工作组进村了。1947年12月底，大雪连旬。曾外祖母被逼去邻乡亲戚家找浮财减罪，跌死于雪岗。周家的户主周春富，在两次划成分中被划为富农，因有小作坊被划做双富农，等同于恶霸地主，被当作“阶级敌人”的典型抽打而死。

我后来在瓦房店县志中看到，当年复县有耕地200万亩。全县9万户，地主占2000户，富农7000户。头三号地主都有几千亩以上土地和其他财产。周春富还属于富农行列，但拥有土地不到200亩。因此可以算出他在复县财富榜上的位置，应该排在2000名之外。

复县土改前国共两党的你来我往争斗被称为国共拉锯。其后的土改又被称为流血斗争，简单、粗暴。究其原因，一是东北内战在即，动员农民参军火急；二是土改队如同今日拆迁队；三是分土地或抢浮财令盲从者人性阴暗……当地档案工作者刘宝贤接受我采访时说，实际有1900余人，死于那场暴风骤雨中。但在档案文字上只用三个×代替。

后来土改纠偏，曾外祖父再次被划为富农。瓦房店档案馆现存原复县阎店乡的1960年的“落改”材料证实周家的富农身份，这也是我在搜

索曾外祖父周春富家资料时唯一见到的“文献”。

在这份纸张发黄的手写落改报告中，列举了有220户的和平大队的七户地富反坏分子和新哇三名地富反坏分子作为“敌人”的活动情况。曾外祖父三子、本人外祖父周长义的名字赫然列入其中。开篇的背景文字直接提到，和平大队解放前深受日寇和国民党残酷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在臭名远扬的“周扒皮”等封建恶势力的压榨下，民不聊生、不得温饱、逃荒甚多……

当年土改时，从方法到概念，均效法苏联，把相关的意识、话语植入农村；中国农村原来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乡村秩序，均被阶级意识和话语所颠覆。曾外祖父周春富只是在这场暴风骤雨运动中的一个不幸的小人物，不过老头自己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死后却成为“恶霸地主”的典型之一，闻名全国数十年。

“文革”期间，曾在周家做过长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忆苦思甜”，揭露“剥削故事”。孔兆明讲着讲着却走了嘴：我们当时在周家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吃的好多了……当时在周家一年能挣8石粮，可养活全家……孔兆明于是被干部赶紧拉下台。

半夜，那鸡到底叫没叫

《半夜鸡叫》中的地主周春富，是我曾外祖父的真名实姓。在书中，周春富因“残酷剥削”长工而有“周扒皮”绰号，为催大家早点上工，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引起公鸡们打鸣，后遭小玉宝设计痛打，这是其中最生动、最著名的情节。

近年来，有不少作者撰文指出，无论从农学、动物学和当时农村普遍租佃关系的史实来看，这些细节都与事实相悖。大连地区养鸡30年的高级畜牧师房司铎做过研究，他曾给我做过科普，他认为公鸡啼鸣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是成年公鸡，二是必须自然光感刺激。辽宁南部农村锄地一般在小满、芒种至夏至季节进行，日出时间是早上4时28分。黎明出现在日出前一个小时，亦即早上3时30多分钟，太阳微弱的辐射光即可对鸡的视觉发生刺激，产生啼鸣条件反射。但这时的光线很弱，人的视觉还不能对物体的细小特征进行识别。所以在半夜三更（即午夜12

时),在一片漆黑条件下,更不能从事田间操作了。就算是把长工赶到黑灯瞎火的庄稼地里,也只能是要长工换个地方继续睡觉。

从上世纪40年代初到1947年辽南土改期间,曾外祖父周春富家里,老大、老三负责种地,老二跑外做生意,其他孩子读书。因为人手不够,陆续雇过长工和短工,从两三人到六七人都有。都有名有姓。高玉宝虽然自称在老周家放过猪,但周家人从来没见过高玉宝。

一直和雇工一起干活的外祖父周长义排行老三,我每次回乡都要见一见他。他2008年春节过后离开人世。90岁了的老人知道我在做什么事。他见到我就重复一句话,咱家没剥削过人,也从没见过高玉宝这个人……他口角流涎,老爱重复一件事,这件事的时间、地点、人物,一直在他日益老化的头脑里很清晰:

1963年春夏之交,他(高玉宝)来了一趟。我和人正在地里干活。高玉宝40岁模样,招呼大家一起要开个小会。黄店有两个生产队,山后队的人没理睬他。吕××(姥爷说话含混不清,我听了几回都没听清这个名字)跑过来了,吕参军回来当队长和把头组长(五副犁铧一个互助组),领着高玉宝,现找了几个人,高玉宝隔老远在地里给几个人握手。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到高玉宝。高玉宝对我说:谁说我没在你家干过活?我学木匠时还给你家做过马槽子。这事很多人都清楚。人家来调查,你们照我那样说没有错。高玉宝又说他现在很烦恼,小人多。他又对我说,写“周扒皮”不是写你家的事,不是写咱这地方的事,但天底下能没有这样的事吗?小说是拿(到)全国来教育群众的,有没有重名重姓的,肯定有。回去告诉你们家里大人和小学生,不要乱讲话……

据外祖父周长义回忆,高玉宝这番话那个上午讲了“六千遍”,中心意思就一句:外面来人问要回答,我在老周家干过活。

1963年的年度关键词是忆苦思甜。这似乎可以为高玉宝急着到家乡“开小会”做注脚。

给曾外祖父家做过10年长工的刘德义,解放后做过大队的贫协主席。在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教育,各地陆续有人来阎店乡参观取经的大背景下,也被上面如此“开小会”耳提面命。他1978年去世。他的儿子告诉我,那时候高玉宝回乡做示

范报告,说毛主席是他后台。他爹被安排同台做报告,因直说自己是如何干活、很少说周家如何不好而被批。他也从来没听他爹说过周春富家半夜学鸡叫。

上世纪90年代后,有一个说法,高玉宝后来很少回乡。因为乡里乡亲后辈晚生总有人问他,是否真有“半夜鸡叫”这回事?我也在一篇报道里看到这样的文字,高玉宝作报告忙,姐姐去世了也没回乡。

上世纪50年代初期,高玉宝就开始作报告。1990年代退休后职业性作报告。据统计,他被全国20多个省、市,数百个单位聘为名誉主任、顾问、德育教授、校外辅导员,讲述革命故事。其中,“周扒皮”与“半夜鸡叫”自然常是报告中最生动的故事,也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至2009年建国60周年,他陆续在全国作报告累计4000场,听众5000万人次。

虽然后来他说《高玉宝》一书的主人公故事“似我非我,他中有我,所见所闻,集中概括”。但他公开场合一直在坚持“半夜鸡叫”是真的。他村里四个地主都半夜学鸡叫,写书时给集中到“周扒皮”身上了。这一点,搜索他作报告的当地媒体新闻报道可以知晓。为了逼真地形容“周扒皮”如何学鸡叫,高玉宝练就一门公鸡啼鸣口技。我本人在2005年的大连电视台的鸡年新春联欢晚会上,就看到年近八旬的高玉宝被奉为上宾,现场表演了一段生动的鸡鸣。

作家神话背后

高玉宝一书是如何写作的,“半夜鸡叫”是怎样来的?

我为此翻阅过1950年代到1970年代《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的所有合订本,并三次探访高玉宝,但得出结论都类似于模板式的答案。

高玉宝写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1955年出版发行后,一版再版,共印行500多万册,国内用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译成近20种外文印行,仅汉文版就累计发行450多万册,成为解放后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

按照高玉宝的自述,1948年参军时的高玉宝是个典型的文盲,但革命战士是不怕任何困难

的。一年之后的1949年8月20日,高玉宝开始动笔撰写自传,此时的高玉宝仍旧是字画结合、以画代字,如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就画个可怕的鬼脸来代替;“杀”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头,然后再在这头上画把刀;“哭”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脸,然后在这脸上点几个小点儿。还有很多字无法用图形画或符号来表示字意,高玉宝只好画一些小圈圈空起来,等学会了字,再添到圈圈里。如此说来,此时的高玉宝恐怕还在文盲之列。

但奇迹在两年后发生了,1951年1月,高玉宝完成了长达20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草稿。经人指导,小说《高玉宝》的部分章节经修改后陆续连载。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单行本,更是推出了集作者名、书名、主人公名于一身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

高玉宝等人的出现,几乎空前绝后创造了文盲成为作家的先例,不仅对全军全国扫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成为工农兵进入文学领域



纪实小说《高玉宝续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封面,下方高玉宝的入党申请书部分文字以画代字

的一个最鲜明的标志。文学正史无前例地成为意识形态的代言人。随着高玉宝的走红,“周扒皮”也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高玉宝本人曾20余次受到毛、刘、周、朱、邓等领导人的接见。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半夜鸡叫》更成为忆苦思甜,进行革命教育的经典教材。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国文在总结中国文学50年(1949~1999)时,直接将高玉宝一类的文盲作家归为“描红作家”。我曾在这段时间里连续寻找当年的若干文盲作家的踪迹,得出结论:此言不虚。

1950年代,与高玉宝同期的文盲作家崔八娃的成名作《狗又咬起来了》前后修改近40遍。后来陨落乡野的他去世前曾向他人交代,四年时间写过的20多篇小说只有一篇为个人创作。而高玉宝写出《高玉宝》后被送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班学习,却一连40年没有出作品。期间,1970年代反映“周扒皮”家乡变化的报告文学《换了人间》,为另外三人执笔他一人署名。

高玉宝多年来一直对外宣称其《半夜鸡叫》等自传手稿被军博收藏。但我几经实地调查,军博文物处并没有他的自传原稿。

到底是谁成就了《高玉宝》?难道也是集体创作所成?最后一个叫“荒草”的人进入视野。

我在搜寻史料时,从古旧市场淘到最初的《高玉宝》版本,由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现后记中有荒草的《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的线索。我开始苦苦追寻,荒草到底是谁?他与《高玉宝》到底有何渊源?

在上世纪50年代的《人民日报》等媒体中,荒草曾接二连三撰文宣传高玉宝。荒草,原名郭永江,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其他的则几乎一无所知。

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唯一得到的信息。这期间我又奇迹般地,与荒草同岁的大连的亲友阎富学偶遇,和当年与荒草、高玉宝一起共事过的《解放军文艺》助理编辑、78岁网友“一博为快”老太太结缘,但都收获甚微。所得到的信息,只是简简单单一句话:曾指导高玉宝写作。

一直到2008年,通过四川资阳文艺网一篇文章,才有了重大突破。文章介绍说,《高玉宝》长

篇自传体小说,13章12万字,为资阳的作家郭永江所著。在半信半疑之下,经当地作协主席唐俊高介绍,最终找到了当地从事史志研究的作家王洪林,王与郭永江生前有密切的书信来往,有丰富的资料。我这才详尽了解到关于“荒草”其人与《高玉宝》成书过程。

郭永江1916年出生,1940年到延安,创作歌剧《张治国》,反映八路军大生产,受到毛泽东称赞,1951年赴朝鲜采访,后与魏巍同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可到40岁就病退,70年代回故乡资阳居住,不久迁到资中,1984年居重庆,1993年病逝。

郭永江临终前,在信中对王洪林说,当年《高玉宝》一书13章均为他所写。

当时全军为配合扫盲,树立典型,让他帮助高玉宝修改自传,他向组织表态要随时付出生命代价来修改好这部书稿,做好幕后英雄……但高玉宝的原稿实在太差,他无法修改,最后在组织授意下干脆代笔。他写完一章,高玉宝照着抄写一章,然后组织上拿到《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稿酬平分。不过在反右之后,郭永江的后记和名字逐渐退出再版的《高玉宝》,郭永江从“帮助修改”到“提供辅导”,最后到彻底退出的过程,均是出于组织上的要求和当时的政治需要。但在他临终前,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郑重声明《高玉宝》是他的著作。

从事家乡史志研究的王洪林受我诚恳相求,于2008年10月专门去重庆代我探访过郭永江后人。

“周扒皮”和“半夜鸡叫”,都是根据需要制造出来的。

具体过程,简单地说,“周扒皮”的制造经过是这样的:1950年代初期全军全国范围大扫盲。文盲战士高玉宝表现积极,用画字的方式写自传。(高玉宝早年画的字,后人在他90年代开始



《解放军画报》(总第16期)刊登的荒草帮助高玉宝修改文章的照片

展示的入党申请书可以看到)被部队推为典型上报。穷苦出身的战士不仅学文化还能写书,批判旧世界歌颂新世界。为了把这个典型放大,部队派专业人士帮助高玉宝。要体现旧世界之黑暗,地主阶级之罪恶,为了使书更能教育人,就要移花接木、改头换面进行深加工。为了表现真实,书中一切都采用真名真姓真地点,自然发生的“故事”就是真实的。至于坏地主半夜学鸡叫,纯属灵感来袭。郭永江其子女介绍,其父荒草晚年讲过,“半夜鸡叫”是根据民间传说加在周春富身上的。

而为什么只写了周春富“周扒皮”,而没写王春富“王扒皮”,这是因为周春富在高玉宝的家乡土改过程中,被作为恶霸地主批斗死去。高玉宝当时结束在大连流浪生活回乡当上民兵,这是他在日后参军在部队搞的诉苦教育中可以就近找到的“控诉”对象……

我的外曾祖父因此成为“周扒皮”。这是他的第一出“幸运”。而第二出“幸运”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的阶级斗争中,“周扒皮”成为阶级教育中的反面典型。全国周姓同学都得到一个天然的绰号:“周扒皮”。第三次“幸运”是在改革开放后成了一切苛刻自私霸道的无良雇主的代名词。这是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绝对没有想到的,也可能是当年的“周扒皮”制造者没有想到的。■

(作者为辽宁省大连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川康民盟冤案是怎么造成的

○ 金拾珊 张宁

《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刊登了童梓平《一个沉冤几十年的大案》一文，记述了1949年民盟四川支部在西康组织民间武装，配合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位川军将领的反蒋起义，并阻击胡宗南的部队经西康南逃，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支起义队伍却被定性为“以张志和为首来荣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性质的武装组织”，致使145名民盟领导的起义有功人员冤死，数百人受株连，并殃及子孙，所有这些被关、管、杀人员两代家属子女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

该文对“以张志和为首”的张志和以及川康民盟冤案的来龙去脉介绍未详，而张志和恰好是我们的岳父、父亲，故我们想就自己所知的情况做些补充，以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川康民盟冤案的来龙去脉

实际上，川康民盟冤案肇始于民盟内部。

1950年2月1日，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军进入雅安城。2月3日，六十二军政委、中共西康区委书记廖志高通知西康民盟支部筹委会负责人彭迪先去谈话。廖说，你们民盟总部有指示托解放军转达你们：西南情况复杂，民盟组织不纯，总部不予承认，应停止活动，听候整顿。（彭迪先《我的回忆与思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19~122页）

“总部不予承认”的消息对于此刻正为解放军到来而欢欣鼓舞的川康民盟成员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民盟转入地下以来，他们留在西南出生入死从事革命活动，最后竟然不被总部承认。彭迪先从廖志高处返回，不得不流泪摘下民盟西康省支部筹委会的吊牌。

那么，民盟总部对川康民盟不予承认的决定是在什么时候做出的呢？

民盟总部迁往香港后，四川民盟在1948年两次派人前往请示汇报，民盟总部对四川民盟工作均有具体指示，显然不存在总部不予承认的问题。

1949年12月刘文辉等在彭县通电起义后，在王陵基军队进攻雅安企图打通南逃之路的危急时刻，张志和通过雅安的秘密电台向周恩来告急，请求解放军尽早进军西康，周恩来于1949年12月17日回电：

“张志和并转刘、邓、潘三位先生：第二野战军刘、邓来电，转如下：恩来巧记亥（按：18日24时）。‘军委：我先头十七军已于铣日（按：16日）攻占乐山、青神，正向西进发中，战果待报。十一军，十二军今（莪）日（按：17日）可达新津、彭山、岷江之东岸地带’特此转告。”

周恩来将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报告二野进攻态势的重要军事电报，全文转发给张志和，充分表明周恩来对张志和及其领导的四川民盟高度信任。如果此时民盟总部已经不承认张志和领导的四川民盟，必然会在第一时间向中共方面通报。因为此时正是解放军进军四川和西康的关键时刻，民盟作为与中共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民盟总部绝对有责任提醒中共不能相信“组织不纯”的川康民盟，否则将会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而从周恩来以重要军事电报转告张志和一事来看，此时中共方面显然并未得到民盟总部的通报。换言之，此时民盟总部并未对川康民盟不予承认。

那么，从1949年12月17日周恩来回电张志和，到1950年2月3日廖志高向西康民盟负责人彭迪先转告“总部不予承认”，其间短短一个

多月时间内,为什么民盟总部对川康民盟的态度会突然出现一个180度大转弯?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更令人震惊的是,川康民盟冤案发生35年之后,原四川民盟负责人张松涛、赵锡骅两同志提交报告,建议民盟中央对川康民盟冤案进行纠正。民盟中央组织部正式答复:“经过仔细查找,没有找到当时总部曾作出过不承认川康地下盟组织决定的文字材料。”(“民盟中央的复文”,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盟中组[1985]字第017号,载代惠群编:《松涛遗稿》第261页)民盟中央组织部还表示,不仅没有找到总部曾作出过不承认川康地下盟的材料,找到的却刚好相反,其中明确规定是:“一律承认,统一整理。”(张松涛:《民盟中央组织部盟中组字[1977]147号文读后志》,见《松涛遗稿》第427页)民盟中央组织部还说,也没有撤销潘大逵、张志和等领导职务的记载,只有任命他们的记载。(“叶笃庄致张松涛的六封信”,见《松涛遗稿》第389页)

由此看来,所谓总部“不予承认”一事,其中大有问题!

这个极不正常的现象背后,正是造成川康民盟冤案的关键所在。

历史事实是:当时请托解放军负责人转告“总部不予承认”的,并非民盟总部,而是民盟总部的西南特派员楚图南。1949年岁末,这位“钦差大臣”刚刚从北京南下至重庆,下车伊始,为什么立刻就做出“西南情况复杂,组织不纯”的判断呢?这是因为听信了诬告者的一面之词。

出面诬告川康民盟的人名叫肖××。由于此人是制造川康民盟冤案的始作俑者,对他的情况有必要略费笔墨加以披露。

肖××原任民盟成都市分部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经民盟推荐任协进中学校长。协进中学是张志和与陈离、余中英等刘文辉部的师、旅长集资合办的私立中学(即现在成都市第二十八中学)。学校领导人和主要教学人员都是中共党员、民盟成员及进步民主人士。1947年四川民盟登报声明停止活动而实际转入地下之后,曾征询肖××是否愿意转入地下继续工作,肖表示不愿参加地下活动。不久,肖发现协进中学民盟仍在地下活动,来函质问张志和:“听说你们在搞地下工作,你们是奉总部命令干的?还是盟员大会叫

你们干的?如果两者都不是,你们就是非法组织,我要登报声明与我无干”。(张志和:《我的另一工作报告》,载四川省邛崃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张志和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336页)

当张志和等四川民盟成员致力于反内战民主运动和川军上层统战工作之际,肖××却离开四川,先后到了香港、北京。1948年他到香港即向民盟总部诬告四川民盟地下组织为非法。张松涛到总部汇报工作时得知后,及时向总部作了说明。总部负责人周新民、李相符未采信肖××的诬告,均对张松涛表示没有关系。1949年肖××到了北京,为争政协代表,肖向民盟总部控告,称四川民盟领导人是“公开出卖民盟,勾结国民党特务”,川盟地下组织是“以反共为核心的非法的纯粹民盟”。幸而其后不久,四川民盟负责人范朴斋到京获悉此事,在民盟总部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辛志超四位负责人主持的会议上与肖××当面对质,一一批驳诬蔑不实之词,肖××被驳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范朴斋根据肖××控告内容,事后系统写成了《答辩笔录》留存。当时,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辛志超均认为是肖××不对,但由于种种原因,对这种诬告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严肃处理,只是视为内部的意气之争。总部负责人或批评肖××“主观”,或说他“似乎有些神经”(张松涛:《应当恢复解放前川盟地下组织及其领导人的本来上面——纪念民盟四川省支部诞生五十周年(1994年5月)》,见《松涛遗稿》第281页),轻描淡写说一番便不了了之。这就留下了后来川康民盟冤案的祸根。

民盟总部特派员楚图南正是以肖××的诬告作为证据,以“西南情况复杂,组织不纯”为由,宣布对川康民盟不予承认。

川康民盟既然不被总部承认,当然也就得不到中共的承认。中共西康区党委统战部长黄觉庵在1950年4月民盟批判张志和的会议致词中,明确表示西康区党委未承认民盟西康省支部的原因,是受民盟总部的请托。(彭迪先:《我的回忆与思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19~122页)

川康民盟组织不被承认,由此带来的政治后果极其严重。张志和被扣上搞“封建军事割据”的帽子,在民盟内部受到错误批判,1957年又被错

划为右派,下放到自贡监督劳动。西康民间武装起义部队没有按照党的政策作为起义人员对待,被定性为“暴乱土匪性质的武装组织”,参加西康起义的民间武装中队长以上人员“均应以土匪骨干论处”,致使145名民盟领导的起义有功人员冤死,数百人受株连。不仅如此,那些坚持反独裁争民主斗争的四川民盟广大盟员,即使没有参与组织西康民间武装起义,也受到“左”害殃及。楚图南依靠肖××等在1951年整顿四川民盟组织时,无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共同组成的这一基本历史事实,竟然荒唐地以阶级出身为标准,对民盟这个以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进行组织整顿,在提出申请的1900多名盟员中,只保留了700余名,致使1200多名对革命做出过贡献的老盟员无辜被断送了政治生命,由此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又有上百人被错误处理。(张松涛:《民盟中央组织部中组字[1997]147号文读后志》,见《松涛遗稿》第409页)四川是解放前民盟的主要根据地。民盟转入地下之后,四川盟员与中共地下党员并肩战斗,流血牺牲,重庆渣滓洞、成都十二桥烈士中不乏四川民盟盟员。然而,这种“左”倾关门主义的组织整顿,使四川民盟遭了殃,给党的统一战线被抹了黑。这是民主党派中全国少有的一件大错案。

二、漫长的平反之路

长期以来,四川民盟广大盟员对这桩冤案一直愤愤不平。

解放初期,谷醒华、张松涛、敬树诚、李实育四位盟员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分别从不同渠道就此事向党内盟员作过反映。

一些著名民主人士也仗义执言。陈修和(陈毅元帅之兄)是共和国第一代国务院参事,他对张志和为协助解放地方武装起义遭诬陷一事深感不平。1956年8月,陈修和与李一平、李奇中、李仲公、余遂辛、左宗纶、郭秉羲、万保邦、胡公冕、金汉鼎、杜朝杰、沈小琴、王卓然、王仲来、刘道衡、张砺生、林志筠、廖华18位国务院参事联

名上书周恩来总理,就张志和、范朴斋策动西康民间武力起义与云南民主人士万宝邦策动民间武力起义对待不同一事,提出意见。30年之后,张志和长女张弢英拜访陈修和老伯时,陈老伯还谈起这一往事,并告诉张弢英当时主管参事室的习仲勋副总理也十分关心张志和的遭遇。但因诬陷罪过深重,18位国务院参事联名上书一事,终于石沉大海,无果而终。

1983年,彭迪先、张松涛、赵锡骅三位老盟员又直接向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作了反映,受到了中共四川省委的重视。经过反复调查,证实了确属一大错案,中共四川省委旋即以川委函(1983)51号文件予以平反。确认此案是“混淆了历史的功过是非”。中共四川省委这种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态度,赢得了广大民盟盟员由衷的感佩。

由于川康民盟冤案最初是由民盟内部的原因而形成的,一大批四川民盟盟员被无辜断送政治生命也是首先在民盟内部造成的,广大老盟员理所当然地希望和要求民盟中央能够对正视此事,在盟内对张志和等同志平反,对无辜被清洗的老盟员给出一个说法。对此,民盟中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84年7月27日《四川日报》以《认真调查研究恢复历史真面目——中共四川省委平反四川民盟一起大错案》为题,报道了川康民盟冤案调查研究和平反纠正的经过,时任民盟中央代主席的胡愈之同志在当日的报纸作过批示:“此案平反极为重要,可否在中央盟讯转载,张志和在盟内有无反?”民盟中央丁石孙主席也催促过问,盟中央知情的老同志也都讲了话,支持为川盟昭雪。说明由民盟中央对张志和等盟员冤案做出纠正平反,已是盟内从上到下的广泛共识。

川康民盟这一冤案在拨乱反正以后,属于党的责任,早已平反纠正。然而,对于民盟应负的责任,却由于为尊者讳或别的原因,被民盟中央某些人干扰、搪塞,一直拖延至今未能得到解决。

(作者金拾珊为北京汇文中学离休英语教师、张志和长婿,张宁为美国飞虎队烈士遗孤、张志和养子)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林彪“九八手令”怎么会有两份

○ 张聿温

最近看到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8341 部队政委武健华所写的《“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住地的清查工作》一文(载《党史博览》2011 年第 12 期), 不由得大吃一惊!

武文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和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处长赖奎、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秘书王歆一起,于 1971 年 9 月 15 日到达北戴河中央疗养院林彪、叶群所住的 96 号楼清查文件。他们三人执行的这项绝密任务,是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嘱咐,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亲自安排的。

武文中有这样两段:“我们从林彪、叶群的卧室、起居室、书房到会客室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用房,一间一间地清理,桌子、橱柜、枕边、床下,片纸只字都不放过。”“集中以后,我们又仔细进行梳理,分清急缓予以处置。就在我们进入 96 号楼的第二天,我们清理出一张 32 开大的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九. 八.’。当时我们只知道这份材料非常重要,马上派专人急送中央办公厅,后来才知道,这

就是中央公布的林彪写的‘九八手令’。”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中央公布的林彪“手令”,并不是北戴河清出的这份,而是一份撕碎了拼凑在一起,竖写的,内容是:“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九月八日”。(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第 131 页)当时配有撕碎了的“手令”照片,传达到全党全国全军。对此,吴德在回忆录中说,周宇驰劫夺的直升机被迫降在怀柔县沙峪的庄稼地里后,知道跑不了了,于是为毁灭罪证,他撕碎了林彪的“政变手令”,然后和于新野相约自杀了。随后赶来的北京卫戍区部队把现场缴获的碎纸片拼凑在一起,这才对出了林彪“手令”(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 年 6 月版,第 102~105 页)。而且,当时说林彪“手令”写在一张 16 开白纸上,而不是武文所说的 32 开白纸(见刘回年、赵琦等:《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收录于熊华源、安建设编《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版,第 98 页)。

这里,不禁使人对“九一三”事件产生出新的疑问和联想,令人不解的问题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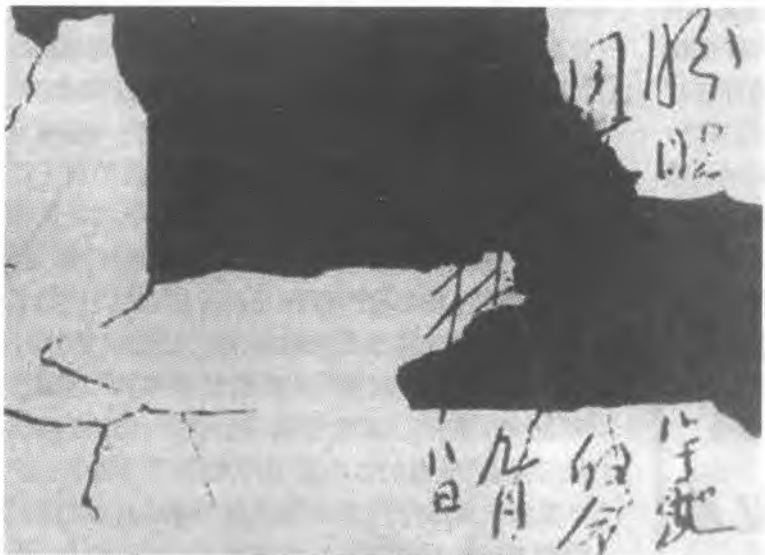
其一,林彪怎么会写下两份“手令”?孰真孰假?

其二,既然中央已经见到从北戴河林彪卧室清查出来的完整的“手令”,为什么还会有一份被撕碎了的“手令”?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和处理有若干疑问和未解之谜,这恐怕是较大的一个。■

(作者是《中国空军》杂志原主编)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当时公布的被撕碎的林彪“九八手令”

“大跃进”中的周小舟

○ 刘玉佳

周小舟是我的老领导。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我就在他领导下工作历五个年头，其中三年是在他身边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周小舟受到错误批判，免除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降任浏阳县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1962年春节期间，小舟同志住在湖南省委机关宿舍，我去拜访他，他的夫人王宁同志见到我十分激动，说：“这几年像做了一场噩梦。”大家感慨良多，谈起“大跃进”中的事，从傍晚交谈到深夜。小舟同志在“大跃进”中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精神和气魄，深深感动了我。时隔半个世纪，至今记忆犹新。

一、“白旗”调粮救“红旗”

“大跃进”中，我曾在农村工作。当我反映下面如何虚报粮食产量时，小舟同志说：“1957年我省粮食产量是可靠的，1958年的产量就有虚假。”他又不无激动地说：“你知不知道，我们省是‘白旗’，挨批评。可是得‘红旗’的省还得从我们省里调粮。”但是他没有说调去了多少粮。以后我才知道，1959年外省大批饿死人，而湖南3700万人民免于饥馑，且调出大批粮食支援外省度荒，使千百万人免作饿殍，周小舟功莫大焉。

“大跃进”造成的全国性大饥荒，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这场饥荒在1958年冬即有暴露，1959年春全面爆发。“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下够用一天的存粮，为了救急，把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

食扣了。”^{注1}1959年上半年，有的地方已成批饿死人。1959年冬和1960年春，全国各地饥荒尤其严重：重庆市长寿县一个区饿死的就有500多至700人。^{注2}有的省大量饿死人，许多农户死绝。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湖南省却是另一番风景。1959年四季都有饭吃。生产情况和生活物资供应也较好。1959年湖南省总人口3691.95万，比1958年的3672.72万，不但没有减少，而且略有增加。^{注3}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插“白旗”的湖南粮食比较宽裕。据李瑞山说：“1959年，中央一下子调走我们（湖南）20多亿斤粮食。”^{注4}这等于100多万吨。按当年每人每日一斤原粮标准，足供500万至600万人吃一年，或1000多万人吃半年。换句话说，足以拯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嗷嗷待哺的千百万生灵。可是，湖南人民的这一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随着周小舟挨批判被一笔抹杀而湮灭无闻。

二、不吹牛皮插“白旗”

当我谈及高指标放卫星时，周小舟认为：“1958年的卫星是浮夸，吹牛皮。”他说：“1958年浏阳县报称亩产红薯10万斤，谁相信？”他派当时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达去调查。为了制止浮夸虚报，他给《湖南日报》下了一道命令：“报道粮食亩产超过3000斤，必须经省委批准。”但是，《人民日报》登出亩产稻谷几万斤的消息，他做了一个手势说：“你怎么控制得住？！”原来，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早稻亩产36900多斤，福建省创花生亩产10500斤纪录”，报载“最高的冬小麦亩产7320斤（河南）、春小麦亩产8585斤（青海）、早稻48925斤（河南）、中稻60400斤（广东）、北方水稻124329斤（天津）、红苕25万斤等”。^{注5}报纸大量登载高指标，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特约刊登

回忆久久为您撰写回忆录

咨询热线：400-653-6199



周小舟(左一)陪毛泽东回韶山

放卫星同时,批评不相信高指标的人是“右倾保守”,是“白旗”。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帽子满天飞。湖南省内也不乏“三面红旗”的吹鼓手,“大跃进”的促进派。作为湖南省最高领导人的周小舟要承受多么巨大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在一片浮夸声中,湖南始终保持低调,不吹牛皮,挨了批评,插了“白旗”。结果如何?正如罗荣桓于1959年6月5日在一次会上所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被插‘白旗’的地方。”^{注6}罗帅故乡在湖南,当知故乡事。更难得的是: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至少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三地未吹遍。”^{注7}在地方,唯有湖南获此殊荣。

三、大炼钢铁、及时下马

1958年,全党全民动员,大炼钢铁。湖南省响应中央号召,出劳力四五百万人,在高山,在平原,在机关和学校广泛建立土高炉,总数达5万多座。突击挖煤、炼焦、烧炭,突击运输。三湘大地,热火朝天。一个四五十万人口的桃江县,有7万多劳力直接参加炼钢、炼铁,建起了土炼铁炉1139座,炼钢炉492座。组织专业运输兵团,劳力最多时达7万多人。全县组织8000多人的林业砍伐兵团,伐木烧炭。4个月里,砍伐森林21

万亩,砍掉树木92万立方米,竹材751万根。^{注8}

周小舟既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冲天干劲和忘我劳动的热情所感动,也为劳民伤财的局面而担心。另一方面,数千万亩丰收在望的稻谷接近成熟,却无人收割,他寝食难安。他请来炼钢专家、湖南涟钢总工程师,同他一起考察省委大院内的土高炉,向专家求教。专家直言:“这样炼钢,从技术理论、经济效果上是说不通的,不合算的……搞得越多越背时。”周小舟即召集省委其他领导周惠、李瑞山等开会,聆听专家发言,当即研究决定:停止炼铁炼钢。遍布全省的土高炉,其中大多数尚未点火,即全部

下马。几百万劳动大军得以回归农业生产第一线,转入抢收抢种。1958年湖南是个罕见的好年景,也得到了好收成。由于不误农时地完成了双抢和冬修水利各项任务,周小舟同周惠在庐山会议上谈到“湖南情况比邻省要好,原因是3万个小土炉没有点火……”^{注9}。

四、撤公共食堂,敢为天下先

1959年4月29日至5月27日,周小舟到湘西5个地区的15个县,首先考察农业生产。后来他发现农民群众生活方面的问题更突出,便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并在常德地区的慈利县做了整顿食堂的试点。周小舟指出公共食堂的矛盾很多,不得人心,反对的人占大多数。他认为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是办不好食堂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他认为供给制是刮共产风的关键所在。他毅然决然建议做解散公共食堂的试点。周小舟在视察大庸县城郊的食堂后对县委书记说:“菜这么差,清汤寡水,叫群众怎么生活。你们让群众敞开心扉,讨论公共食堂是办还是散,下去办个试点摸一摸。”周小舟在自治州听到古丈县委书记汇报:拥护公共食堂的人至少有60%至70%。他觉得不可置信,便以商量的口气说:“你回去后,能不能搞一个解散食堂的试点,摸摸真实情况。一石激起千层浪,湘西各地一些食堂闻风

而散。慈利县五天之内解散了 1366 个食堂,占该县食堂总数四分之一。退出食堂的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 38.4%。^{注 10}

为在湖南全省整顿好公共食堂,周小舟向省委提出三条建议:(一)群众愿意,办得好的,继续办下去。现有的少数大食堂必须坚决分小;(二)群众愿意回家做饭的,听其自愿;(三)一般地提倡农忙食堂和工地食堂。^{注 11}

周小舟撤公共食堂的建议和实践,顺民意,得民心,有利于改善群众生活、促进农业生产,毋庸置疑。不料时过 3 月,庐山会议结束,周小舟遭错误批斗,撤公共食堂成了强加于他的“右倾反党活动”之一——“撤公共食堂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公共食堂被标榜为“社会主义阵地”,“有助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已经解散了的食堂又被恢复起来。

1961 年春,毛泽东派到湖南的调查组,由他的秘书胡乔木率领,在湘潭韶山对公共食堂进行深入调查后,向毛泽东书面汇报,群众对公共食堂的意见最大,并明确指出,大多数食堂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一个障碍。毛泽东同意他们在当地作解散食堂的试点。^{注 12} 1961 年 6 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随后,中央正式通知解散食堂,^{注 13} 比周小舟撤公共食堂晚两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五、生为人民,死为人民

1959 年 7 月 2 日,庐山会议开始。由于会前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对湖南的工作颇为称赞,湖南省委对当时形势概括为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被接纳为会议方针。7 月 3 日,毛泽东给周小舟和胡乔木写信,将《到韶山》、《登庐山》诗稿寄他们征求意见。这两首诗便由周小舟传播开来。7 月 14 日,根据毛泽东意见,印发了《会议纪要》(草稿)。周小舟、李锐和胡乔木是毛泽东指定的主要起草人。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找周小舟、周惠和李锐谈话,在 7 月 11 日夜晚的谈话中,毛泽东认为 1958 年的问题主要在综合平衡上。周小舟说:

“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注 14} 周小舟走到了他生命路程中的顶峰。不幸的是,由于周小舟与彭德怀的往来,以及导致彭德怀写那封万言书,形势急转直下。7 月 23 日,毛泽东作长篇讲话,突然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昨日功臣,今朝祸首。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9 月 15 日,中共湖南省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做出《关于周小舟同志右倾反党活动的决议》撤销了周小舟省委书记的职务。

我一直坚信周小舟决不会反党。那时我也坚信党中央的决定英明正确。因此,我问周小舟他在庐山会议到底有什么错。小舟同志沉思片刻,很平静地答道:“历史会作出结论的。”

在告别小舟同志约 4 个月后,1962 年 6 月,他离开奋斗 13 年的湖南,南下广州,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在十年浩劫中因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 1966 年 12 月 25 日晚含冤逝世,年仅 54 岁,正当盛年。■

注释:

注 1、注 4、注 5、注 6、注 13: 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年第 2 版,第 207 页、358 页、214 页、213 页、303 页。

注 2 《炎黄春秋》2010 年第 4 期。

注 3 《湖南省志》第 23 卷《人口志》第 42 页。

注 7、注 9 李锐著,薛晓源编《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2 页、113 页。

注 8 《文史拾遗》,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主办,2008 年第 2 期。

注 10 《周小舟纪念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第 1 版,第 260 页。

注 11 《周小舟传》,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1 版,第 61 页。

注 12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第 1 版,第 584 页。

注 14 李锐:《实事求是,何惜乌纱》,原载《人民日报》,1982 年 1 月 4 日《湖南日报》转载。

(作者为湖南省文化厅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对“团结、教育、改造”的反思

○ 邵燕祥

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政治语言中,有一个“团结、教育、改造”,还有一个“利用、限制、改造”。

“团结、教育、改造”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利用、限制、改造”是对工商业者(或称资本家,资产阶级),同时也是对私营即民营工商业(正式冠名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究竟首先是指人,还是指那份产业,说不清,一而二,二而一吧。——在万恶的旧社会,老板是靠有厂有店有公司才成其为老板的,离开他那份“业”之实,哪还有他那“者”、“家”之名?至于丢了家业,仍然背着“资产阶级”的恶名,那是后来的事,遵的是另一套逻辑了。

然而,一般认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比对工商业和工商业者的“利用、限制、改造”,似乎好听些。——好像政策制定者也这样看,所以,对知识分子那六个字,一直不吝于昭告天下;对工商业那六个字,在一段时间里,是只见诸内部文件,直到 1956 年实行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的“三大改造”大张旗鼓时,才揭出底牌的。——其实,最后透底都是“改造”,应该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那么,所谓好听,无非是“团结、教育”两个词儿,比“利用、限制”显得顺耳些罢了。

“团结”当然是好词儿。在共产党的阶级路线中,讲的是“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团结对象”虽不如“依靠对象”之被视为亲近可靠,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强似当“打击对象”了。土改或后来乡村各项运动中,下乡干部、工作组吃派饭,也讲阶级路线,绝不到“打击对象”(或疑似打击对象)家里动筷子。而在依靠对象之外,一些中间力量(多半并没有什么力量,只是处在所谓“中间地带”罢了),如果得到被“派”做“饭”的机会,皆大欢喜,因为这透露的消息就是,他

们内定为团结对象了。

知识分子也是人,在大动荡的年代中,也难免要考虑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更准确地说,也许是“被定位”),除了其中自知被“依靠”的积极分子以外,中间状态的听到“团结”二字,幸免于打击,多数也就安心就位,接受并准备着迎接“团结”的好运了。更不用说其中还有少数“上帝的选民”,以其“代表性”,给了个代表、委员当当,也会产生某种幻觉,沉湎在筵席上的贵宾、朝堂上的客脚的准幻觉中。

然而,人们忽略了,作为政治语言的“团结”二字,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尤其不是《反对自由主义》这一视为经典著作篇目中所反对的那个“一团和气”。它是有个著名公式的,叫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新的团结”。原来,要想达到“团结”——“被团结”的境界,并非一言定局,而是个动态的过程。其间的关键,也还是要“经过批评和斗争”,甚至是所谓“以斗争求团结”,如果在“批评和斗争”中你这“团结对象”没能过关,则不仅达不到“新的团结”,怕连“旧”团结也丢掉了,两头不着家了。

现在,人们回顾毛泽东 1957 年反右派斗争初期宣布是“阳谋”不是阴谋,常常斤斤计较其前后自相矛盾。这是没有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毛泽东的言行的缘故。毛泽东所提出的知识分子政策,虽是逐步形成的,但其核心就是这个“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早在延安整风中已具雏形并且奏效了。只是后来不断完善其表述,从“经过批评”发展为“经过批评或斗争”。你知识分子们没出息,一厢情愿只想着享受团结,害怕并逃避斗争,忘记了这个最根本的“阳谋”:不论你“鸣放”不“鸣放”,“知无不言”或知而不言,“言无不尽”或言不尽意,那批评和斗

争,都是“团结”题中的应有之义,在那儿等着你呢。

至于“教育”云云,就不必说了。秦政“以吏为师”,今则普遍须受党的教育。而具体说来,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是经由组织领导落到实处的;党员属于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就代表党组织,支书不是常常代表组织上找你谈话吗?对于非党员来说,一个普通党员都可以代表党,在反右派斗争中有文件显示,反对一个党支部书记,乃至反对个别党员,都可以以反党论罪。你不是表示要接受党的教育吗?那就从接受支部书记乃至一个普通党员代表支部对你的教育开始吧。1957年的运动中,北京大学和其他许多大学,在“大鸣大放”开始阶段,青年学生从相互平等的观念出发,批评意见曾经一度集中在班干部、学生党员和他们的后盾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以及政治辅导员(清一色是党员)身上。年轻的学生不懂得共产党的规矩,误闯白虎堂,结果大遭“不教而诛”,可慨也已。

经过那一场运动,戴了“右派”帽子的,暂时没戴帽子的,全都受到了“教育”,一定程度上在知识分子“改造”的长途上前进了一步。然而事情并没有完,“改造”是个无底洞,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意谓知识分子是要戴着“改造对象”的有形无形的帽子“死而后已”的。这不是随便一说,这是历史的事实。反右以后,不是有来势更猛、时间更长的文化大革命吗,不是重申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专政(据当时文件的提法,对知识分子“占领”的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要夺取回来,实行全面专政)吗?对知识分子而且不限于“从旧社会过来的”,连累及于所有“资产阶级世界观”尚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都要加以改造。(而怎样算是世界观改造好了,的确也拿不出一个计量和质检标准。)

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嫌反右等运动都不彻底,于是才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当然不止革知识分子的命,但知识分子遭遇的革命必然是空前“彻底”的。改造即革命,革命即改造。“团结,教育,改造”这一政策的“底”也就在这里。

而1956年敲锣打鼓完成的“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作为改造对象的工商业者、资本家、资产阶级,早就“见底”了。那就是宣称通过嗣后分期发付“定息”实行“赎买”的办法把那些资产阶级的资产收归“国有”,简言之,没收了。十年后林彪在发动“文革”前夕,讲解权力就是一切、革命就是夺权时,说到有了权,可以使百万富翁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使穷光蛋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翁,是最形象、最通俗不过了。

所谓改造对象,归根结底就是革命对象,也就是“消灭对象”。因为,众所周知,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把革命对象加以“消灭”。1956年把工商业者——资本家“改造”完成的标志,是把他们的资本、资产没收了。用政治语言说,就是“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了。这样说,是为了表明不是要把他们这个阶级中的每个人“肉体消灭”。如在土地改革中所说的“把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一样,表明与对待另一类革命对象如反革命分子中要加以“肉体消灭”者有所区别。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正是“死罪可免”(后半句是“活罪难逃”)也。

知识分子,作为“改造对象”,在共产党的政治语言里,并不认为形成“知识阶级”,甚至也不算一个“知识阶层”,而是如毛泽东所说,他们一个一个分子,犹如一根一根的“毛”,总要依附于或是革命或是反革命、或是这个阶级或是那个阶级的“皮”上的,而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按他的阶级分析,除了依附蒋介石国民党这张皮的以外,大多也仍为依附在地主、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越到后来这个估计越严重,连共产党内老革命中的知识分子(甚至还算不上知识分子的有些工农干部),以及“生长在红旗下”从未接受过旧式教育的青年,从“世界观”划线,也都列入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黑名单。

那该怎么改造他们,怎样革他们的命,或者直截了当说是怎样“消灭”他们呢?他们没有政权可夺,也没有土地、工厂等资产可以没收,毛泽东郑重其事地对他的高级干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底说,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的土地,三大改造没收了资本家的产业,他们没有对抗共产党的资本了,这里说的已是从物质资本转化成的“政治资本”。那么,什么人还有对

抗共产党的政治资本呢？那就是知识分子。他们手里的知识，就是他们用来跟共产党分庭抗礼的，能够跟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政治资本。于是，知识分子首先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毛的说法是“头面人物”）成了“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知识分子在劫难逃了。

然而，想一想，要“消灭”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标志性的行动是没收他们的土地、工厂，这些有形的生产资料，可以量化，可以交接；知识分子的知识既然被指为政治资本，应予没收，可这些东西都在一个个人的脑袋里，怎么下手夺取或消灭呢？

有办法，那就是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取代他们原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叫他们换脑筋。首先，要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比起工农这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这还是客气的说法，后来直接指其“读书越多越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据说所谓知识，只不过是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两大门类，工农劳动者本身在从事生产劳动中，自然就有了相关的知识，以工农劳动者为主体的革命队伍，则在革命斗争中“实践出真知”，也具有了阶级斗争的知识；你们知识分子，一不会种田，二不会杀猪，即使有些书本知识，顶多算半个知识分子，理应放下知识分子架子，拜工农兵为师，当然更要拜领导工农兵干革命的领袖为师。要向工农缴械，向无产阶级投降，放下（不肯自己放下，就由同志们打掉你的）知识分子架子，也就是“个人主义”范畴的个人尊严，放弃个性，服从党性，做一个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俯首帖耳充当党的驯服工具。

在知识分子头脑中取消了个人尊严、独立人格，也就从精神上消灭了知识分子个人。一个由这样一个个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体，无异于什么呢？当然，对于其中敢于抵抗者，也不惮于加以身囚禁乃至肉体消灭，如同对待工商业者中的对抗者一样。这都属于对待资产阶级的总政策中“我们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之谓也。

总之，在赶走了蒋介石国民党，消灭了地主、资本家之后，“关门打狗”，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是成了新一轮必须追而歼之的“穷寇”。至于人们常常忆及的，意在“消灭知识”的“砸四旧”包括焚书之举等等，不过乃其余事，知识的主要载体是那些叫知识分子的人啊。

从精神上消灭知识分子，这就是所谓“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真谛。它与对工商业和工商业者“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精神，并无二致。知识分子在几十年间历经的磨难，正是这一基本政策派生的，并非所谓“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来自各级干部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打击、迫害，其源盖出于此。

当人们从“文革”的噩梦中缓醒过来时，如久旱逢甘雨般地迎接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新猷。绝大多数人如我一样，即使不是感激涕零，也是喜形于色仿佛新生，欢呼“第二次解放”，当然不遑顾及反思多年一贯的“知识分子政策”。而执政者在其后30年中，屡屡强调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却也从来没有重新阐释这一政策，更似乎从未反思过多年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恶政，跟这个以“改造”为终极目标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有什么必然的关联。这是值得过来人好生想一想的，包括从30年前大规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发生在知识界，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中的问题以至事件，是不是由于党与知识分子存在隔膜，而这又与双方对知识分子政策都缺少根本的反思有关？■

（作者为诗人、杂文家）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启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往期刊物
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102488 收款人：崔秀岭

吴晗挨批后的心态变化

○ 吴厚荣

读了《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上吴昆先生的《我和伯父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通信》后,我自然想起,江西吉安市政协曾赠我一册《吉安文史资料(第一辑)》(2004年8月编印),其中收有萧庐生写的《我和吴晗的一次通信》一文(原载2000年9月5日的吉安市委机关报《井冈山报》),该文公布了1965年12月13日吴晗给萧的一封信(写于给吴昆信之前70天)。两信都是谈当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问题,反映了吴晗在当时处境下前后有差别又有连贯的两种思想状态,透露了吴晗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的内心波澜。

吴晗和萧庐生的通信

萧庐生当时在江西吉安县县直机关工作,当大家在一块议论姚文元的文章时,他公开赞扬吴晗的《海瑞罢官》,认为姚对历史无知。11月底,报上陆续开展了对《海瑞罢官》的讨论,绝大多数讨论文章尊重历史,肯定《海》剧,不同意姚文。萧庐生也想参加讨论,便给吴晗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吴晗市长:

11月10日《文汇报》登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我看后很不服气,姚不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而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断章取义,蛊惑人心。现在报上开展了对《海瑞罢官》一剧的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我打算参加讨论,今特写信给你,请你寄一本《海瑞罢官》剧本给我,或请你去北京新华书店代我买一本寄来,书款即寄。

此致

敬礼!

萧庐生

1965.12.5

信寄出后,很快收到了吴晗的回信,内容如下:

庐生同志:

来信收到。《海瑞罢官》一剧是我前几年写的,该剧上演后反映也较好,现在有人提出种种责难,我不以为然,是非自有公论。现在看来,该剧也是有缺点的,值得讨论。我手头没有了这个剧本,北京书店也没有卖。最近《文汇报》重新发表了该剧,请你去看一看,欢迎你参加讨论并提出批评。

此致

敬礼!

吴晗

1965.12.13

吴晗写信时的处境

吴晗复萧信写于1965年12月13日,此时距姚文发表之日为33天。其间,全国各省、市、区党报都转载了姚文,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时的编者按更升级为“《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但11月29日、11月30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分别转载时的按语则把关于《海》剧的批评看成是学术问题(“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认为不同意见可以讨论,“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11月29日的《文汇报》也以《读者来信要求讨论〈海瑞罢官〉问题》为通栏标题,其编者按称要“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并接连几天发表不赞同或不完全赞同姚文元观点的文章。吉安萧庐生就是由此产生了撰文参加讨论的念头。

在北京,12月8日,彭真指示邓拓给吴晗写信,让他迅速写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检查



吴晗(左二)与周恩来(左三)等人合影

文章。邓拓在信中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者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当充分发表，不要顾虑重重”。（《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1～712页）于是，吴晗开始写《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检查》（此文后于12月27日在《北京日报》刊出了）。

12月12日，邓拓按彭真指示写的批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署名向阳生），在《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同时推出，以重头文章力图把政治批判拉回到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

正是在向阳生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吴晗给萧庐生写了复信。

那么，在姚文发表至给萧回信这一个多月里，吴晗的心境、情绪如何呢？据此期间曾去探望过吴晗的亲人们回忆，一向谈笑风生的吴晗，此时一变而为：倚坐圈椅，睡袍拖地，心情沉重，双眉紧皱，眼神迷茫，摇头叹息，烟不离口，每顿只吃一碗粥，一下子变老了。当亲人告诉他外面的反映：“大部分人认为是学术之争，姚文元的无限上纲，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吴晗默默地听着，眼中闪着泪花，始终一言不发。（同上书，吴浦星、宋凇、吴平、容伊的回忆文章）

吴晗写信是“精神突围”

吴晗给萧复信，非同寻常。先看其急迫性和

郑重性。萧发信在12月5日，吴复信在12月13日，按当年江西吉安至北京的邮程需5日左右，可见是收信后迅即写回函的。萧去信只是想要一册剧本，而吴晗此时正奉命写检讨文章，按常理对受批判这一敏感问题应避而不谈；当时吴晗尚有秘书在侧，让秘书给萧写个“剧本《文汇报》已重新发表，可找来看”的答复，也就算对来信尽责了。可吴晗却要亲笔复信，而且正面地表达自己对《海》剧问题的观点、态度，这就“真不简单”了。

再来看信的内容。全信仅122字，却清晰地表述了五层意蕴：（1）《海瑞罢官》上演后“反映较好”，这是借观众舆论表示对此剧的基本肯定；（2）对有人（姚）提出的“种种责难”，断然声明“不以为然”，即坚决不能接受；（3）相信“是非自有公论”，可理解为，只要诉诸公论，是非不难明白；（4）坦诚表示“现在看来，该剧也是有缺点的，值得讨论”，愿从讨论中领教；（5）“欢迎你参加讨论并提出批评”，这也是对广大公众而言。

吴晗为何要如此急切、郑重地给萧写这么一封回信呢？

当时他面对的，是一种非常严峻但尚不明朗的形势。一方面，姚文发表后，中央及各省级大报纷纷转载，气势超前，波涛汹涌，尤其是军报定性为“大毒草”，而且背后有“上头”的支持。作为明史专家，他自然清楚史上文字狱是如何罗织的；作为高级干部，他更知道此前历次“学术思想批判”的对象们的下场如何。因此，他预感到将有不测之祸。但另一方面，他又知道彭真和自己接触较多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对自己是了解的并且仍在设法保护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的态度是温和的，各报正在开展的讨论中许多著名专家和普通读者对姚文元乱扣政治帽子是反感的，特别是12月12日又发表了向阳生谈“道德继承论”的学术批评文章，这些又使他产生了一种稍带宽慰、乐观的希冀和期待心理，以为真的学术批判范围的讨论有望开展起来，出现“是非自有公论”的转机，而且他自问在政治上是清白的，有站得住的自信，自己结局或许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术思想问题，当然，他也预感凶多吉少。恰当时，他收到了萧庐生的来信，一位在僻远地区的普通干部表达了对姚文元“乱扣帽子，

乱打棍子,断章取义,蛊惑人心”的强烈义愤,这使他感受到了“公道在人心”的欣慰,这可能是他亲自动笔给萧复信、坦露心迹的原因。

“公论”不敌“强权”的教训

如果说,吴晗致萧庐生信,表达的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学者对真理、对自身清白和人格尊严的原则坚守和权利维护,那么,致吴昆信则表达了经过70天批判和反思后认识上的“进步”或“提高”,承认“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历史观没有得到改造,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就不能不犯错误”,而且“错误是一贯性的”,但仍坚持“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没有犯大错误”,即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依然坚守了认错的“底线”。这两封信都体现了文革序幕阶段第一个受残酷打击者的真实思想状况,也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一位赴诉无门的知识分子的心态。这或许就是两封信的历史文献价值所在。

但我们更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值得注意的是,吴晗致萧信中“是非自有公论”所寄予的希望,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无端受迫害的人们无奈之下的共同呻吟。但“公论”得以形成的前提是讨论,让公众有发表意见的可能。在当时,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仅文汇报社就收到3000多件批驳姚文的来信来稿,北京的翦伯赞、翁独健,上海的周谷城、周予同等众多学者、教授公开为吴晗鸣冤叫屈,无数基层干部和群众如萧庐生和同事们议论纷纷,都指责姚而同情吴。为什么?就是因为《海瑞罢官》中本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公众的良知痛恨对好人的冤枉,在江青、张春桥策划指导下最善于“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姚文元给《海瑞罢官》横加的“政治帽子”很快被戳破,姚一时反成了众矢之的。

由彭真主持起草、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并以中央文件批转全国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主张开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讨论,旨在避免重复历史上“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错误,并保吴晗过关。如果它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容许批评与反批评自由的正常讨论真的能开展起来,姚文元诬陷《海》剧的不实之词将被驳

倒,砍向吴晗的第一刀将被挡住,则文革“序幕”能否在当时拉开就成了大问题。

但是,就在吴晗给萧写信后的第8天即12月21日,毛泽东亲自出面发话:《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是康生的献策,为姚文元文章的漏洞作“事后补救”。(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第35页。)然而,这同样是无凭无据但却更为厉害的政治构陷。当时,彭真曾一再直接向毛泽东据理力争;据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关系,《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没有关系。但不被理睬,反而招致毛的更加激怒。吴晗与《海》剧由此骤然升级为直接代表彭德怀等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严重政治问题,最终置于死地。而时至今日,有知情人透露,就连姚文元,竟也不知道《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同上)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当时,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最为割切、沉痛: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和秦桧陷害岳飞的理由一样!(《往事钩沉——重大冤案实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

明知没有罪证,却凭“最高”领袖一句话,就把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民主革命的英勇斗士、解放后长期任北京市副市长、共产党员,以“莫须有”之罪打翻在地。从此“突破口”被打开,祸水漫漶,上至国家主席,中间“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下至平民百姓,千万人被“以革命的名义”,先定罪名,再捏造“证据”,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冤案累积如山,冤狱遍于国中。从一个人的悲剧开始,扩大到一个民族的悲剧。

吴晗给萧的信,寄热望于由“公论”来定“是非”,但无情的事实给他的回答却是:“强权”能轻易压倒“公论”,还能导演出、制造出是非黑白颠倒的另类“公论”。血的教训昭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必须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作保障,而且这种保障必须是有效施行的而不是仅仅写在纸面上的。人权的主体是“每个人”,人的价值至上,公民的权利至上,民主、法制应落实到保护“每个”无辜的“人”不受“莫须有”的罪名迫害。

(作者为地方史志学者)

(责任编辑 洪振快)

蒋介石批钱给陈独秀

○ 裴高才

1938年,陈独秀迁居四川江津,生活困窘,晚境凄凉。

1940年11月间,陈布雷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

这时,陈独秀的外甥告诉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处机要室秘书的胡秋原,陈独秀将狱中完成的初稿更名为《小学识字教本》,交国民党教育部出版,以作为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书籍,并预支了稿费5000元。可是,有一天窃贼破门而入,将他的十多样衣服、被褥和他所写的《小学识字教本》书稿及其他尚未出版的书籍窃去。为了偿还预支稿费的债务,他必须带着病体,凭着记忆重写此书。然而终因身体等原因,此书未能全部出版。

尽管陈独秀晚年在政治上遭受了一连串打击,生活举步维艰,但是精神上仍然“贫贱不能移”。老友朱蕴山见陈独秀日子艰难,拿了几只鸭子去看望他,陈独秀却坚拒嗟来之食。周恩来托朱蕴山说情,想请他到延安养老,不让他再在外头“胡说八道”。陈独秀拒绝了,他对朱说:“党中央里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李大钊、陈延年都死了,我自己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国民党要员任卓宣曾汇200元,也被陈独秀退回。

胡秋原将陈独秀的情况告诉顶头上司陈布雷。陈独秀的北大同事、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字骥先),也曾与陈布雷谈及此事。陈布雷听闻“仲甫近况艰辛”,便向蒋介石汇报,得蒋同意,为防陈独秀不要,特以朱家骅私人名义,让陈独秀昔日北大弟子张国焘送到江津鹤山坪。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现藏三通书信,内容涉及一笔8000元(国币)的馈赠,信件原文如下:

骊先我兄大鉴:

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经呈奉谕示一次补助八千元,以吾兄名义转致。当飭公费股周股长奉上,送到时请察收赐复(电话告弟即可)为荷!即颂时祉。

弟 陈布雷

(1942年)1月17日

布雷吾兄勋鉴:

十七日手笔敬悉,关于一次补助仲甫兄八千元由弟名义转致一节,俟收到后,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也。知关厘注,敬先奉复,祇颂勋绥。

弟 朱家骅

(1942年)1月20日

骊先先生台鉴:

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

弟 独秀 启

(1942年)1月29日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于病逝于江津鹤山坪。■

(责任编辑 洪振快)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倒退

○ 陆南泉

长期以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给人们的表象是稳定,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战略核武器达到与美国持平的水平,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

尽管怀有大国情结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部分俄国人对这个时期还持有正面评价,但是,在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家看来,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最后走向垮台的罪魁祸首。

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10月14日,通过一次苏联历史上真正的政变,取代赫鲁晓夫上台执政,于1982年11月10日去世,共执政18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执政30年之久的斯大林。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经济情况较好,社会总产值比上个五年计划增长7.4%。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对改革持积极态度,力图通过改革扭转经济下滑趋势。也是在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也站稳了脚跟。但从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开始,保守、僵化与停止改革趋势日益明显,后来实际上取消了改革。在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后,就不准用“改革”一词了,而改用“完善”一词。俄罗斯学者说得好,这一改变是向“停滞”过渡的标志。

一、政治体制倒退的种种表现

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适应。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仅没有触动政治体制,而且出现了不少倒退,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恢复并逐步加强党政集中领导体制

1.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在后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情况日益严重。表面上政治局各委员都对自己

主管的领域负责,一切决策都由政治局做出,但实际上主要还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勃列日涅夫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的地位巩固与加强之后,更是大权独揽。1977年苏共中央5月全会决定,勃列日涅夫以总书记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年10月7日,最高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审议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按新宪法增加的一些条款,勃列日涅夫同时又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这样,他就总揽了党、政、军的大权。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不只反映在勃列日涅夫这个最高领导人一个人身上,苏联党的很多领导人兼任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另外,在党政领导的组织机构上也得到充分体现。苏共中央机关设置的与政府部门相应的部门比过去更多了,如国防工业、重工业、机器制造、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等部门,在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委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导致各级党组织往往对一些具体经济问题作决议与发指示,从而大大削弱了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领导作用。

2. 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随着勃列日涅夫领袖地位和权力基础的巩固,个人集权日益发展。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形成的“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也不是三者之间的力量与权力处于均等状态,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利用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扩大权力。苏共中央1972年12月全会上对由柯西金主管的“新经济体制”作了否定性评价之后,勃列日涅夫把在经济方面的决策权控制在自己手里,随后又控制了外交权,此后,使柯西金的地位大大下降。1977年解除了波德戈尔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并宣布他退休。此后,勃列日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红场阅兵式

涅夫的权力大大膨胀,决策权高度集中。据不少材料披露,像1979年底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重大事情,只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四人商量后作出决定的。^{注1}从这一件事就可看出勃列日涅夫时期个人专权的情况。

由于个人集权的加强,党内民主日益流于形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和苏共代表大会按规定举行,但并不意味着党内有真正的民主生活。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举行的苏共中央1月全会上讲:“让我们坦率地说,多年来,党和人民关心的许多迫切问题没有被提到全会日程上来。同志们都记得,虽不止一次地举行时间很短和形式化的中央全会,许多中央委员在其整个任期内没有可能参加讨论甚至提出建议。中央全会的这种气氛也影响到地方党委和党组织的工作作风。”一切重大问题不是经过认真和充分讨论决定的,这种情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显得更加突出。沃尔戈诺夫所著的《七个领袖》一书中说:“政治局讨论问题的程式,如由谁发言、如何发言等,事先都由党中央机关秘书班子作好仔细安排。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政治局委员们事实上经常不是进行讨论,而是相

互念自己的助手们为他们写好的2~3页讲稿。大家总是表现出“英雄所见略同”,照例不会发表同事先由起草班子起草的决议草案有多少出入的意见。^{注2}

(二)个人崇拜盛行

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发展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用

编造历史来夸大其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其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从1975年至1977年的三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他拥有的勋章与奖章共达200多枚,死后在送葬行列中为他捧胸章与奖章的军官有44人之多。如果翻开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苏联报刊,对勃列日涅夫令人作呕的颂扬言论到处可见。1976年底在为勃列日涅夫庆祝70诞辰时,掀起了颂扬的高潮,为此《真理报》开辟了7天的专栏。而率先颂扬勃列日涅夫的是基里延科,他称勃列日涅夫为“党的领袖”,当时阿塞拜疆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时代的伟大人物”。^{注3}那些阿谀奉承、恭维勃列日涅夫的言论更多:“党和人民热爱您,列昂尼德·伊里奇。他们爱您,是由于您的仁慈和热忱,是由于您的智慧和列宁主义的无限忠诚。您的一生,您的智慧和天才赋予您获得并融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贵品质的能力,这些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人物,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的特殊品质。”^{注4}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如有人称勃列日涅夫是“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英明的理论家”。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发表

的几本小册子《小地》、《复兴》、《垦荒地》等,获列宁文学奖。其发行量之大也是惊人的,截至1981年底,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就有一册。^{注5}1978年11月12日《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和泉源’。还有些报刊吹捧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等。而这种做法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阿尔巴托夫说,这像‘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的戏’,人们‘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我国历史上我们为之付出了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副其实的停滞时期。其登峰造极之时我认为是1975~1982年’。”^{注6}

个人迷信是个人集权的必然产物,它反过来也为巩固与发展个人集权创造条件,相互促进。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朝高度集权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一步一步地深化,使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变得“成熟”即更趋凝固化、僵化。这种“成熟”在掩盖着、钝化着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潜伏着危机!”^{注7}

(三)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

应该说,赫鲁晓夫执政时,看到了传统体制下的干部制度存在严重弊端,因此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改革,目的是要废除像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腐朽的制度,使社会的发展富有活力。但他在这一领域的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发生过干部大换班,变动过于频繁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注意力集中放在赫鲁晓夫时期干部制度改革所出现的问题上,并没有考虑到传统的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因此,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以稳定政局等为由,很快就恢复了传统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干部任免制。在这方面的倒退,其消极作用十分明显。

第一,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使新生力量难以成长,难以在年富力强时进入重要的领导岗位。在赫鲁晓夫执政年代,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



喜欢给自己发勋章的勃列日涅夫

占49.6%,到苏共二十二大,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上升为79.4%,二十五次时上升为83.4%,二十六次为90%以上。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变动更小,18年中只换下12人。^{注8}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次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这是苏共历史上没有过的。1976年至1981年两届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死亡和正常工作调动外,没有一人被撤换。^{注9}由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命制,重要干部由“一号人物”来决策,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不可能由年轻干部去担任。勃列日涅夫后来提拔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员的情况就说明这一点。如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1976年去世时为73岁,而接替他的乌斯季诺夫当时已经69岁;苏联交通部长科热夫1975年去世时为70岁,接替他的索斯诺夫为67岁;造船工业部长托马1976年去世时为69岁,接替他的叶戈罗夫当年也是69岁。勃列日涅夫兼任国家元首之后,竟选择比他大5岁的库兹涅佐夫担任自己的副手。1976年吉洪诺夫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时已72岁。^{注10}

第二,终身制的一个必然结果是领导干部老

化。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55.4岁,书记处成员为52岁。到赫鲁晓夫下台前夕的1964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61岁,书记处成员为54岁。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次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

干部的普遍老化,是苏联社会死气沉沉、保守、僵化和各种消极现象出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个问题,从勃列日涅夫本人就可充分说明这一点。勃列日涅夫于1974年12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军用飞机场刚送走美国总统福特,他感到不适,患了脑动脉粥样硬化症。第二天前往蒙古,从那里乘火车返回莫斯科时又发生了第二次中风。从此,他病得很重,病了很长时间。从这时起,勃列日涅夫还“统治了”八年。在这八年中,他一直没有能恢复到自己正常的工作状态。在他生命的晚期,就连起码的谈话内容和礼节性的应酬话也要别人替他写好。对此,博尔金作了以下的描述:“很多人都非常清楚,勃列日涅夫不能继续领导党和国家,中央政治局会议越开越短。勃列日涅夫茫然坐在那儿,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会议室里都有谁,应该做些什么。经常出现这种局面,他坐在那儿,读着助手们用特制大号字母打字机打出的简短讲稿,有时读错行,前言不搭后语。他大概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用忧伤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人。为了尽快作出结论并提出提案,结束这种折磨人的场面,契尔年科出面结束会议,大家急忙通过各种议案,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政治局会议室。”^{注11}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八年中,他“已经无力正常执行领导者的起码职责”。^{注12}

第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命制产生的另一个严重弊端是不正之风盛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高层领导人是否退休,并不取决于年龄与是否有才能,而是取决于与苏联主要领导人的关系。正如利加乔夫指出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领导干部是否退休,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列昂尼德·伊里奇本人的关系。这种程序(确切些说是无程序)必然要加重地方领导人对中央领导机关的依赖性。就问题的实质来说,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换句话说,是否退休问题在于主观方面。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那些忘我工作的书记,由于没有注意到在中央和中央委员会的个人关系,当到退休期限时便处于‘无人过问状态’。”^{注13}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这样,使不少干部不是把精力用于如何做好工作,而是搞投机钻营,那些吹吹拍拍、讨好上级、唯上是从、在上层寻找保护伞的干部越来越多。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勃列日涅夫还对其家属与沾亲带故的人给予“照顾”,让这些人升官、捞取私利。他女儿的最后一任丈夫丘尔巴诺夫令人头晕目眩地青云直上。在屈指可数的几年内当上中将;从一名平平常常的民警政治工作者一跃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他被选入党的高层机关,获得了奖赏、汽车和别墅。勃列日涅夫的儿子被提拔为外贸部第一副部长。他的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这两个人都有酗酒的恶习。^{注14}

(四)“特权阶层”扩大化、稳定化和思想僵化

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使得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就存在的“特权阶层”进一步扩大与稳定,这一阶层的人思想更趋僵化,这也成为阻碍整个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至于形成这个特权阶层的原因,笔者认为,阿尔巴托夫提出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他说:“特权阶层的形成,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个人迷信服务。”^{注15}

斯大林时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使命是不同的,斯大林时期的“特权阶层”主要使命是维护、巩固斯大林的体制模式;而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护现状,使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这也是使这个时期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政治体制倒退造成的严重后果

(一)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

在苏联极权政治体制条件下,不进行政治体

制改革,企图单一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其结果只能是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对经济体制改革起制约作用。

例如,由于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官僚主义和官僚机构对改革的阻碍乃至破坏作用日益明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特征,这就是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机关专权和独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所谓双倍的泛滥。”“所有的决定都是由最上层作出的,与此同时,‘上边’却不能真正采取任何一个决定——其中每一项决定要经过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协商。此外,领导人任何一项决定作出后,在贯彻时又受到机关的专横的阻挠。”“几乎没有人对某件事真正承担责任。”“官僚主义的管理机关膨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注 16}

据俄罗斯一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这一时期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作出的决议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官僚主义的盛行,勃列日涅夫本人表现得尤为突出。阿尔巴托夫在其回忆录中,列举了不少事例,其中有关科技革命问题最为生动。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考虑到苏联加速科技发展的紧迫性,苏共二十四大后,政治局作出决定,准备专门就科技革命问题召开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会议的准备工作与通常一样委托一个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数名中央书记组成。同时,还成立一个工作组,准备会议材料,其中包括起草总书记的报告。经过许多个月紧张的工作,终于拟就了一份篇幅长达 130 页的总结性文件。文件于 1973 年 5 月按期提交给基里延科等三位书记。自然,这份文件交给了勃列日涅夫,但长久没有下文,召开讨论科技革命的中央全会的整个设想被搁置了。到了 1982 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后一个专门委员清理他的档案时,发现了这个文件。之后,再转到戈尔巴乔夫手里。但科技体制改革拖延了 20 年,从而使科技进步问题大大加重了。^{注 17}

纵观勃列日涅夫 18 年的体制改革,不难发现,改革一直是在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思想支配下进行的。

(二)重新斯大林化

由于政治体制的倒退,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这

是笔者借用了阿尔巴托夫回忆录中的一个提法,因为这个提法很符合实情。“我之所以把这个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称之为悄悄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注 18}应该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不是困难的事,因为:一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捅了一下斯大林,特别是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体制。就是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报告时,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想得很肤浅的,可以说还根本没有触及制度性问题。二是植入苏联社会的斯大林主义,它经历了一个很长历史时期,为了让它生根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最极端的大规模的恐怖,从而使其在苏联根深蒂固。三是在斯大林时期,不只形成了以斯大林主义为基础的体制,并在这个体制下培养了适应和积极维护这个体制的领导干部。这些干部,同时又握有种种特权,他们离开了这个体制很难工作,又会失去特权与利益。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领导层中很多很多人仍然持旧的、斯大林主义观点。他们要在任何一个别的社会政治体制下为自己寻找一个位子即使说不是完全不可能,那也是很难的。这些当权者除了往下面贯彻‘上头’的意旨外,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在上述条件下,在苏联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只要最高领导一停止施加压力,使社会实现非斯大林主义化的种种努力,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建制几乎无须下达新的补充指示就会自动恢复原状,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样,只要手一松开,它马上便直立起来,或者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你不再用脚蹬,它就向一侧倒下去。”^{注 19}所以,正如有人指出的:“断言我们似乎告别了斯大林主义,此话说早了,太早了。”^{注 20}

勃列日涅夫为重新斯大林主义化,主要通过一些行政措施对站在反斯大林主义立场上的人施加压力,但又不采取或很少采取极端的手段,如逮捕判刑等。“一般的做法是革职,给予严厉的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以及用越来越巧妙的

手段搞臭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公开诋毁中伤他们,送入精神病医院,乃至驱逐出境,剥夺苏联国籍,等等。”注 21

勃列日涅夫在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方面,首先的步骤是恢复斯大林作为“伟大领袖”的名誉,最简单的办法是 1965 年利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20 周年庆典,提及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后来,利用撰写各种各样的有关“二战”的回忆录把斯大林重新抬出来。官方要求回忆录也好,二战史也好,要符合当时的苏共路线、方针与政策的需要。这样,连十分重要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也要把有损于斯大林形象的内容删去,如从书的原稿中砍掉有关 1937 年斯大林对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实行镇压的一章。注 22

与此同时,“思想限制的范围扩大了,成为迫害对象的人数增加了,社会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围明显地变坏了。”“‘合法性’的界限和可以在体制之内采取行动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窄了,人们明确无误地知道不久前还准许说的话和曾在崇高讲坛上讲过的话也被置于禁止之列了。”注 23

这期间,加强了“秘密警察”机关的作用,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多了起来。“苏共中央的高级负责人,甚至中央书记,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尖锐的话题时,也常常看一看电话机,作出一种明显的手势——把手指按在嘴上,并转到另一个话题。”注 24

至于文化、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并不比其他方面好些,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僵化的教条主义盛行,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除出社会科学领域。拿经济科学来说,精力集中在研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不切实际地去拨弄从马列主义奠基人著作中摘出来的一连串抽象原理,而且主要是用他们最粗俗的、纯粹斯大林式的诠释来研究。注 25 这种斯大林式的诠释,早已成为被推销得贬了值的理论,还在强迫人们接受,而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不断升级,并纳入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注 26 对主张更多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学者如阿甘别基扬和扎斯拉夫斯卡娅等,成为围攻的对象。

(三)经济严重衰退

由于政治体制倒退,使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从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

衰退。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率明显递减与停滞。到勃列日涅夫去世的 1982 年,经济增长率已下降为 3.3%。据一项重要的调查材料表明,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如果不考虑能源价格上涨与出售有害的酒精饮料,那么国民收入没有增长。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 年)与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 年)工业计划分别只完成 91%与 67%,农业计划只完成 68%与 56%,农业情况日益恶化,从 1973 年起苏联成为粮食净进口国,每年进口 2500 万到 3000 万吨;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与低效经济未能转变,经济结构更加畸形,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体制倒退,严重制约着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导致经济改革的三项目标均未实现,90%的经理认为企业权力太小,仅在由国家计委编制下达的工农业生产计划中,就包括了约 4000 个产品品种,约占工农业产值的 80%~90%,企业的利润 83%左右由国家直接或间接支配。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可概括为停滞时期,这是一个总体的评价。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在苏共中央 6 月全会(1987 年)的报告中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实际上是“惰性和停滞不前的力量当时占了上风,一切都回到了旧的轨道”。阿尔巴托夫指出:“如果用很高的政治和经济标准来评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从赫鲁晓夫下台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整个年代是停滞时期。在这些年内(这毕竟是 18 年),我国没有出现过沿着使我们的社会得到总的改善的道路前进的任何不可忘却的历史性里程碑。就是说,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朝着进步与完善的方向迈出大的步子,总体上讲,仍然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那一套模式。”勃列日涅夫执政的 18 年,一方面耗尽了 20、30 年中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动员型政治经济体制的潜力,另一方面又使苏联积聚了大量危机因素,导致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全面停滞,是苏联走向衰亡的时期。这一历史定位,就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本质特点,从而也就找到了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历史上的确切地位。■

(本文注释见本刊网站)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炎黄春秋》2012 年新春联谊会

2月8日上午，《炎黄春秋》2012春节联谊会在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107岁的周有光、95岁的李锐、90岁的何方等老前辈，也有著名学者、著名体制内改良主义者。老中青三代济济一堂庆新春，为杂志的发展出谋划策，尤其是为本刊面临的转制问题建言。本刊选发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希清同志、本刊社导正社长的发言以及部分嘉宾在本次联谊会上的发言摘要。

在炎黄春秋杂志社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



各位前辈，各位同仁：

首先，由于许嘉璐会长、沈仁干、赵德润常务副会长忙于其他公务，不能参加今天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的新春联谊会，我和鲁諄副会长、王俊义、王才名誉副会长谨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新春祝贺，给大家拜一个晚年！

过去的一年，玉兔献瑞，《炎黄春秋》杂志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改革开放为宗旨，对中国历史尤其是现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依据翔实史料，秉笔直书，力求客观公正，求实存真，以史资治，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还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不断改进，但15万多份的发

行量而且绝大部分为自费订阅，比2010年增加了2万多份的发行量，说明这份期刊是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新的一年，金龙呈祥，希望杂志社再接再厉，龙腾虎跃，龙飞在天，取得更大的成绩。

另外，在新的一年里，炎黄春秋杂志社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转企改制。炎黄春秋杂志社是一个独立事业法人单位，但是并没有事业单位编制，也没有享受财政拨款，21年来一直是按照企业方式在市场上生存发展，自办、自收、自支。现在，炎黄文化研究会已经成立了以许嘉璐会长为组长、沈仁干常务副会长为副组长的改制工作领导小组，炎黄春秋

杂志社也成立了以杜导正社长为组长、吴思总编辑为副组长的转企改制工作小组。我们希望与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同仁们一道，同心协力，按照既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套用一句老话，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积极稳妥地把转企改制工作做好；目的在于把《炎黄春秋》杂志办得更好，更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改革开放、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最后，再次祝大家新春快乐，身心健康，万事如意！

张希清

2012年2月8日

《炎黄春秋》的体制探索是成功的

○ 杜导正

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的喜庆的会上，我要谈一个严肃甚至沉重的话题：《炎黄春秋》的转制问题。现在又有人想利用文化体制改革的机会，改变《炎黄春秋》21年来的办刊方针，办法是通过组建股份公司，用权力和



票子控制大股，因董事会掌握人事权，从而改变我们的办刊方向，想办成什么学术性刊物，有的人说要把《炎黄春秋》办成第二个《求是》。

我们知道，国家此次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或标准是两个：第一个是社会效益；第二个是经济效益。

照这两个标准看，《炎黄春秋》现在都在80分以上。

从社会效益看，坚决、鲜明、有力地宣传了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为全面体制改革大声呼号；对人对事坚持了实事求是精神，说实话，说公道话，得到国内外普遍好评。这份刊物真正是读者自己掏腰包订购的刊物，现在已有十几万订户，它增强了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公信力，就是明证。

从经济效益看，《炎黄春秋》创办21年来，国家从来没有给过一分钱，我们又不善经营，现在已经能够做到自给有余，去年上缴税费28万元，上缴主管部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管理费5万元。

现在杂志的运行体制是“四不像”体制（杂志

社的老顾问和老编委的说法）：

说是事业单位，又没有事业编制和财政投入；说是企业单位，又挂着事业单位的牌子；说是国有，又没有国家一文钱的资产投入；说是民营，又叫国有事业单位，戴着国有的帽子。这就是

是《炎黄春秋》的历史与现状。

我们又受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领导，研究会帮了我们许多忙，但人事权、发稿权，掌握在杂志社的议事机构——编委会，行政机构——社委会手上，刊物运作一切权力归社委会。

在这种体制下运行结果是很有原则，很灵活，所以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才这么好。这种体制类似三中全会前的安徽省小岗村的“包产到户”。

21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炎黄春秋》的这一套体制、运作机制都是非常成功的，得到各界公认。事实证明，《炎黄春秋》的这种市场化、社会化探索已经为国家文化体制改革闯出了一条新路。

如今，整个国家文化系统处于大转折大发展时期，照邓小平“南巡”讲话，应鼓励各种体制大胆试验。《炎黄春秋》这种成功的运作体制，已经受到群众拥护，也理应得到政府明确的保护和扶持。

《炎黄春秋》刊物的内容、经营，还有这一套“四不像”体制，当然会有缺失，还要改进。但基本上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说:有关上级部门继续承认我们这个体制,有意见可告诉我们,我们改进。切望不要在这个转制这件事上再给我们出难题了。如认为有困难,可等待时机成熟时再考虑我们的转制问题。

这种形势下,如果强行改变杂志现有这种体制,这种运作模式,那我们就无法再勇敢地探索政治体制改革,再不敢对人对事说实话公道话了。那将违背读者心愿,违背几百上千作者心愿,违背六十个编委和上百老干部与学者心愿,后果可以说是严重的,有的同志甚至说可能酿成政治事件,二月初山东省济南市就出过一起。“十八大”开幕在即,我们衷心地愿和大家一起,营造和谐舆论环境,都不要给党与国家制造新麻烦。

在此关头我们重申:

1. 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不动摇;
2. 坚持对人对事实求是原则不动摇;
3. 遵守宪法不动摇,对于背离宪法的法规允

许我们独立思考,允许提出不同意见。

4. 全面推进体制改革,当前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我们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也有人叫我们务实派、民主派。任仲夷说我们是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

5. 《炎黄春秋》对此次体制改革的底线是:基本维护现在体制,一切努力服从 21 年的办刊宗旨(理想)。对股份制、董事会等等想法,我们也可以想想,但票子一定要服从理想,这里有个正确处理票子与理想的关系。

21 年办刊经验:小是小非可以让步,大是大非寸步不让。大是大非让步的后果,不是个人、小团体,而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失败。

《炎黄春秋》已经迈过了许多个“坎”,现在又面临一个“坎”。希望得到作者、读者的密切关注和支持。也希望得到上级有关部门更多的支持,希望得到萧克、费孝通那样的人的大胆支持。■

新春联谊会嘉宾发言摘要

○ 杜明明 整理

以下为部分嘉宾的发言摘要。

周有光: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人类历史的新阶段。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离开中国看中国,才能看清中国站世界的什么地方。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积极地与时共进,避开误区,追赶先进。

李锐:刚才听了杜导正同志的讲话,我的主张是:《炎黄春秋》坚决按原来的方针办下去!这么一本刊物都不能生存,表明国家已经处于危险状态。要赶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啊!我们年纪大了一点,没权没势,但我们还有脑袋,有嘴巴,我坚决拥护杜导正同志的发言,支持他们把刊物按原体制原方针办下去。

何方:改革开放 30 多年了,到现在经济市场化已经取得了共识,除个别小问题外,没有大分歧了。而政治民主化,复杂一点。这些年从拉丁美洲开始,最近到了西亚、北非。对这个潮流,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我以为在这个世界大潮面前我们

是落伍者,在有些方面是往后退。有人想方设法干涉别人的自由,想方设法把民主思想搞掉。这不仅是《炎黄春秋》,也是全国舆论界面临的大问题。有人老想采取“延安整风”的方式来整肃舆论,这是历史的倒退。《炎黄春秋》应该采取坚决态度。凭什么搞刊物国有化?可以公开讨论。

高放:1998 年我加入《炎黄春秋》作者队伍,今天又加入编委行列。我已经 85 岁,老骥伏枥,愿意为杂志恪尽绵薄之力。去年是苏联灭亡 20 周年祭和辛亥革命 100 周年纪念。苏联之所以灭亡,在于它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高度集权,最后人民被迫选择资本主义体制,因为退到资本主义至少还有宪法保障下的自由。苏联建国后定过四部宪法,它实行的是一党专制,比沙皇君主专制统治更严密、更严厉、更严酷。苏联从党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书记拥有大权,是大中小新“沙皇”。这种极权体制长期不改,最终被人民抛弃。这是深刻的教训。我们党我们国家必须实行党政分

开,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清朝末年本来也有选择制度的机会,但清王朝死抱着皇权不放,终于被彻底推翻了。我国当务之急是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尽快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宪政。

资中筠:我已不是第一次参加《炎黄春秋》的会了。但每一次来都几乎碰到同一个问题:你们能过去这个坎儿吗?刚才杜老的发言很悲壮,也非常无奈。《炎黄春秋》应该说是稳重、严谨的刊物,但还不能算激进。你们说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是“最大公约数”,所以并不是激进。但这样一份杂志,为什么几乎每年都会碰上“生死存亡”的问题呢?现在杂志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生存。但是,生存的意义在于坚持原则!如果牺牲了原则,《炎黄春秋》就没有必要生存下去,宁可大家改行算了。跨过了底线,虽生犹死,名存实亡。过去有过《百年潮》,现在基本没人看了,没有意思了。如果《炎黄春秋》也要改弦易辙,说明容不下一点点良心和真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更没有希望了。

阎长贵:我们都知道安徒生有一个“皇帝的新衣”的故事,核心是要敢于讲真话。这是做人最起码的道德。怎样才能克服假话成风,这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我认为,解放思想就是要回归常识,就是要讲真话。普世价值本来是个常识问题,文革结束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其实也是个常识问题。就像“皇帝的新衣”,连小孩子都明白的事情,偏就有人要歪曲。常识、常理,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起作用,要经过大讨论。当普世价值成为我国民众常识之时,也就是我国实现和实行民主之日。《炎黄春秋》在“求实存真”方面,是做得最好的刊物,也因为这一点,赢得了读者赢得了舆论。对《炎黄春秋》的态度,是对宪法的考验。希望杂志更高地举起求实存真的旗帜,越办越好。

陆德:《炎黄春秋》在全国报刊中,是难得的坚持讲真话、不趋炎附势的刊物,深得广大读者爱戴。我父亲陆定一同志,在延安时就提出我们党的新闻定义。他说,新闻的本源是事实,这是第一性的,而新闻是第二性的。如果新闻本身就是政治,把事实当成第二性的,让事实为新闻服务,这就颠倒了两者的关系。现实生活里确实有人借口为政治服务而说假话,甚至用“封口费”收买记者,制造假新闻。“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不让人

们知道,这根本不是我党的新闻观。历史赋予了《炎黄春秋》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就是坚持改革。针对《炎黄春秋》现在的情况,我建议把今天的发言公开出去,求得社会舆论的支持。

胡德华:最近,《炎黄春秋》的同志邀请我来做编委。我想,能同这样一群有思想、有灵魂、有正义感的同志在一起,这是我的荣幸!去年一位年轻记者来采访我,我反过来问他:年轻的观众对我们谈历史会有兴趣吗?他说,你不知道,我们非常希望看见真实的历史,但现在我们看不到,我们很无奈。来采访你,就是为了了解真历史。历史上,秦朝赵高指鹿为马,满朝文武全体失语,秦朝二世而亡。今天,我们绝不能让这一幕重演,所以要讲真话。尽管困难,我决心跟《炎黄春秋》的新老编委们一起坚持,保卫《炎黄春秋》!

展江:今天《炎黄春秋》的遭遇,使我想到了“掩耳盗铃有术”这句话。本来掩耳盗铃很难成功,但现在他不是掩自己之耳,而是掩媒体之耳、网络之耳,目前这股力量不小。现在盛行逆向淘汰,官本位文化与商文化高度合流。官员治理社会有一套技术,这套技术与人民的利益相差甚远。

胡舒立:《炎黄春秋》二十年,是“坚持求真,创新发展”的二十年。我们处在互联网的时代,一切都在发展。发展是个原则,什么也挡不住。

叶向真: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炎黄春秋》的年会。《炎黄春秋》是一本老中青读者都爱看的杂志。说到忠言逆耳,在此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群书治要》,这本书再版时习仲勋叔叔也题了词“古镜今鉴”。历史证明,只听吹捧话,听不得逆耳忠言的王朝一定要灭亡。只有像《炎黄春秋》这样的刊物才是真的跟党和政府一致,像魏征一样,值得我们学习。如果心不真,他的言论对领导是有害的。领导人应该经常下来跟人民沟通,听老同志的意见,他们是对国家最有发言权的人。

张木生:最近习近平同志反反复复多次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地体现权为民所赋,要落到实处”,第二句是“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四民”当中,他最看重的是第一条。《炎黄春秋》我是每期必看。我不完全同意里面所有文章的观点,但我同意它的办刊方向。改革开放34年了,现在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改

革开始于邓小平,现在他不在了,但要继续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炎黄春秋》坚持的方向。

丁东:《炎黄春秋》21年了。21年来,这本刊物始终存在并保持着自己独立的风格,能这样坚持到今天的报刊不多。这是一本追求真理、探讨历史真相、主张公平正义的杂志,也是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今年确实有个坎,去年我们迈过了一个坎——乌坎,结果是好的;今年我们一定也能顺利迈过这个坎!一定能保持《炎黄春秋》原有的品格,越办越好。历史的真相还远远没有揭示出来呢。《炎黄春秋》所遇到的问题,表明中国正走上一个大坎,希望大家爱护这个平台,不要给编辑部出难题、穿小鞋。编辑部则应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不要只是防范,要有很高的期望值,还要扩大版面,有更多的展示。

陶斯亮:多年来,我们的意识形态部门总是盯着所谓的“右”,没有清算“文革”的流毒。《炎黄春秋》是30年改革开放路线的捍卫者,是体制内稳健转型的支持者。现在,“人民”的概念已发生变化,不再是以阶级定义的人民,而是包含了多元化利益的多阶层的人民,他们的诉求当然也是多元化的。《炎黄春秋》呼吁的是改革开放,不应该看成是“右”,我认为这些人是真正的改革派。杜导正叔叔在广东曾被我父亲陶铸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个知识分子被迫去“修地球”。但是他后来一直公正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我父亲,功过是非非常客观。在杂志社,他培养了年轻一代。应该像杜叔叔一样地做人,没有私心,客观公

正地做人。希望他们把《炎黄春秋》继续办成一个讲真话的阵地,我们党应该有足够的胸怀,秉持春秋大义,让他们把刊物办好。

刘志琴:当今有一批老年人的著作引人注目:李新的回忆录被评为最具人文精神的十大著作之一,《资中筠自选集》是2011年畅销书,《何方自述》被《北京青年报》连载;周有光的《朝闻道集》更是受到读者的热捧,他们都是80岁以上的高龄作者,一生奋斗在文化战线,风风雨雨,到晚年大彻大悟,敞开心扉,由衷地道出他们的追求、失望和遗憾,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困惑,深深地打动了21世纪新一代的读者。百年前以《新青年》为主角,现在则以《炎黄春秋》为代表。启蒙者由青年变为老年,这是因为当今的启蒙不同于百年前的追求,而是对中国百年道路的反省。他们以老革命的新觉醒,唤起当代人的思考。理论界要研究《炎黄春秋》现象。

胡冀燕:我们做人要有品格,刊物也要有自己的刊格。要守身、守节,守身为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马晓力:《炎黄春秋》是一个能讲真话的地方,能到这里来讲讲真心话,我感到很欣慰。毛主席曾经给习仲勋和我父亲马文瑞题过词:“人民的利益第一”,“密切联系群众”。但是,前不久一个“在朝”的干部子弟说:江山都要丢了,还说什么普世价值!我对他说:你说得不对,江山是人民大众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少数权贵服务的。也正因为如此,我非常崇拜《炎黄春秋》,尊敬聚集在《炎黄春秋》周围的一大批人。■

(上接93页)不过,万里到安徽主政是否邓小平点将都无损于他们二人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形象,拙见未必正确,供参考。

河北读者 刘喜才

《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孙肖平先生撰写的《汪达之:教育史上的一段实践》一文中写道:“第一站,是江苏省省会镇江……前去拜访教育厅长和省长……教育厅长陈果夫毅然在孩子们送去的特别大本子上写了‘幼学壮行’;省长周佛海写了‘鹏程万里’。”其中有误。

据我所知,1935年江苏省省会设在镇江,省

政府在中山路中段南侧,解放后为镇江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市政府搬迁后,市公安局在此办公。当时省政府主席(不是省长)是陈果夫(不是周佛海)。陈家是四个家族(蒋、宋、孔、陈)之一。

1935年省教育厅在镇江中山路最东端,与省立镇江实验小学隔荷花池相望。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镇江城,放火焚烧了教育厅,大部分建筑被烧毁,剩余房屋作为日本军营。现为三五九医院所在地。当时厅长是周佛海(不是陈果夫)。周佛海系中共一大代表,汪伪政权成立后沦为汉奸,曾任伪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

江苏读者 凌宗纬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 2012 年第 1 期刊登的何伟同志《我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认为,我国以前由于受斯大林理论的影响,“凡与其观点不一致的,即便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不让看,也不让讲”。例如我国在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时,不选恩格斯于 1895 年 3 月为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作的《导言》。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

1954~1955 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二卷本,此书曾在我国发行和流传。1961~1962 年,我国人民出版社翻印此书,仍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为书名出版。这是我国解放后第一次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这个中文版和莫斯科版一样,都收入了恩格斯的上述《导言》。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时,最初的选题中也是有这篇《导言》的,因张春桥胡说这是“修正主义”而被迫撤下。但 1995 年出版的这个四卷本选集的第 2 版就收入《导言》了。此外,1965 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1 版第 22 卷中也有这篇《导言》。

北京读者 殷叙彝

贵刊 2011 年第 9 期《为什么只有一文井冈山籍的开国将军》一文中说,解放战争中收复井冈山的是第 4 野战军的 18 军。此说有误,应为第 4 野战军的 48 军。18 军属 2 野,军长是张国华,渡江后作战方向是贵州、四川,后进藏进行了昌都战役。48 军属 4 野,军长是贺晋年,原来是东野的十一纵,不是井冈山的老红军部队,而是由冀热辽军区的地方部队改编而成。渡江后进行了湘赣战役,后解放了井冈山地区。

太原读者 石名岗

贵刊 2011 年第 11 期刊登的《纪念粉碎“四

人帮”35 周年座谈综述》一文中,赵行志的子女赵霄洛在发言中谈到:“……被‘四人帮’排挤出领导班子的韩真义、李干成等老同志,也陆续出来担任市委领导”。文中所提到的“韩真义”应为“韩哲一”,文革开始时系前华东局书记兼经委主任,文革中受到迫害。1977 年 8 月~1983 年 4 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是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于 2011 年 7 月 7 日逝世,享年 98 岁。

江苏读者 桑登平

贵刊 2012 年第 2 期刊登的孙言诚先生《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一文写得很好,但是第 33 页 4 处有误:“谭立夫”应为“谭力夫”;“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支持”应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到场”;“原北京教育局领导孙国栋”应为“原北京教育局领导孙国梁”;“校长华锦”应为“党支部书记华锦”。此外,该文第四部分“祸起栏杆市”中多处出现的“栏杆市”,应为“榄杆市”。

北京读者 张纪榆

贵刊 2012 年第 1 期《胡开明在安徽》一文说:“1977 年‘四人帮’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被撤职罢官的铁道部部长万里,正下放在辽宁营口一个农场果园里‘劳动改造’。1977 年 6 月被邓小平点将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这段话中有两点与事实不符:一是“四人帮”批邓是在 1976 年;二是万里到安徽主政不是邓小平点将,因为万里到安徽主政是 1977 年 6 月,而邓小平恢复领导职务是在同年 7 月 16 日至 21 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年 6 月邓还未复职,怎么可能点将呢?这说明邓复职前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也是很器重万里的。(下转 92 页)

兰陵美酒

不知何处是他乡
但使主人能醉客
玉碗盛来琥珀光
兰陵美酒郁金香



唐诗泰斗李白开元二十八年五月来山东游历，经下邳过兰陵，闻酒香弥漫，见酒旗飞舞，于是痛饮神往已久的兰陵美酒，触发灵感，写下了千古绝句：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号称“诗仙”、“酒仙”，斗酒诗百篇，唯对兰陵美酒从色、香、味、情进行了综合鉴赏，描绘出兰陵美酒风格独特、色泽殊美、味压群芳的独特个性。

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饮兰陵美酒后，挥毫泼墨，写下了诗句：“阳羨春茶瑶草碧，兰陵美酒郁金香。”目前，这一巨联真迹仍完好存于湖北襄樊的米公祠内。由此可见，北宋年间，兰陵美酒与阳羨春茶驰名于大江南北，被颂为宋代的两大名产。

明代医学泰斗李时珍，饮兰陵美酒后，从医学的角度给予高度赞赏，在他的名著《本草纲目》中写道：“兰陵美酒，清香远达，色复金黄，饮之至醉，不头痛，不口干，不作泻。共水秤之重于他水，邻邑所造俱不然，皆水土之美也，常饮入药俱良。”

清代诗坛盟主王渔洋在《寄任同年》一诗中写道：“阳羨六斑茶，兰陵十千酒。古来佳丽区，遥当五湖口……”这里不仅赞美了兰陵美酒的名贵，而且赞美了兰陵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

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兰陵美酒荣获金质奖章，使这一传统名酒名播海外，誉满神州，跻身于国家名酒之列。



兰陵美酒招商咨询热线 13395199999

个人出书、家族出书

——自费编印文集自传、家史家谱



出版著作
传承文化

服务电话: 010-6252 5116 6892 0399 400 007 1130

书店接待: 北京市海淀区图书城25号(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邮编: 100080

编印单位: 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绘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登陆网址: 《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诚邀总部合作与地方代理

本公司首创“个人、家族自费出书”模式，三年编印个人文集、自传、回忆录，家族画册、史志、家谱一千余种，形成了采编创作、编辑出版、培训讲座、网络传播一条龙服务链。全国首家“家谱传记书店”传统文化特色浓郁、讲座气氛热烈，老年朋友由衷欢迎，媒体广泛关注，先后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与《北京日报》、北京广播电台及香港卫视、《凤凰周刊》与德国《世界报》、奥地利《标准报》等二十余家媒体做了专题采访报道！

立言是中国文人传统，修谱乃家族文化标志。随着传统文化回归、家族意识还原，家谱传记出版、寻根修谱讲座、姓氏宗亲联谊、姓氏礼品开发、怀旧寻根旅游都有极大的市场开拓空间。本公司愿与同好合作共赢，诚邀北京总部合作与地方加盟代理。请联系付先生(18910320569)、冯先生(15810546639)、涂经理(13521186881)咨询洽谈。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代理出版:

- 个人出书: 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传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 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 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 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 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 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 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 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 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 A类: 国内出版社出版, 国家标准书号, 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 无书号出版, 用于交流与赠送, 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 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大、32开本: 封面用250克铜版纸, 赠送勒口, 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三千元, 300页印刷100本四千元; 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 封面用250克铜版纸, 赠送勒口, 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4千元, 300页印刷100本五千元; 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注: 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 1000册起印; 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 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 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 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 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 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 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 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 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 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服务热线: 010-58608407 82057551 58608409
 传 真: 010-58608409 投稿邮箱: 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 (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出版发行网)www.51isbn.com

公司名称: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 102218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作品展示



《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

2012年2月8日上午,《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在京举行,关心杂志社的老老朋友与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大家畅所欲言,对进一步办好《炎黄春秋》提出了希望和建议。出席联谊会的来宾有(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东 习静 马立诚 马仲廉 马国川 马晓力 王才 王克明
 王俊义 王彦君 王海光 王强华 方徨 方学辉 叶向真 卢跃刚
 冯健 毕苑 朱良 吴薇 庄重 刘志琴 庄建平 刘洪庆
 孙振 孙大午 牟广平 苏双碧 杜光 杜星 李乔 李锐
 李焱 李永忠 李树桥 李胜平 李洪林 李欲晓 李维民 杨杰
 何方 何燕凌 谷秀敏 宋以敏 陆德 张千帆 张木生 张天来
 张北英 张希清 张思之 张素芳 张夏白 张静娴 陈崇保 邵燕祥
 林耀 尚红科 罗昌平 罗雪村 季音 周艾若 周有光 周晓军
 郎渝 赵友慈 郝怀明 郝爱存 胡治安 胡舒立 胡德华 胡冀燕
 钟沛璋 施亮 祝华新 姚力文 贺延光 袁鹰 耿福胜 夏宇立
 顾骧 徐汝芳 高放 郭宇宽 郭道晖 资中筠 浦志强 展江
 陶斯亮 曹祺 曹思源 崔卫平 章立凡 章治和 康国雄 阎军音
 阎长贵 蒋彦永 韩磊 程理嘉 鲁 谢小玲 雷 颐 虞

下列同志先后在会上发了言:



我所了解的“半夜鸡叫”真相

高华：1940年延安审干

金银滩之痛

叶圣陶日记中的出版总署“三反”运动

对“团结，教育，改造”的反思

毛泽东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之死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元